1935—1939
（抗战前后在
国民党统治区）

我的编年故事

于光远 著

大象出版社

我的编年故事

1935—1939（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

于光远 著

大象出版社

我的编年故事

（1935—1939）

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

于 光 远

责任编辑　余　峤

责任校对　郭一凡　王　森

大象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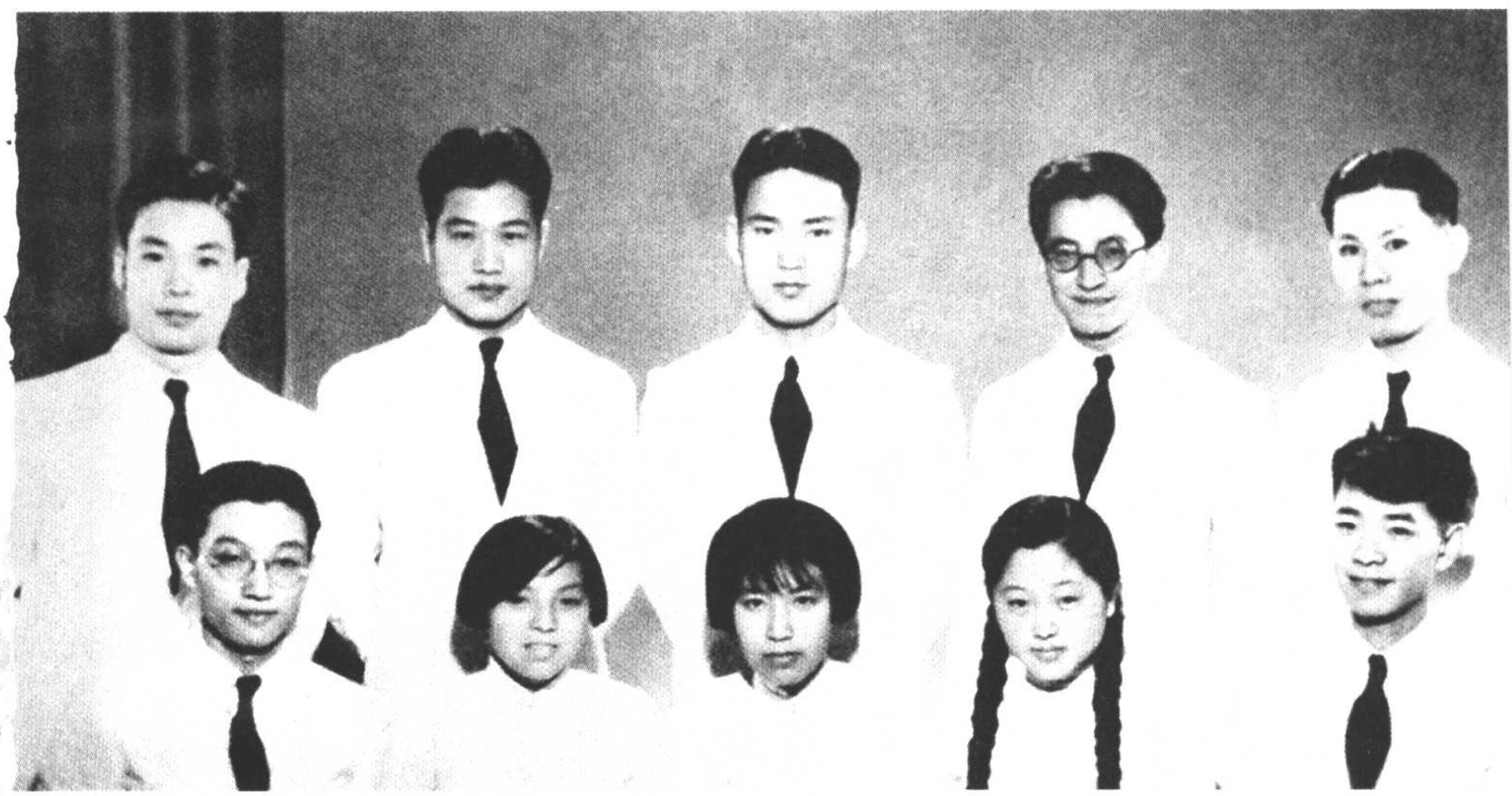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53 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8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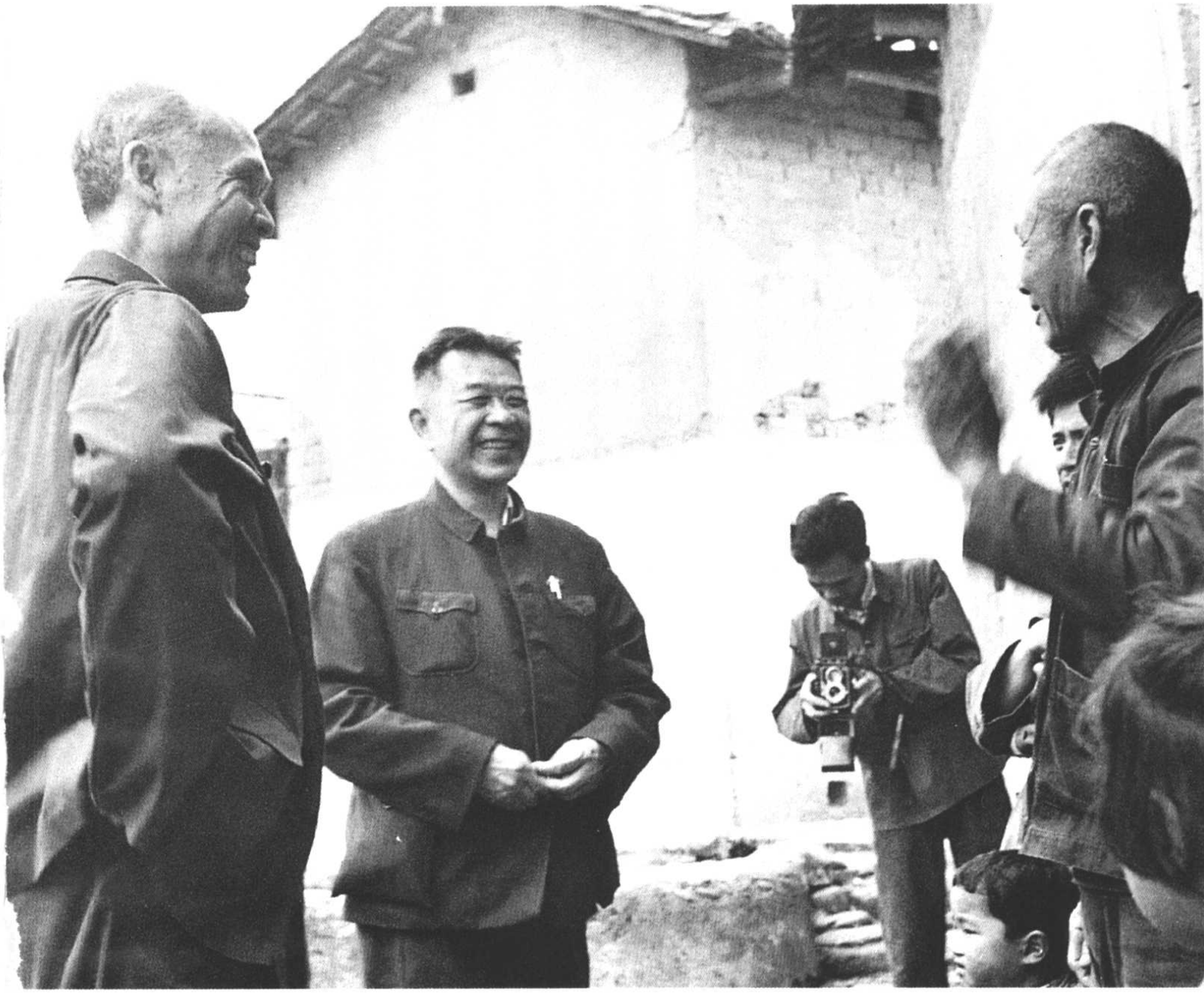
ISBN 7-5347-2105-9/G・1737

定　价　12.00 元



大学毕业时全班合影(第一排右数第一人是于光远)

“一二·九”后，于光远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在路上。（右数第一人为于光远）



1980年4月于光远重访当年战斗的
地方——广东省翁源县(中为于光远)

出 版 说 明

于光远先生的《我的编年故事》，是一套回忆录性质的丛书，但它和一般的回忆录不同，不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而是以连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作者儿童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我们相信，读者定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现分为四册出版：1915—1935（20岁以前）；1935—1939（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1939—1945（抗战八年）；1945—1949（迎接全国解放）。

编　者

1996.6

目　录

1　“一二·九”运动 …… (1)

1.1　第一件“革命工作” …… (3)

1.2　“唤起农民” …… (7)

1.3　“一二·九”前的三个月 …… (13)

1.4　“一二·九” …… (17)

1.5　南下扩大宣传团 …… (22)

1.6　民先队友 …… (30)

1.7　镜子背后的禁书 …… (33)

1.8　1936 年 2 月 29 日清华校园 …… (35)

1.9　啃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 (38)

1.10　要不要毕业 …… (40)

2　1936 年夏在上海 …… (42)

3　1936 年在广州的日子 …… (50)

3.1　初到岭南 …… (51)

3.2　上演不了的《少奶奶的扇子》 …… (54)

3.3　卡拉科夫 …… (55)

3.4　广州鲁迅逝世纪念会 …… (57)

3.5 有待亮出旗号的民先广州地方队部 …… (60)
3.6 杨匏安夫人 …… (63)
3.7 战友们被捕的当日和翌日 …… (67)
3.8 在香港 …… (70)
3.9 在岭南讲了最后一堂微积分 …… (72)
3.10 告别华南 …… (74)

4 **抗战前在北平的四个多月** …… (77)
4.1 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 (78)
4.2 我的入党 …… (80)
4.3 两个“第一次” …… (82)
4.4 1937 年的“五·四”纪念会 …… (84)
4.5 我做了一件荒唐事 …… (87)
4.6 和本人的毕业论文最后告别 …… (90)

5 **北平沦陷前后的经历** …… (93)
5.1 “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 …… (94)
5.2 接受去保定的任务 …… (96)
5.3 与日寇坦克车队在田村遭遇 …… (98)
5.4 在田村的几个小时 …… (100)

5.5　7 月 29 日晨 …… (106)
5.6　从良乡到琉璃河 …… (107)
5.7　进保定城 …… (110)
5.8　民先临时总队部在保定一天的工作
…… (111)
5.9　见彭真 …… (112)
5.10　会见全国学联前线慰问团 …… (113)
5.11　离开保定去石家庄 …… (114)
5.12　太原典膳所 2 号 …… (115)
5.13　海子边公园接受任务 …… (116)
5.14　民先临时总队部和太原平津流亡
同学会 …… (118)
5.15　第一次见周恩来 …… (120)

6　**抗战初期在武汉** …… (123)
6.1　接受去武汉工作的任务 …… (124)
6.2　和陶铸、杨学诚在一个党小组 …… (125)
6.3　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 …… (128)
6.4　1937 年在武汉民先办事处和《呼声》
杂志的工作 …… (130)
6.5　洪湖之行 …… (131)
6.6　争取集中力量做青年工作 …… (137)

6.7 长江局青委成立后 …… (140)
6.8 武昌育婴堂街7号 …… (144)
6.9 长江局做出关于在全国建立民先队部
的决定 …… (147)
附一 渡船上的冯玉祥 …… (149)
附二 长江局机关生活回忆片断
…… (150)
附三 全国学联在武汉 …… (153)
附四 在武汉到过的地方 …… (154)
附五 在武汉初次见到的人 …… (157)
附六 怀念郭述申 …… (160)

7 长沙之行 …… (163)
7.1 临时大学 …… (164)
7.2 黎澍、杨赓和《观察日报》 …… (167)
7.3 徐老 …… (169)

8 出差南昌 …… (173)
8.1 南昌市的青年工作 …… (174)
8.2 一件学生装惹出的麻烦 …… (177)
8.3 回忆同陈丕显相处的日子 …… (181)

9 广州沦陷前后在广东 …… (185)
9.1 南下广州执行任务 …… (186)
9.2 广东省委 …… (190)
9.3 东皋大道和宪兵司令部 …… (192)
9.4 “武装保卫大广东” …… (195)
附 广州高楼之今昔 …… (198)
9.5 青抗先的队伍从广州撤退 …… (199)
9.6 四会之会 …… (204)
9.7 在北江上 …… (206)
9.8 初到翁源 …… (209)
9.9 当我一声令下允许唱歌的时候 …… (211)
9.10 如此演习 …… (214)
9.11 瘴气和一条旧棉被 …… (216)
9.12 两个晚上，天上地下 …… (217)
9.13 在韶关 …… (222)
附 1939年在韶关“抗先”的活动片断
…… (225)
10 从韶关到延安途中 …… (233)
10.1 桂林 …… (234)
10.2 贵州 …… (237)
10.3 四川 …… (240)

10.4　陕西 …… (243)

1 “一二·九”运动

1935年暑假后我在北平清华大学开始读最后一个学年。这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还不是党员。关于党是怎么发动和领导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情节我完全不知道，以后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没有去向当时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或者接近党领导的同志讨教，没有去查阅当时的报纸刊物和内部档案（甚至连有些什么档案也不知道）。在我的朋友中有写过“一二·九”运动历史的，如已经过世的杨述。我从来没有写史书的意向。我对党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了解只是靠那时和后来同志讲的零零碎碎的片断，因此没有资格去讲“一二·九”运动的全过程。但我毕竟是亲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人，在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受到过教育。经过这个运动，我提高

了觉悟，本人的人生道路更明确、更坚定，逐步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推进社会进步事业的革命者，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因此我还是应该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一番回忆的。在以往的那些年中，关于“一二·九”，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演讲的次数就更多了。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做过多次演讲。比如1939年初在粤北翁源周陂中学和1946年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我就对同学们做过关于“一二·九”的演讲，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两次。一位听过我演讲的人，前些年还对我讲起那次演讲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建国后，我给青年们做这方面的演讲就更多了，几乎每逢“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总有人要我去演讲——当然在文革中的那几年和最近几年是例外。此外我还在许多次座谈会上发言。但是我始终没有系统地写过“一二·九”中我接触到的事情，讲讲自己在运动中的感受和进步。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60周年，我想趁这个机会写一篇，讲讲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想写得细一些。我也只能写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对它有兴趣。

1.1 第一件“革命工作”

为了讲清楚参加“一二·九”时自己的思想基础，我想从1935年夏天我满20岁时写起。那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革命觉悟，而且觉悟到自己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对那一段认识提高的过程，我在《20岁以前》那本书里做过一番介绍（这本书已由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不在这里讲

了。总之，那时候我觉悟到干革命不能仅仅提高自己的认识，还必须采取革命行动。但当时直接间接我都没有同党组织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同其他政治组织有任何联系，于是我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原来在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加上他联系到的几个朋友）自发地干起革命来了。这时我们从事的那些活动究竟算不算“革命工作”，我也不那么清楚。在填登记表中“何时参加革命”这一栏时，有时我填 1935 年 7 月，有时我填 1935 年 12 月，就是吃不准从事这种自发的革命活动算不算“参加革命”。早半年晚半年本来是无所谓的事情，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弄清楚我们平常所讲的“参加革命工作”的准确概念究竟是什么。由于对这一点我至今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在讲自己从事的第一件“革命工作”时，有意加上一个引号。

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1935 年暑假我在清华学习了一年之后回到上海。在未回上海前，我与程淡志在“北京—上海”的两地通信中，早已计划好要在暑期中做一点“革命工作”。在暑假前两三个月，程淡志写信告诉我，他同育才中学的几个校友（程本人就是这个中学毕业的）商量办一个刊物《育友》，他们利用校友会的这个小小的刊物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要我写点东西给他们。我也写过一两篇，题目记不得了。当然用的是假名字，因为我不是育才校友。在信中程讲，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只有育才的校友们看，工人是看不到的，而且也看不懂，主张暑假中我回上海利用这个闲暇，设法直接到工人中去工作。我一回上海，就和程决定办一个工人识字夜校，招收工人，一

边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边宣传革命道理。暑假时间很短，一做出决定，我们就立刻行动。我和程编写识字课本，参加《育友》的程的两个朋友去租房子，向学校去借暑期内不用的桌椅板凳和黑板。我们几个人又凑了些钱在静安寺附近，今天的华山路上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间厢房。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仅用四五天，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租到的那间房子不算小，可以摆下 34 张椅子和一张桌子，再上街买了一百多本写字的白纸本，一百多支铅笔，自己刻钢板把课本印出来，在“学校”附近街上贴上十来张招生海报，定下报到和开学的时间，这所工人识字夜校就办起来了。

应该说一下我们编的那个识字课本，它是按照《资本论》的体系去编的，没有去考虑识字的规律性。我们一开头要工人们学的字中就有劳动、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雇佣、价值、剥削、工人、资本家、阶级、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人民等字样。回想起来真“幼稚得可爱”。

第一天开学到校的人很多，整个厢房都坐满了。来了就发课本、本子和铅笔，而且马上讲第一课。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大家很高兴。虽然那天教室里的秩序不太好，因为来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女佣，她们中有的还带了小孩子来，大声说话，对“教室”内的讲课起干扰作用，不过这些缺点比起把班办起来，就算不了什么。我们几个人都去看了第一天上课的情况，总的说来是很满意的。

没有想到只过了三天就没有人来上课了。原来前两天来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同时他们觉得能够不花钱

拿到本子和铅笔也是好事，真愿意在这个“学校”里听课的人没有几个。于是只好第二次招生。这次招生时规定报名的人要交30个铜板的押金，中途退学概不退还。这个办法果然奏效，第二次招来的人虽然不多，不到30人，可是稳定下来了。

我们了解到来学的人几乎没有“产业工人”，大都是佣工和弄堂里的“杂工”，其中女佣比较多。这种成分不合我们原先的愿望。同时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自称是邮政工人的人，他的文化程度至少在初中以上，却每晚都来。我们想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兴趣进识字班呢？怀疑他是工部局派来的特务。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故意找他聊天，越聊越不放心。

这个班还是平平安安地办了一个暑期，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出什么事。虽然几乎每堂课结合识字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里的那些道理，应该说是很“左”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来干涉我们，或者来找我们的麻烦。不过我们办这个班也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没有看到什么积极的反应。在办班的过程中，我们一个工人朋友也没有交上。而原先我们办班的目的之一是认识几个有觉悟的工人，同他们交朋友，逐步吸引他们同我们一起革命。

延安1942年开始的“整风”，领导层是解决路线问题，一般干部是解决思想问题。后来就转入审干阶段，在审干这个阶段，每个人讲自己的历史，大家来分析所讲的是否真实。当我讲了1935年暑期办这个工人识字夜校这段经历后，大家对我所讲的内容进行分析时，其中有几个对我颇不友好的人，提出诘问：1935年你们办班的时候，上海白色恐怖很严重，党的组

织遭受破坏，连党中央也被迫离开上海，而你们却明目张胆地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干得那样红火，而且据你说特务已经盯上你们，可是反动派却让你们平平安安地办完，这是说不通的事情。他们认为我没有说出真实的情况而要我老实交代，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解释通。这样提出问题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那时在延安已经有人坦白自己是特务，并且交代他做特务工作的手法之一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即故意以“左”的面目出现，组织团体，吸引真心革命的青年参加，然后把参加的人一网打尽。他们怀疑我也在做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情，至少怀疑我是在编造故事。对这种诘问，当时我倒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正因为我们不是党员，同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根本不知道白色恐怖严重的程度，因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同时正因为我们不是党员，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有任何关系，特务考察一个时期之后，就看出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同于党员或者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人，他们大概还想多观察一段时间，可是这个班办的时间不长就结束了，于是就把我们放过了。

1.2 “唤起农民”

在工人识字夜校办起来后，我和程淡志看到，办这所夜校我们的人手有多余，于是决心到杭州郊区农村呆上一个月，到农民中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农民觉悟比较高的乡村，以便今后经常同他们联系。

我们不知道用别的什么工作方式，还是决定去办识字班。

为什么选择杭州郊区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留在上海不容易专心，而程淡志的姐夫正在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做账房，到杭州有一个落脚点。

从上海到杭州郊区，火车用不了几个小时，当天下午，我和程淡志就住到新新旅馆去了。这个旅馆现在还在，连名称也没有改，而且1935年我们住过的那座楼也在，只是旁边多了一座新楼。我们一到杭州，就买了一张杭州地图，决定第二天一清早就沿着去富阳的公路走，希望在那条公路上找到一个乡村住下来。

我们走的是绕到宝菽塔后面再向西南前进的一条老公路，不是现在去富阳的新路。清早吃了早点立即动身，走了大约15公里，不到中午来到一个叫关帝庙的村庄，就想在这个村庄住下来。我们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认为能像上海静安寺那样出点钱把房子租下来，当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一进村，我们走进了一户农民的家，看到有空着的房间，就表明想租房的来意，以为这事马上可以定下来，因为他无论要多少钱我们都准备照付。没有想到户主说这事他不能作主，我们必须先去找村长。那个农民倒很热心地把我们带到村长那里，村长听完我们的来意后，强调说这个村子没有空房（这当然是推托之辞，因为我们方才在那个农民家中就看到可以有适合五人用的房间空着）。在我们一再说明并不要求很大的房间，而且房租可以照付或者先付的情况下，村长还是不改口。经我们再三要求，村长说有一处地方怕你们没法住。听到这句话我们很高兴，要

他领我们去。这位村长才勉强把我们领到这个村庄之得名的关帝庙。这是一个很小的废庙，只有一间，关帝的泥塑早已破损。塑像背后是一片瓦砾，还有好多人粪猪粪。村长以为我们看了一定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我们连声说“好，好，这里很好”，立即准备动手打扫。可是村长又反悔了，说这个地方也不能让我们住，什么理由他说不出来，因为是他自己带我们去看的。我们最后才明白，我们越是表现自己不怕苦，他们越是怀疑我们有什么不利于他们的用意，越对我们害怕，越是不能让我们住下。

关帝庙这个村不会让我们住了。这时候时间已过了中午，我们只好走回头路。在回杭州的路上又进过两个村庄，都不让我们住在村里。没有办法，只有赶路回新新。到新新已经是傍晚了。第一天就这样失败了。我们想，在上海租房之前并没有告诉要在那里办工人夜校，房东认为是一般的房客，因此没有发生困难，而在这里是打着办农民识字班的旗号，村子里当然就不敢留我们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改走去吴兴、长兴那条公路，也是走了二三十里光景，试着提出要租一间房住一个月，不把办识字班的意图说出来，也被婉言谢绝了。我们被视作来历不明的人，他们还是不敢把这样的人留在村里。一连几天，每天走一条公路，进了许多村庄，不论说什么原因，村里管事的人都拒绝我们住下的要求。每天出去走的结果都是“失败”两个字。每天晚上都住在杭州城里西湖旁边的旅馆。

在买来的地图上，我们看到从杭州出发到外地去的公路

共有六条。我们每天走一条，不论刮风下雨都走。虽然每天都失败，但也感到每天都对农村增进了一些了解。

有一天清早已经开始下雨，并且乌云密布，是个要下大雨的天气。可是我们毫不考虑这种恶劣气候，照常按时出发。这一天前进的方向是萧山，还没有过钱塘江，在六合塔附近雨就下得很大，真是倾盆大雨。我和程淡志两人那天上身穿的都是一件衬衣、一件背心，下身是一条短裤、一条裤叉，头上还戴了一顶很大的草帽代替雨伞。在被大雨浇了一阵之后，觉得身上实在太湿了，很不舒服，就想出一个办法，走到路边（雨太大了，路上没有别的行人），把衬衣和短裤脱了下来，尽量挤干，把它们置于“脑袋之上，草帽之下”，只穿着背心和裤叉在雨中行走。过一会儿，把背心裤叉脱了，取出顶在脑袋上的衬衣短裤穿上，把背心裤叉挤干，再放到“脑袋之上，草帽之下”那个空间。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衣服不断换来换去。

那一天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故事。快到萧山，看到路边有一所小学，我们就进去。那是一座小小的二层楼房，整个小楼似乎都没有教室，教室和操场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走进楼下的一个房间，看来好像是会客室。我们从进门到进这间房子，一个人都没有见到。那时正是暑期，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就在这间房子里东张西望，看到墙上有一张学校经费支出的示意图，图中表示出学校的电费开支占全部开支的70%，其他各种支出加起来只有30%。我们看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纯粹出于好奇，就上楼找到一个看管这所学校的人，询问为什么电费的比重这么高。这个人见我们来到学校，别的不

问，一见面就问关于钱的问题，以为是上面派来的检查学校工作的，毕恭毕敬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离开这所学校后，大笑了一场。

那天我们以避雨为名，在萧山境内的一个村庄的农户家呆了不少时间，和这家人谈的时间很长。那次谈话比较自然，倒使我们了解到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

后来我们知道在农村住下来办农民识字班的打算是没有可能实现了，就改变工作方法，住在新新旅馆，早出晚归。早晚在旅馆受到很好的款待，中午吃“干粮”。每天到农村中找农民谈话。见到农民在踏水车，我们就上去和农民一起车水。多一个人车水总会使那些人的力气少花一点，因此受到欢迎。一面车水，一面同农民聊天，也比较自然。每天出去，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很肤浅，说不上有什么大的收获，但是因此增加了一些对农村的感性认识。我和程都是城里人，以前从来没有下过农村，这次去农村时间真不算短，看到的和听到的对我们来说都还新鲜。

有一天，我们到一个靠近笕桥机场的村庄，以谈话的形式向农民宣传抗日的道理，讲日本人怎样欺侮我们中国人。江苏、浙江一带把日本人叫“东洋人”，当我们向这个村的农民宣传东洋人如何如何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村庄的农民同别处不一样，对我们所做的宣传的反应竟然非常强烈。我们讲一句，听的人七嘴八舌地讲十句，他们讲了许多被欺侮的事情，而且讲得激昂慷慨。这一次可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后悔前几天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早一点到这个地方来，而我们能

够在杭州郊区停留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了。不过我们还是打算采取早出晚归的办法到这个地方跑几次，希望能同他们取得经常的联系。可是后来我们发生了怀疑，日本人怎么会来这里和当地老百姓发生这么多的关系呢？再一问，终于明白，他们口中讲的、他们强烈不满的人，不是日本人（东洋人），而是浙江省钱塘江南离杭州不远的浙江东阳县人。我们错听东阳为东洋，空欢喜了一场。

杭州郊区之行，目的和动机都是向农民做革命宣传，甚至做一些组织工作，结果收效甚微，就是在静安寺办的识字夜校，办了近两个月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不过我们的革命热情真是非常高，把革命事业看得非常神圣，对革命事业非常虔诚。大热天，在杭州天天日晒，在那样的大雨天走几十公里路，一点也不觉得苦。新新旅馆就在岳坟旁边，我们根本没有产生过要去观赏一下的念头。住在西湖边，西湖风景点一处都没有游，当时的思想感情是觉得如果有一点革命之外的想法，就是对革命不够忠诚。有时候从农村回到旅馆吃罢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去，在湖滨散步见到金色的晚霞，倒引起一种欣赏自然美的情感。那时候我身边带着德文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湖滨的凳子上大声朗读，这是唯一似乎与革命无关的事情。回想那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觉得真有点趣味。后来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觉得我们有点像这本小说中描写的民粹派的知识分子那样到工人和农村中去唤醒群众。不管人们对“参加革命”这个概念作什么理解，我还是把这段经历作为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1.3 “一二·九”前的三个月

从1935年9月开学到12月三个月中，我一方面想投身革命，但不知道怎么“投”法。这时我同许许多多清华同学成了朋友，大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后认识的。在“一二·九”前，由于我是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我的活动范围也就几乎在本系本班的十来个人的小圈圈里。至多加上比我高一班的和低一班的本系同学，那也只是认识，并不很熟。而物理系的课程是很重的，加上我又没有体育和文艺爱好，因此在“一二·九”前学校里我认识的人很少。我倾向于革命这个情况在清华没有人了解。我也不了解别人。因此我就在清华的革命同学的圈子之外。在“一二·九”前的三个月中，我也就活动不开。另一方面，1934年我转学的目的就是考虑到清华既有研究生班，又有出国深造的机会，这比上海大同大学要优越得多。那时我追求的是在物理方面取得成就，对这一点信心很足。但是经过1934年到1935年的第一个学年，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便决心从事革命。可是到1935年暑假后入学时，我还在做未来大物理学家的梦。这表现在我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上。我是抱着相当大的野心想从写这个论文开始来解决一个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找周培源老师做导师写关于广义相对论的题目就是想开始进一步探索引力场的原理。那时候我的基本思路还是想兼顾学者和革命家两者，不懂得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要当学者就要全力去研究学术问题，要当革

命家也要全力以赴。在这三个月中，这方面的矛盾在我思想上还没有展开。不过从行动上来看，由于“革命工作”无从开展，倒是比较专心地学了三个月的物理，酝酿我的论文的写作。

尽管我在做学者和革命家之间还没有做出肯定的选择，但是在那时我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超过关心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这时候我对清华大学学生中有比较好的民主生活的风气颇为满意。我说的是清华有一个学生全体大会，经常讨论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这种讨论是由大会选举出来的学生会主持的，讨论的地点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那时清华的学生不多，1936 年我到学校那一年学生人数才 1100 多人，那个大礼堂的空间完全容得下开学生全体大会）。1934 年到 1935 年上半年这一学期，我对清华的这一套制度不那么了解，也没有特别给予注意。1935 年暑假过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北平更是岌岌可危，清华大礼堂对国家大事问题的讨论多了起来，我对它也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有一次在清华大礼堂参加全体学生大会，讨论的题目是清华学生对华北时局应该持什么态度。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同学们发表的意见各种各样，有些意见是尖锐地对立的。部分发言人主张清华学生必须积极行动起来，督促政府纠正不抵抗政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有一部分发言人主张读书是学生的本分，应该安心学习，学有专长，才能有效地救国，不要冲动，受人利用。有的发言人明显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替蒋介石政府说好话。在讨论到具体问题时，还咬文嚼字，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弄得不仅对实质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也常常需

要进行表决。讨论的制度可以说是严格地遵守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这个规矩谁都不能违反。不过那次大会争论的结果，竟然是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个“爱国有心，救亡乏术”这 8 个字的决议，也就是否定了一些激进的同学要发宣言（快邮代电），乃至要上街游行的主张，决定清华学生不做任何表示。当清华大礼堂做出决定按兵不动的时候，城内的不少学校是有所表示的。因此我们清华学生进城常常遭到城里学生的哂笑：“你们清华怕冒风险，不愿表明政治态度，却还要给自己脸上擦粉，说什么‘爱国有心’。你们说自己‘乏术’，你们只是救亡‘乏术’，别的方面的‘术’还不少哩！”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讽刺。城里个别同学把清华的这个决定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联系起来，清华不少同学听了的确感到羞愧。不过我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同城里的学生讲：“那是经过我们学校全体学生大会通过的。”意思是民主决定，自己处在少数地位，没有办法。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大会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在这样的大会上没有发过言，但我从大会辩论中明白，在我们学校里两种意见就是这样尖锐的对立，在政府中，尤其是政党之间的主张就一定更有分歧，可见要推进革命，难度不小，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而且热烈拥护，我在转入清华之前偶然听人介绍江西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使我非常向往。我也知道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北平我看不到共产党的活动，连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都没有看到，而这些我在上海大同大学上学时倒是见到多次的。我想共产党在北平一定有人，也很可能

在清华就有，但是我看不到，不知道谁可能是。参加这样的大会，我还有一种收获，那就是我记住了那些发言人的名字，逐渐知道哪些人有哪些比较固定的倾向。我在这些同学中注意谁可能是共产党员，但是看不出来。后来我反思，如果在那样的大会上我也积极发言，也许会引起一些革命同学对我的注意，而我也就不会那么孤立了，可是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华北的形势一天天严峻。6月中旬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地军司令长官梅津签订《何梅协定》，6月下旬秦德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情，同学们知道的时候正在考试，暑假也即将来临，清华大礼堂没有举行大会讨论。暑假后的9月和10月间令人气愤的事情又接连不断。10月中旬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首、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和其他一系列事实上把华北变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宋哲元不敢表示同意，土肥原就扶植汉奸殷汝耕在自通县到山海关的滦东22个县的国土上成立一个与中国政府完全分离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机关就设在北平附近的通县。我曾悄悄地到通县走了一趟，在那里看到穿着颜色和样式都很特别的衣服的警察，墙上贴着“中日亲善”“中国经济提携”“防止赤祸”等标语。到那里去，我如同出了国一样。潞河中学是北平比较有名的学校，那次我去通县找了在潞河中学教书的一个熟人，他们说师生们过的差不多已经是亡国奴的生活。到11月，蒋介石为了满足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时候，积极主张抗日的力量，把1927年的田中奏折

印了出来，使学生们都能看到。这个“奏折”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做亡国奴的危险迫在眉睫，北平学生，包括我在内的确没有法子再安心读书，安心做学术研究、写毕业论文了。究竟是争取成为一个大学者还是去做一个革命家的矛盾在我身上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1.4 “一二·九”

1935 年 11 月 27 日晚上，清华大学礼堂又举行学生全体大会。讨论的题目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清华学生该怎么办。那天晚上到会的同学很多，虽然在校学生没有全到，图书馆里一定还有人在看书或写东西，但是那天到会的学生达到 80％以上。大礼堂坐得满满的，讨论的气氛也特别热烈。争论的态势也还是上面描写的那次大会的样子，一部分同学要求通电全国、上街游行请愿，另一部分同学反对，基调是“学生要以学业为重，国事听候政府处理，不要冲动”等官方的语言。最后通过的决议仍同那次差不多，通电游行都没有通过，但不再提“爱国有心，救亡乏术”，而是“应有所表示”这个很抽象的决议。至于做何表示完全没有涉及，这“有所表示”便是一句空话。而且可以看得清楚，在大会上激进和保守两派势力几乎旗鼓相当，主张要发宣言的意见被否决，而主张不做表示的提案，也被以显著的多数否决了。那一天晚上的学生大会辩论和表决的情况就是这样。

过了几天，学生们又在大礼堂开会了。在11月27日大会后的6天中，北平的报上又登载日本侵略者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华北当局有投降妥协的迹象。这是通过可靠的渠道得到的新闻。于是有众多的同学们向学生会提出要求紧急召开大会。大会就在1935年12月3日晚上举行。这次大会到的人数比上次更多。在这次会上主张应该积极行动的人一下子占到了优势，但是大会上还是有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且决定联络北平大中学校同学一齐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请愿行动。

清华的同学终于行动起来了！我对这次大会非常满意。

没有过几天，传来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华北特殊化的产物。大家认为是应该把它列入“自治”的范围。大多数同学的看法也是这样。听到这个消息议论纷纷，没有不气愤的。差不多同时又听说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就定在12月9日。北平学联的通知来了，就在这一天将举行全市同学的请愿。

我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35年12月9日这天，我早早就起了床，吃过早点赶到集合地点。我到的是比较早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比我先到。等不多久，同学们陆续来了，到出发时间，大概有二三百人。那一天是星期一，学校上课，许多举手赞成游行的人没有去。我们打着横幅的清华校旗，高呼着口号，沿着铁路线朝着西直门方向前进。走到西直门外一个叫做高梁桥的地方，清华的队伍同

在那里受阻的燕京大学同学以及几个中学同学的队伍会合。军警不让前进，大家一声怒吼，冲过了阻拦我们前进的“防线”，不一会儿就走到了西直门。没有想到西直门大门奉命紧闭，那时候北京的城墙还是完整的，关上了门我们就进不去，不能同城内的同学会合。同学们对反动当局采取这样的措施非常气愤，派人前去交涉，要他们开门，交涉多次，回答只有一个“不行”。去阜城门探视的同学回来了，说那里城门也已关闭。于是我们只好就地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要求当局不再一味投降妥协，并向居民们控诉当局不许我们进城、阻拦我们游行的不抵抗行为。同时，我们也分别向居民、向守城门的军警进行宣传。群众的反应是热情的、强烈的，军警们虽然默默不语，但认真地听我们讲，我们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同情我们的爱国行动，只是不敢有什么表示。先到西直门的清华、燕京等校同学正在进行宣传时，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同学和西郊另外几个中学的同学也赶来了西直门。人越来越多，原来要进城游行的队伍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宣传队。从上午一直坚持到黄昏。同学们在西直门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时，新闻记者们也赶到了。他们进行采访，拍下了同学们的照片。有一位与我同一个学期转入清华三年级的同学陆璀（我在上海大夏大学的考场同她见过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就有人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许多听她演讲的人的头像），这张照片后来在许多报刊上登出，成为反映“一二·九”这个

历史性运动的有代表性的照片。我以为在陆璀身边的十来个穿着长袍围着围巾的男同学中可能有一个是我，当然也可能不是，因为穿那样衣服的人不少。

在西直门受阻只得就地进行宣传时，我们很关心城内的同学的活动情况。西郊的学校毕竟比较少，城里的学校要多得多，北大、师大、中国大学、法政学院、民国大学、女一中、汇文中学……他们一定也会受到阻拦，但是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一二·九”运动是整个北平学生的行动，但是主战场在城里。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城里同学的英勇斗争。大刀、枪柄、棍子、水龙头使许多同学挨打，全身衣服结冰……我听说城内的同学总算到了新华门，派出代表向住在中南海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头头何应钦进行请愿，但是不允许进居仁堂，何也没有出来见学生，出来了一个官员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同学们十分气愤，请愿受阻就改成了示威，并且决定出西直门去迎接清华、燕京的同学进城。由于路上遇到以大刀、水龙头等为武器的军警的阻拦，城内、城西两支队伍始终没有能会合在一起。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已出版的书中写了不少，我就不在这里多写了。

“一二·九”那天，我同别的许多同学一样，热情地向群众做宣传，同时本人也受到教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好讲。通过这一天活动，我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同日本帝国主义站到一条战线上，所以，不能再搞什么请愿，向汉奸卖国贼去请愿简直是与虎谋皮，只应该向他们示威。

这一天我参加游行，没有一个人通知我一块儿去。那天在

清华请愿游行队伍里的人，我一个也不熟。同班的同学除了我之外似乎都没有去，也许有人去了而我没有见到。系里的一个比我低两班的杨学诚去了。他是一个一见面就很容易记住的人。他的年龄看起来比实际要年轻，看上去像是一个少年。我的表弟周国铨那天也没有去。而在那时，除同班同学和我这位表弟外，我几乎再没有什么熟人了。队伍里有几个熟面孔，那是因为在大礼堂听过他们的发言。那天，陆璀也许是我最注意的一个人，这是因为那天她表现得很突出。除了她之外，现在我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我想，那天别人也不会注意我这个人。从集合到返校，我就没有同人交谈过，那天我没有结识任何一个新朋友。但是从那天起我毕竟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去了，不再像三个月前只是同某个好朋友一起单枪匹马去搞回想起来颇为可笑的“革命”。

参加那天的革命，我认识到意义是很大的。但是那时我——不止是我，而且可以说是所有在那天走上街头的青年，只是想到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各界人士、广大群众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反对汉奸卖国贼。“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后人总结出来的。1939 年毛泽东、刘少奇对这件事都有重要的论述。1939 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时，他们都发表了文章。在文章中把“一二·九”运动与红军长征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并提，并且把它们视作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分界线。毛泽东和刘少奇把“一二·九”运动评价得这么高，是出乎我意料的。同时也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运动，的确有一

种光荣感。

参加这天的游行，对我一生的进步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曾自己问自己，如果那天我舍不得耽误系里一天的课程，不去西直门，以后我会怎样呢？我想在清华那样的革命气氛下我还是会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但在具体进程上多少会有些区别，并且“一二·九”运动对我的意义不限于“一二·九”当天，而是从那天起直到1936年暑期大学毕业这几个月。我讲“一二·九”我的故事也就打算写到那个时候为止。

1.5 南下扩大宣传团

1936年1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对我的进步和影响很大。我同清华大学进步同学的结识，我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决定参加这个宣传团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这个团是共产党组织的，劝我不要去。他不知道我此时正想找共产党。“一二·九”后不久，我在清华体育馆的墙上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我站在那里仔细地读了，我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中国应该按照宣言里指出的路子走。人们越是劝我不要去，我就越是想去。

这个宣传团一共分四个团。北平城内各学校的学生组成第一团和第二团。西郊的学校，清华、燕京等校同学组成第三团。天津的学生组成第四团。四个团同时出发，的确是一个规模较大、计划周密的行动。说是共产党组织的，我相信。1月4

日我参加的第三团从学校出发。出发前知道清华这个队的队长是吴承明，还说全团应该有一个先遣小队，要清华的同学担任。出发前团长随便指定了5个人。我是被指定者之一，其他4个人中有一个杨学诚是我认识的。还有3个原先不认识，他们是李昌（当时的名字叫雷骏随）、张载、谷苞。说是要选个队长，有人提议李昌，大家都同意。先遣小队的任务是单独走在前面，在有歧路时用白粉（已经准备好一只装满白粉的挎包）撒出一个箭头来为大队指明前进方向，并且找到吃饭和过夜的地点，为大队准备好食宿。当全团集合组织就绪，出发时已经过了中午。

我们这个先遣小队走得比大队早，走得比大队快。当我们走到阜城门郊外一条土路时，遇见了英文时事报（The Peiping Chronicle）的外国记者。他们手中提着摄像机，要拍我们用白粉画箭头的场面，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想这样做能扩大宣传团的影响，是一件好事，就同意了。后来他们洗出了一张照片登在1936年1月7日的该报第一版。本来先遣小队是5个人，不知为什么照片里只有4个人，其中站立着的穿着棉袍的是我，还有一个蹲着的，我记得是李昌，他那天戴着一顶“航空帽”。这张登有照片的报纸前几年我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现复制一张放本书前。

第一天过夜的地方在芦沟桥。那天出发的时间比较晚，已经过了中午，因此我们只需要为大队准备晚饭。没有想到芦沟桥这个小地方的当局，听说我们经过那里，把城门给关了。进不了城，便只好找城外一个小饭馆用餐。我们决定为大队准备

的食物是烙饼和稀粥。这家铺子很小，只有一个炉子，一次只能烙一张饼。整个第三团有一二百人，一人两张也要三百来张。我们一到就让他们开始烙，当大队人马慢慢来到时，只烙出几十张。当时谁都不愿意先吃，一定要等饼烙齐了，一声令下才动嘴。可是走了半天，大家的肚子已经饿了。不知谁提议唱歌，全体响应，于是就用唱歌来转移饿的感觉。这次唱歌可以说是我唱革命歌曲的开始。在那个小饭馆里，谁也不去看别人，只顾高声歌唱。不会唱的也跟着唱了起来。歌曲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支用华北民间“打骨牌”的调子填写的歌曲。我不全记得，记得的有：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嗳海嗳海哟，关东起狼烟……”

“要问为嘛建伪国，革命打苏俄，反动大联合，嗳海嗳海哟，反动大联合。”

“苏俄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嗳海嗳海哟，人人都工作。”

“五年计划真伟大，全国工业电气化，赛过欧罗巴，嗳海嗳海哟，赛过欧罗巴。”

“因此列强暗结合，国际联盟商量妥，同去打苏俄，嗳海嗳海哟，同去打苏俄。”

“说是日本先开火，三省任他去宰割，列强助军火，嗳海嗳海哟，列强助军火。”

……

平心静气地说，这样一首从东北义勇军那儿传进关内的

歌调，对于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实在不正确，是以前党内左倾思想残余的表现，但是大家唱得很起劲。

还有一首苏联歌曲《工人歌》，据说也是苏联革命者利用原来的曲调填成的歌曲，我记得的歌词有“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团熏黑了我们的脸，火酒烧心窝，常见父亲打他儿子，丈夫敲他的老婆……”大家一面唱一面打闹嘻笑，“占便宜”者都不觉得饿了。

唱了相当长的时间，三百来张饼一齐烙好。一声令下“吃”时，烙饼却是冻得冰凉了。

睡也是个问题。找不到别的地方，就只能在芦沟桥城外的一所简易师范学校过夜。吃完烙饼之后，就在那个学校召集学校师生开会，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它的重要意义，帮助他们成立抗日救亡组织。

我们先遣小队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时间采取保暖的措施，就安排大家和衣睡在学生上课用的长椅子（这种椅子就是公园里常见的用木条钉成的那一种）上。每张椅子可以躺下一个人。为了防止人从“床”上滚到地上，就把四张椅子拼成一张带栏杆的“大床”，4 个人头对头地睡。1 月 5 日，已经到了小寒季节，进了二九，“床”是木条钉的，身下还通风，睡着睡着冷得发抖。我那张“大床”上的其他 3 个人都颤抖，唯我是冷而不抖。心想第二天一定有人会生病。毕竟是 20 岁左右的人，身体结实，第二天男女同学竟没有一个感冒的。

第二天清早，芦沟桥的城门还是不开，我们就离开芦沟桥向长辛店前进。清早走在路上，寒风刮得脸发痛。回头一看，

有一个同学鼻下的胡须变白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头发变白，使他得以蒙混过关，我心想这位同学怎么一夜胡子全白了，正在纳闷，看到胡子变白的不止他一个，仔细一看，原来是鼻子里呼出来的热气中有水蒸气，这水蒸气在鼻下的胡子上结成霜。问别人我自己怎样，回答说你的胡子重，完全是一个白胡子老汉。太阳在天空升高了，这些“白胡子老汉”又都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这一天一路走、一路做街头宣传，晚上和休息时找人开会帮助筹备教职员救国会或各界联合会。第二天中午从长辛店到达良乡，再经过窦店到琉璃河，住在镇内的一个完小，筹备各界救国会。第三天中午到涿县的码头镇，正好遇上那天赶集，开了个群众大会，晚上住在那里。这两天我们先遣小队对自己的工作比较满意，做到了让大队的人吃上暖的，晚上睡的地铺下面垫很厚的麦草，没让大家再挨冻。

第四天从码头镇到固安。一、二、四团比我们三团先到，食宿早已安排好，已经在固安北门外租好一个大车店（也叫马店）里的所有的房子，并且已经给我们第三团号好了房间，一到固安我们就住了进去，我们这个先遣小队暂时“失业”。固安县长已经接到北平当局的通知，说有几百个共产党要到固安来搞暴动，就采取同芦沟桥一样的办法，用四门紧闭不许进城的办法对付我们。城墙上还架起机关枪，由二十九军的一个连荷枪实弹守卫在城楼上。我们一到就在南门外做宣传，见到城墙上有群众在观看，有人就指着其中一个人说，他就是边英济，固安县的县长（未必一定是他）。不知道哪一位文学天才，

随口就用大家一直在唱的“打骨牌”的调子编了几句歌词，告诉了大家，一起高唱：

“一路那风霜那到固安，城门关了整三天，”

（然后一起用手指着那个我们假想的或者真的就是固安县的县长，接着唱）

“县长你王八蛋，嗳海嗳海哟，县长你王八蛋。”

固安城墙比起北平的要矮许多，唱的人多，声音高，那个县长一定能够听清楚。大家为此从愤慨转为高兴。

按照预定计划在马店举行四个团的全团大会。这样的会出发前在北平开不了，现在这个大会就在马店的院子里举行。会议开得很热烈，由各团代表报告各自的工作，留校同学也赶到那里介绍活动情况，决定以全团名义发出快邮代电，申述此次南下扩大宣传的意义，号召爱国同学深入群众、唤起群众。

这个会议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口号之争”，即对于我们的口号究竟该怎么提发生了原则分歧，有人主张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人主张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有人提出折衷意见，主张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三种意见都有积极主张者和支持者。各自提出论据热烈辩论，结果是大多数人明白了为什么只有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对现在的国际和中国的形势才是恰当的。这个争论实际上是使团员们受到一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教育。在清华我看过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明白这一点。

在固安大会期间，还发生这样一件事。那就是第三团的第

二大队(燕京大学的那一队)的第四小队提出,大家一路唱的那支《时事打骨牌》歌的词句是"赤化宣传",说我们是为了抗日而来的,不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宣传苏联来的。第三团的第二大队为此开了一晚的全体大会,我们第一大队的人没有参加,但是知道这个讨论会上,没有取得共同的认识,因而燕京第四小队的人不再参加宣传团,中途回到学校去了。我的看法是既然参加这个团是完全自愿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他们既然要回去,那就回吧,留在团里的人想唱这支歌还是可以继续唱。我倒有这样一种想法,在这样一群革命的积极分子中多宣传一点共产主义,宣传一点苏联有什么不好?后来才想,如果双方能够把道理讲清楚,争取他们不回去最好,导致"分裂"出一些本来是可以争取的人,我们做得是否也过分了一些?不过在那时要团员不去唱这支歌,这个工作也是很难做的。

马店会议后,全团向保定出发,计划在保定开第二次全团大会。我们是西路军,就经官村、涿县县城、松林,走了四天到高碑店。我们这个先遣小队又恢复了工作,但已经有了经验,不再发愁,一路上的工作方法同到固安前基本相同,留下的印象也就不那么强烈。

可是到高碑店后却发生了北平派来的大批特务要把整个三团押送返校的一场尖锐的斗争。

接触到而且记得很清楚的情况是,到了高碑店,在一个小学校里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早上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分别进行宣传活动,各大队又分作小分队到各村活动。一大队事先定好中午在高碑店镇上集中,我们先遣小队为全大队预定好

一个不算太小的饭馆用餐。到时候几十个人就集中在这个饭馆里吃饭。就在这时候有20多个便衣来到饭馆外边，个个都是强悍的壮汉，穿着灰布袍，外面是黑马褂，腰里揣着手枪，大声要我们出去集合，跟着他们回北平。因为饭馆地方狭窄，我们的人也比他们多，我们在饭馆里不出去，他们又不敢进来。于是隔着饭馆的窗户辩论，接着就动起手来。我们有饭馆里的碗碟做武器，他们当然也有相应的武器，这样双方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扬言如果我们不出去就放火。双方的斗争把饭馆掌柜和伙计吓得不得了，直跺脚。急得我们对老板讲，这些家伙只是说说的，不敢烧你的房子，毁坏了你们的东西我们赔。不过我们也怕如果真的动起手来，我们会吃亏，而且也不想连累饭馆老板。于是决定走出饭馆列队，向第一天住的那所在铁路西侧的小学校出发。出去后我们根本不理这些便衣，喊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走到小学校，我们第一大队的人就同第二大队的人会合在一起。这时候已经没有回北平的火车，他们也就让我们进了小学校。我们在小学校的院子里，这些家伙们有的在墙外，少数在墙内，把我们看住。这时候黄华把全团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提出发起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名称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要大家发表意见。我们不想让这些便衣听懂我们开会的内容，就用英语来讲，黄华提出问题后，一个一个地讲“I stand”。民族解放先锋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于1935年1月15日发起了，我也就成为这个团体的发起者之一（当然第一、二、四团在保定也发起了这个革命团体，因为这是党组织事先布置好了的一件事情）。离开高碑店时，我们4人一

排，手拉着手，高喊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上了火车，回到了北平，又列队到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的体育馆用北平话再一次讨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问题。

1.6 民先队友

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事实上早就已经成了第二党。加入CY 的人，他的觉悟程度和加入中国共产党(CP)的人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国民党反动派抓住CY 和抓住CP 也同等对待。于是在1935 年党中央决定停止CY 的活动，也可以说把原有的CY 解散，所有的团员都转为党员，CY 的团龄也承认为党龄。采取这样的措施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是需要有共青团那样的团体的，共青团是一个青年组织，使青年们在团内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团员应该成为党的后备力量。建国以后共青团不是又成立起来了吗？不过在“一二·九”运动时，党没有一个在自己领导下的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骨干的青年团体。于是，民族解放先锋队就在北方党的领导下，利用“一二·九”后的有利形势，抓住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的这个机遇，事先做好安排，成功地在高碑店和在保定先后发起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们就把这个团体看作“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大家有一种密切地团结在一起的情感。彼此间也以队友相称，甚是亲近。

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使我一下子摆脱了孤立的个人状况。在这十多天的活动中，我结识了不少清华的革命同学。

其中第一个是李昌，我们是一个先遣小队的。他到清华之前有过一段革命历史，在上海同济大学时是CY，被学校开除。又过了一段时间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年龄比我长半岁，因为有这么一个周折，在清华比我低了三年。“一二·九”时他还是freash man，民先成立后，由于他的高度革命积极性和组织才能，很快取得民先队员的信任，在队里做负责工作。我同他一直有密切的联系，有事就和他商量（我毕业之后去广州，他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也一直有联系。在广州我组织的团体被反动当局破坏后，也是他要我回北平做民先总队部工作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对我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我们来往仍旧很密切，许多事与他合作——不过这是后话）。

其次，我要说冯契。近些年他一直在上海师范大学教书，是个哲学家。那时他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中学时他学习很好，清华入学考试中他是全校第二名，不是状元而是榜眼。在扩大宣传团时，我和他一路谈得很投机。我一直很尊重他的哲学见解，从那时起我就看出他不是一个随着别人说话的人，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也是班次低，年龄不比我小。

再次，我想说一下杨学诚。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参加“一二·九”请愿与我同系的同学。在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后，同系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系里的一位教授在我们出发后问“我们系有谁参加了”，人家告诉他有我和杨，这位教授说：“人家共产党去了，郁钟正（我在学校里用的名字）和杨学诚去干什么？”这位教授不了解我和杨的思想倾向，只知道我们的学业

不错，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杨学诚进步得很快，在1937年初还去延安参加中央的会议。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我和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学校时就听说他患有肺结核，抗战中他终因过度劳累去世了。

我和黄昭彦（后改名黄秋耘）也是在扩大宣传团认识的。他是学外国文学的，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不过我们进一步地相互了解，是1937年在广州和香港一起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他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吴承明（他是第一大队队长）、蒋南翔、杨德基（杨述）、陶家痊（王超成）、何维登（何礼）、魏蔡一（韦君宜）等许许多多人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不但是清华同学，而且对燕京同学中的王汝梅（黄华）、柯华等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黄华，他是第三团的总团长，是用英文开的发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会议的主持人，印象更深（以后在武汉和延安，我同他又一起搞青年工作）。

总之，在民先成立后，我一下子有了许多民先队友。现在他们都是我的老战友。

还有这样一位清华同学，也是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结识的，彼此也很谈得来，他的名字叫蒋弗华，是个颇有才能也很会写文章的人。我同他也交上了朋友。后来他跟着徐高阮（徐芸）对党的路线政策不满。1937年春，我从广州到北平，一次去清华见到了他，他在我面前讲了一些不满党的意见，并且说要成立New CP（新共产党）。我和他争论了一场，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也是毛泽东他们那样的看法。”两个人就谈不下去

了。他当然不会加入民先(虽然他也参加了高碑店的会)。

1.7 镜子背后的禁书

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同学们回到了学校。民先队成立，并且按大队、小队组织了起来。没有参加宣传团的进步同学陆续加入。就清华一个学校的情况来看，抗日的力量在迅速增长。那时由于我不再是孤立的，就可以经常听到一些报上没有登出的消息，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在2月初的一天，我起得比较早，走出房门，在走廊上看到有六七本书。捡起来一看，都是很想看的宣传革命道理的书。它们怎么会被扔到走廊上?我一下子就明白，那就是这些书的主人知道形势紧张，放在自己房内会影响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就采取这种办法来处理。我看看走廊上没有别人，就捡起来往厕所跑。我们的厕所是许多个宿舍公用的，挂有三面镜子。我灵机一动，把这六七本书分别放在每面镜子背后。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现。这个厕所有三个马桶，分别在三个用木板隔开的“小房子”里，人在里面可以把门关起，别人打不开。我就拿了一本，坐在马桶上看，在站起来而厕所里没有人的时候，很快地把书放到镜子背后去。要看的时候，也是趁没有人在，从镜子背后取出一本，然后坐到马桶上去。那几天，我上厕所次数特别多，似乎是老泻肚，也似乎便秘。坐在马桶上一本一本地看，薄的一次看完，厚的两三次看完，这六七本书在几天之内就都看完了。有的书想学得更深一些，就看第二遍。

那些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有一本是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的摘译本，书上没有印这本书是斯大林写的，也没有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而是另外一个名字，讲的是革命战略策略问题；有一本是文艺方面的，书名是《新兴文艺概论》；有一本是专门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揭露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几个历史事例，把蒋介石称做新军阀；还有两本是残书，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很薄，都只有二三十页，看下去是讲长征和毛泽东的……这些书都是用明朗的无所顾忌的语言来写的，写得很透彻，看起来倒非常痛快，很“过瘾”。

看完之后，我仍然把这些书留在镜子背后。我只知道在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它，没有人动过它。看完后过了好几天，仍旧没有人动过。我也不再去管它们了，不知道这些书以后的命运如何。也不知道在我不再去读它们之后，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去读这些书。这些，我就不管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读它。

在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弄得不好是要坐班房的。但是这样的书革命者又不能不看，不看，提高不了自己的觉悟，又怎么能做一个有理论和政治觉悟的革命者呢？同时，能看到这种书也不容易。国民党有一个书报检查制度，有的书离现实远一些，也许不那么管。比如我就看过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翻译的文字很差，读起来非常吃力。而有一些书，则不能公开出版，或者公开出版了不许发行，成了禁书。越是禁书，人们一旦得到，看起来特别

认真，获得的印象特别深刻。这种书通常在革命者之间用很快的速度传阅，与革命组织有关系的人比较容易得到。

在“一二·九”前，我是个单干户，没有人传给我看。后来听说不少人看过这类禁书，其中有一本华岗的《大革命史》，看过的人都说特别有教育意义。加入民先队后暂时也还没有人传给我这种书。捡到这几本书我真是高兴。我通过这样的途径看过这样的几本禁书，的确是很特别的。不但当时很高兴，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挺有趣。我老想这几本书是哪个同学扔的，他一定住在新斋，但一定不是我们那条走廊的。看来他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其他的几本书上都没有字迹，只有那本《新兴文艺概论》上画有许多杠杠。

1.8　1936 年 2 月 29 日清华校园

这一天北平当局对清华学生的逮捕行动，应该说既可恨又可笑。这一天从清早到晚上，我整天做的就是参加对付这个行动的活动。他们出动了几千个军警，在清华园搞了一整天，黑名单上的人竟然一个也没有被捉去。写“一二·九”运动中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若不去写它，未免太可惜了。

这一天是星期六，本来是学校进行学期大考的一天。拂晓学生们还没有起床，半夜奉命潜伏在清华园周围的 400 名左右的军警，跳墙而入，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并冲入宿舍进行搜捕。我住在新斋，清早醒来感到异常，下楼走到大门口，见到军警把守着不许出门，同学们正在跟军警交涉，说我们要出去吃

饭，今天我们还要考试，你们不能不让我们出去。可是军警说是奉命这么做，只好委屈你们。双方争辩不休。我回到楼上，一看为了防止火灾而在墙上钉的可以爬下去的铁棍没有被军警注意，就告诉宿舍的同学。我们一个一个从那里出了新斋，同别的宿舍出来的同学会合，大家到大食堂吃早饭，一面吃饭，一面交流各自看到听到的情况。正在这时一个工友跑来说，二院已有同学被押到校门校卫队。大家听了便拥向校门，夺回了蒋南翔、姚依林等。当时出现的形势是团结起来的学生人数比军警多，行动果断敏捷，于是军警在一无所获后从学校暂时撤出。大家知道，事情决不会就此结束，军警们一定会再来，便在校门口筑起了街垒。这时候全校同学，尤其是民先队员，保持高度警戒状态，有的人上了岗楼观察校门外军警的动静。指定给我的任务是通过联络员告诉我出现紧急情况后去敲学校里的大钟，让全体同学特别是有守大门口任务的同学知晓。紧急情况解除也用敲钟的方法解除警报。有过两次军警要冲进学校的迹象，我敲过钟，可是他们又退走了，解除了警报。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最后一次听到传来消息，校外来了大批军队，人数多极了，估计至少 1000 人以上，正准备冲进学校，我们不可能实行有效的抵抗，要我从打钟的地方撤下来。到了食堂，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都隐蔽到新体育馆里，闭了灯在黑暗中坐着。

等了一段时间，在外面巡逻的同学报告，军队已开进了学校。又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军警到来。原来他们进入校园之后发现校园内的人忽然不见了，到处找都找不到，几千个军警搜

索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有人闯进新体育馆。电灯一亮，发现原来清华学生都坐在里头。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气氛中，大家不由得发出一片笑声，真好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带领军警的（据说是团长）大概没有见过这个“现代化”的体育馆，对体育馆的那些运动器械发生了兴趣，没有马上执行任务，先玩起木马来了。体育馆内的气氛并不紧张。

当然他们要完成任务。体育馆的同学好几百个，怎么从中把他们黑名单上的人认出来呢？一个人手上拿着一张纸，那一定是一张名单，让同学一个一个出来报自己的名字，一看不是名单上的就放行。同学们有的报真姓名，有的报假姓名，他们并不认识任何人，只好一个一个地放。最后他们一想，都放了自己无法交账，于是就随随便便地抓了几个看不顺眼的人——言语顶撞的，眼睛瞪得太大的等等。甚至个别同国民党有关系的学生也被抓走。从清早起一直到晚上 9 点多钟，他们可真辛苦，可是战果却等于零。

那么他们要抓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躲到教授们家里去了。这些教授大都思想并不左倾，但是爱护学生，就把学生藏在家里。后来听说他们要抓的蒋南翔躲在锅炉房里，穿上工友的服装，脸上抹了一把煤灰，军警搜到锅炉房，蒋还给他们倒水，那些军警就走了。

后来还听说一件事，生物系有个同学叫薛容的（后来改名薛公绰，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在我们医务部门工作），是个一头扎在书本上的学生。2 月 29 日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照常到实验室做他的实验，一直弄到晚上 11 点多钟，竟然忘了军

警清早闯清华这件事，吹着口哨骑车回宿舍，在路上正遇到找不着学生不好向上交账的军警，不由分说把他抓去了，囚禁了一个多月。他释放出来见到进步同学，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参加革命！”

1.9 啃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这件事也是我的一个特殊的经历。

在1936年以前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点零零碎碎的知识。对它有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认识是在1936年上半年认真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之后。从初中开始我就喜欢哲学，在上海大同上高中和上大学时，看过不少关于自然哲学的书，应该说那时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很杂乱的。看了这两部书，我才明白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我觉得与以前读过的那些哲学书相比，这两本书讲的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我也觉得这两本书里讲的道理对我要从事的物理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读了这两部书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没有发生过动摇。

我怎么会读这两部书？我读的这两部书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件事我得感谢张申府先生。

张申府是清华的哲学教授。他对学生运动很同情。听说在“一二·九”那天，他虽然没有和同学们一起游行，却进了城，在一条学生游行示威队伍必定经过的街道找到一家临街

的饭馆，坐在楼上靠近窗户的一张桌子旁边观看。1936 年上半年我选了他开的“形而上学”这门每周只上两小时的课。在课堂上他常常离开课程去讲时事，把启发学生去搞抗日救国的斗争看得比传授“形而上学”的哲学知识、介绍自己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课堂上认真听他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等等。他接受的是维也纳派的哲学观点，但这些都不是我要在这里讲的。我要讲的是申府先生为学习这门哲学课开了一张十几本参考书的单子，交给学校的图书馆。清华大学的规矩，教授们开的参考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要把它们从书库里取出来，放在阅览室，同学们去看非常方便。这十几本书籍中就有恩格斯和列宁写的这两部书。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遭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当时我就听说过有一个学生因为手持一本“马氏文通”——那是一本讲汉语文法的书——就被拘捕），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学习参考书是要有一点勇气的。不过他开的书单上的那两本书都是英译文。我就在清华大学的阅览室里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做了笔记。那时我的理论水平很低，但还是被这两部书说服了，解决了原先我认识不清的许多问题，真有陶渊明所写“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感觉。我读这两本书对我一生产生的影响很大。我想，我早晚会读的，但是如果不是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他那门“形而上学”课程的参考书，我就不会在 1936 年上半年就读到它们，对我来说，早一天读到总比晚一天好。

1.10 要不要毕业

1936 年清华第八级的学生将要毕业，那时候党员和民先队员在毕业还是不毕业的问题上都有所考虑。蒋南翔是我同级的同学，也是“一二·九”时最高班的学生，他就争取不毕业，留在学校里当一名学生，因为学校有比较好的从事革命工作的条件，周围有群众，活动方便，生活条件也可以，于是他从八级转到九级。我在 1935 年暑假后跟周培源老师写学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广义相对论，是他出的。开头我还能集中一些时间去考虑有关论文的问题，后来华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别在“一二·九”以后，实在安心不下学习和研究，没有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钻研论文中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周老师对工作是很负责的，抓得也很紧，每月都要把我叫到他家里向他汇报。汇报后，周师母总是留我在家里吃一顿饭。可是因为我没有用多少时间去做研究，汇报不出个什么，实在不好意思，总是临时想几个问题和老师讨论。最后的结论常是 rather troublesome（相当麻烦）。这样论文进展的速度就很慢。离 1936 年暑期越来越近了，究竟要不要毕业的问题必须做出决定。这时候我已放弃继续深造争取当一名大科学家的愿望。做学者还是做革命家的矛盾已经最后解决。但是家境贫困，母亲等着我毕业后有一个正规的职业，从而有可靠的收入维持家用。从这一点来说，我应该争取毕业。可是那时我已经下决心把革命工作放在前面，别的问题可以不管。我把我该不该毕业这件事同李昌和

民先队里别的一些朋友商量。他们都说像我这样的人，以后不一定就在北平干革命，外地也迫切需要有人去开辟工作，而且也不一定都做学生工作，毕业了和学生以外的人接触也很有意义。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完成论文的问题。这篇论文中要求算出四个未知数的数值，可是只有三个方程式，需要做一个物理学方面的假定。究竟应该做怎样的假定，一直拿不定主意。如果不想毕业的话，我可以在学校里再呆一年，把论文写得更好些，可是听了李昌的话，我不想再在学校呆了。于是在论文写作上采取避开写论文中最困难的问题的方针。这样做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方针已定，就不能采取会导致论文写不出来毕不了业的办法。于是我不得不投入较多的时间去写论文。

1936 年上半年，我没有再去申请浙江兴业银行的奖学金，半年中少了 200 元的收入。于是不得不在城里的艺文中学教高三物理，每星期进两次城。教书再加上写论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我虽然积极参加，但是投入的时间不得不少了一些。经过最后两个来月的努力，论文总算完成了。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在那时没有毕业后会失业的问题。还没有毕业，就都有地方来请了。广州岭南大学教务长冯秉铨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向清华要一个本届毕业生。我愿意到北平以外的地方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民先队，就表示愿意到那个学校去。1936 年暑假我离开清华开始自己新的工作。

“一二·九”中我的故事，就写到这个地方为止。

2　1936 年夏在上海

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我打消了留在北平做救亡工作的念头，接受了广州岭南大学的聘书，决定到南方去搞救亡运动，开辟民先队的工作。于是在1936年6月，我告别了生活了两年的清华校园，动身南下。

岭南开学的时间是8月底，路过我的家乡上海，还可以有一个多月时间的逗留。时间非常珍贵，我就抓紧时间在上海工作。

1936年和1935年两个暑假，我有很大的变化。1935年我从事“革命”活动时，完全是自发的性质，同任何组织都没有联系，只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同党不论直接或者间接都没有联系。我只是同好友程淡志两个人在一起活动。现在不一样了：我参加了民先队的发起，而民先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我的活动也就具有“有组织有领导”的性质。在北平我已经有

不少同志，我的重要行动都和同志们商量决定。

在离开清华时，我知道韦毓梅要去上海。韦毓梅和我是同班，似乎也是上海人，1936 年毕业后回到上海。她热心于革命，也很老练，我猜测是共产党员的同学中的一个（后来听说她是清华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我主要的工作岗位虽然不准备定在上海，但上海是我的家乡，我对上海的革命工作很关心，想尽一点力。因此在离开北平前，把她的住址问清楚，一到上海，我就去找她，听听她对在上海开展工作的意见，希望同她经常建立联系。那时上海抗日救亡革命群众的组织形式是各界救国会，民先队在上海没有地方队部，上海的同志也不准备建立民先队。我和韦毓梅商量的结果，在上海建立和发展民先的事暂时放一放为好，把抗日救亡工作开展起来是根本的，什么组织形式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她告诉我，她就打算留在上海工作，想深入到女工里面去。后来她果真留在上海，一直到抗战爆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去苏北，改名孙兰，当了一名女县长。建国后又在上海教育局做局长（或副局长）。上海老人中我想会有人知道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自杀了。

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有几个家庭中很多人都是积极分子，因而很有名气。一是“力”家，力伯皖、力伯法、力伯长、力伯良、力一洲；二是“叶”家，叶笃廉、叶笃正、叶笃成……三是“方”家，方琦德、方珂德、方璞德、方官德、方成德……琦德、珂德是清华同学，他有一个弟弟方璞德在上海复旦上学。我认识琦德、珂德，不认识璞德。我毕业后去上海前，把他的住址问清楚，到上海后我去复旦找到了他。这位方璞德，

就是建国后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有一次我去上海，同杨永直闲谈时回忆起我们初次见面还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因为彼此没有见过面，怕有什么诈骗在里面，后来也释然。我找他也是商量在上海的工作……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还找了些别人。

上海我最好的朋友当然还是程淡志。他在这一年中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影响，参加了上海开展的救亡运动。他联系的人相当多，首先他参加他所在的大同大学和附中的活动。大学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很积极，邹强、侯德齐……，中学的更多：吴学毅、孙少礼、孙幼礼、周家鹏、丁瑜、朱凤熙……。大同大学的学生组织似乎没有一个名称，但是团结得紧密，在校内校外都积极开展活动，在校内出了一张墙报。我一到上海就跟他们一起活动，用笔名写了一两篇墙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写起诗来。我写的诗体裁和思想都远学马雅可夫斯基，近学田间。不止我一个人写，几个朋友都写。大家都起了些笔名，那时“革命”得不得了，连起的笔名都是很“革命”的，离不开红呀、坚呀等等。

1936 年暑假我在上海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参加党团结的自然科学界的第一个外围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

我是经过程淡志的介绍参加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这个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八仙桥的东方旅馆包一个小房间。每人拿两块钱来付开房间的钱。这次会议到了章汉夫、廖庶谦、孙克定、钱保功、程淡志等，连我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会议由章汉夫主持，宣布研究会成立。他说艾思奇同志是这个研究

会的发起人，还说艾思奇本人就是学自然科学的，不过他有别的更加重要的事，不能来。那时候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发行很广，拥有很大数量的青年读者。我原以为他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从这个会议主持者的谈话口气中，我听出艾思奇是这个会的主要发起人，而且他有相当高的威望。

我参加的这次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是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后的声明，会上对这个声明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这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完全是政治性的，同自然科学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次、第三次会议是在法租界震旦中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如果记得不错，当时震旦中学的地点是在“环龙路”。这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倒确实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那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笔记等已经得到苏联共产党的重视，并在苏联发表出来了，但是还没有中译本。因此研究会就选了辛垦书店出版的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学新论》翻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引了不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这些论述我是第一次见到，很感兴趣。

在上海文化界，党的外围组织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左联、剧联等。音乐界、电影界也是有组织的，只是我说不准它们的名称。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社联。还有世界语、新文字（拉丁文）方面的团体。这些文化界党的外围团体当时我知道一些，说不全。党团结自然科学界的外围团体在上海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之前还没有。过去党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影响不

大，愿意在党领导下奋斗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较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要少，因此也就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党的外围组织。“一二·九”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多起来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就是在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到自然科学界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党在自然科学界中的基础毕竟很薄弱，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只是表明党也想在自然科学界中开展工作，使他们能接近党，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吸引他们到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可是当时在党员的队伍或者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还没有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只有一些原先学习自然科学的党员和正在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拥护党、愿意接受党领导的青年。不过这个研究会虽然还只能吸收这样的一批青年人参加，但他们有许多自然科学界的朋友、老师、同学或者某个自然科学部门的同行，可以通过他们扩大党和自然科学界的联系。我虽然没有问过这个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的想法究竟如何，但是在介绍这个会缘起的第一次会议上使我做了这样的理解。

为了使自然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学习自然辩证法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所以这个研究会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强调学习恩格斯的论述。

这个研究会成立后，与新知书店商量出一套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通俗介绍自然知识的丛书，并提出一张书单。书店的同志还把研究会的人请去，要大家讲都可以写哪几本。我答应写这套丛书中的两本。可是我去广州之后，书店一直没有和我再联系，我也没有写，始终不知道这件事有何结果。到广州后，

我也没有同这个研究会取得联系，它在1936年下半年以后的工作我也不知道了。

后来知道，在1935年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被破坏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文委的同志还在工作，用文委的名义活动。这一段时间上海进步文化界的活动，包括社会科学界、出版界、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做了大量的带有对群众进行启蒙教育性质的工作，促使“一二·九”运动走向深入。后来知道当时在文委工作的同志有周扬、夏衍、钱亦石、章汉夫、吴敏等人。章汉夫、艾思奇等发起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会肯定是文委布置的一项工作。

关于艾思奇我想在这儿写一些。

我与艾思奇间的关系经过五个阶段：闻名、见面、相识、同事和朋友。他的《大众哲学》出版时，我还在清华图书馆里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的英译本。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两本书真好，可是一般的青年看不懂，我希望有一本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通俗读物，给广大的读者讲一些如此重要的哲学观点。就在这时候看到《大众哲学》，我很高兴。清华同学中对它的反映也很好。但是也有几个同学认为这本书“肤浅”“简单”“庸俗”，我反对这种缺乏群众观点的说法，同他们辩论，结果没能说服他们。这个时候我对艾思奇只是“闻名”。

在1936年夏天，由于自然哲学研究会成立会他没有去而没有见到他，但是在震旦附中教室开的会，有一次他去了。那一天他到会比较迟，我在会上已经发过言，也没有人把我介绍

给他，因此我想他肯定不会认识我，可是我却见了他的面，因此这一次是见面而未相识。在他到会那一天，我原以为他一定善于词令，发言生动活泼，没想到在会上他只提了两个自己不那么懂的问题，完全是学习者的态度，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和艾思奇的“相识”是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我和他成为同事是1946年我从北平《解放报》回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我和他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

我原先听说他是学生物学的，最近才弄清楚他是学习采矿技术的。

3 1936年在广州的日子

3.1 初到岭南

1936 年前，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国的南方，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去广州，这件事的本身就使我很兴奋。

我走的是海路，坐了“J(日本)C(中国)J(爪哇)L(航线)”的客轮。这么大的海船我也是第一次坐。它比我坐过的太古公司的从天津到上海的轮船大多了。坐在这么大的船里，海浪对我没有造成不舒服。我经过香港到了广州。

岭南(我国五岭以南的广阔的国土)和岭南大学的校园，给我的印象非常之好。亚热带的植物——香蕉、棕榈、椰子……是在上海和北京看不到的。那时岭南校园内有不少木瓜树。它结的果子在广州是有名的。我去了不几天就吃到它，鼻子闻时相当的臭，吃时却很甘美。这也是在北京没有尝过的。还有洋桃对我来说也很新

鲜。

向清华物理系把我要去广州的是冯秉铨教授。他也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记不清比我高多少年级。这时他是岭南大学的教务长。我到校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很热情地介绍了大学和系里的情况以及准备让我做的工作。系里的同事不多，冯秉铨也在系里兼课。除他之外，还有一位褚圣麟教授。他和我同住在陆佑堂。我是助教，比他的职位低得多。可是他住的房间同我的却完全一样，也是一间单身宿舍，而且是同一条走廊里面对面的两间。我们每天见面，每天闲聊。因为住得太近了，我的心思不在教学和研究，而在救亡运动上面，虽然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我想他是会观察出一些来的。褚圣麟在建国后有段时间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有一位讲师王子辅，他是汕头人。他在系里的工作同我完全一样：各教一个大班的微积分、各管一个班的物理实验。我和他接触也比较多。我经常从康乐坐船去广州。在广州的汉民路买回上海出版的各种进步刊物。王子辅很少进城，我把看过的刊物给他看，然后听听他的看法。我虽没有暴露我的目的和行动，但在系里我同他还是有些思想交流的。他前好几年就退休了，现在在北京儿子家住。

还有一位助教就是后来冯秉铨教授的夫人高兆兰，我们当然也经常接触。高兆兰后来是广州的名教授，有相当高的造诣。

我不会讲广东话。好在同事们全会讲普通话。同事们交往，语言上没有困难，不过给学生上课用国语是不行的，尤其

因为学生中有十来个外国人，只好用英语上课和用英语同他们对话。

物理系主任是美国人，聂布博士。我同他的交往很少。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可是我在每周一次的系内的讨论会上偏偏选了一个“物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为题目做报告。我在清华读过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这本书中讲到物理学的地方很多，我认为讲给学物理学的人听听会有好处。在我的讲话中，对宗教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使聂布很生气。我报告毕，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 why，向我提出问题。想起这件事，觉得有些好笑，讲话要看对象，在那样的场合，我当时何必一定要讲这样的题目呢？

同学们的政治觉悟与清华不好比。有些华侨连国内的情况也很缺乏了解。一次一个香港来的学生问我，他想用一个周末（一天半的时间）去逛长城，该怎么走？那时没有广州到北京的飞机，而且实行的是一周六天的工作制，用周末去长城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个也是香港来的学生，谈起广州海珠桥下有许多穷人在那儿露宿时，他就对我讲，香港没有穷人。我问穷人哪儿去了，他告我被驱逐出境了。我感到在这个学校内开展救亡活动，颇为不易。

我住的那个陆佑堂宿舍靠近校园的围墙。墙外面就是凤凰村。我就在那儿吃包饭。第一次他们给了我一碗冬瓜汤，很淡，汤里有两个红枣，一片中药白术。喝了奇怪：这算什么汤！可是经常喝，也喝出了味道，越喝越爱喝，至今还觉得它的好味道。我对广州的王老吉凉茶也感到特别。

凤凰村有一个演粤剧的剧场，离我的宿舍特别近。于是我天天免费听戏。久而久之，居然也听出那些天唱的是《红楼梦》："林黛玉独自在潇湘馆，思念着宝哥哥……"

这一切都是我初到岭南后的印象。常住在广州的人看来是最平常的事情，对我来说很新鲜，别有一番感受。

3.2 上演不了的《少奶奶的扇子》

我去广州的目的是在南方开展革命工作，特别是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民先广州队部。可是刚去广州时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就只有开始在本校的学生中进行工作。

岭南大学是一个"贵族学校"，家庭生活不富裕的一般来说进不了这所大学。我知道在他们之中进行工作不容易，不过我还是抱着希望。那时我很年轻，才21岁，在年龄上与同学们差不了几岁，我又是有意同他(她)们接近，没多久就同他(她)们熟起来了。我了解到他(她)们爱玩、爱活动，我出了个主意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话剧队，搞演出，并且说自己曾经导演过话剧，虽然不高明也可以试试。我这么说完全是冒充的。我与演剧完全不搭界。为了在学生面前装懂，就去汉民路买了几本关于戏剧的书回来，有剧本也有关于表演技巧的。他(她)们给我说动了，组成了一个剧团，一下子有许多人参加。我总算联系了一群青年人。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我毕竟对演剧是完完全全的外行。选剧本比较好办，我选了那出《少奶奶的扇子》。这本书的译者、

大戏剧家洪深那时就在广州。再下一步怎么办？马脚总是会露出来的。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缓冲的办法。我对参加“剧团”的人说，“话剧是要用国语说话的，我们先来学学国语吧”。那时不但从香港和从国外回来的学生不会讲国语，就是广州本地的学生也不会讲国语。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要用国语来演剧，就得花不少时间去学，而我教他们国语，自问还是够格的，于是每周我就在学校里教国语。《少奶奶的扇子》就成了国语教材。

这一项活动如果进行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个剧团还是会办成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广州举行了鲁迅逝世的纪念会后，我结识了当地一些青年，他们的政治热情比起岭南那些青年来说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而且我新结识的青年越来越多，就开始组织革命团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我活动的重点就到了校外。那个国语班我还在上，但已经不那么热心了。到1936年寒假前考试和放寒假中断了一阵子，我也不觉得可惜。而寒假过后我们那个团体被广州国民党当局破坏，我在岭南大学已经呆不下去，这《少奶奶的扇子》能否演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3.3 卡拉科夫

在岭南大学教书时，我想从俄文直接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于是经过日本东京的科学书店（用的是俄文 Наука 的

译音)邮购到一本列宁的《两种策略》和一本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同时也买了一本苏联出版的《供说英语的工人用的俄语读本》和经过岩波书店邮购到一本白杨社出版的《露和字典》,打算在这个读本学完后就开始查字典读这两本原著。我相信用不很多时间,可以达到能阅读原著的程度。

可是我又有了一个向俄国人学俄语的机会。这个俄国人名叫卡拉科夫。他是我的学生。在岭南大学物理系学生中,有好几个外国人,卡拉科夫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卡拉科夫的年龄大概比我小两岁,他的父亲是俄国商人,十月革命时在国外,没有直接受到冲击。据卡拉科夫说,他父亲还保留着俄国的国籍,但是不愿回国。而这个青年卡拉科夫是个希特勒的崇拜者,可自己又说不出为什么崇拜希特勒,只说了一条:希特勒重视体育,1936 年在柏林举行了奥运会。我和卡拉科夫熟起来,就是他经过我向实验室借马表去测定奥运会赛跑者的纪录。我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我教他中文,他教我俄文。他从香港为我买了一本俄语读本,内容是英籍俄人斯丢瓦特先生和夫人到俄国旅行期间在各种场合的会话和交流用语。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政治倾向,只表示希望学习俄文。他教我俄语的办法一开始就要我背一个急口令——特别绕口的几句话,他说这样做可以避免说话时不流畅。那个急口令的内容便是"希腊人骑了马过一条河,在河中见到了螃蟹,伸手去抓螃蟹,被螃蟹在手上咬了一口。"这几句话中卷舌音的字很多。他教我的别的东西忘了,可是这个急口令还记得。

受到他的启发,我在学那本《工人俄语读本》时,朗读每节

课文时就用马表记录所用的时间，看是否越念越快。不过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当局要抓我，我离开了岭南，结果我的俄语未能学成，至今一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都没有读完。

为了利用买回的《露和字典》，我又去汉民路附近一个姓谢的人那里学日语。每周学一晚上，三个月包我学会。我去学日语，使我少进一次监狱。因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来抓我们那天，我正好去学日语。

也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抓我，学俄语的计划没有完成，1937年我仓促离开广州时，没有能把这些书带在身边。1938年我去广州时，一位岭南大学的同事把他保存得好好的这些书还给了我。可是它们又在广州沦陷时失落了。

3.4 广州鲁迅逝世纪念会

1936年夏天，在上海时，如果我努力，也许可以争取见到鲁迅一面。当时我想他的年龄并不大，总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不必忙着设法去见他。没有想到当年秋天他就去世了。噩耗传到广州，文化界人士很快就在中山大学附中礼堂举行纪念会。我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得到邀请就去参加了。

当时中山大学分两个地方上课，理科各系在石牌，文科在市内，不是在文德路就是在文德路附近。我记得的广州的路名有限，但是这个地方大致的位置还是能说得出来。鲁迅纪念会就在市内中大的礼堂里举行。现在这个地方成了中大附中的所在地，而那个礼堂和旁边的几间房子就成了鲁迅的博物馆。

那天我到得很早，会场上到的人还不多，我就在右侧找了一个靠前的座位坐了下来。抬头看到会议的日程贴在墙上。后来人到得很多，会议按照议程进行。洪深、尚仲衣等广州著名文化界人士一个一个讲话。在这之后有一项议程是自由发言。这时我走上了讲台，讲了一番话。我说的是普通话，而且情绪很激动。我这个陌生面孔和我的情感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讲完后就有4位青年走到我跟前要同我建立关系。这4位是中山大学学生物的李康寿和在仲恺农工学校读书的杨宗锐（现改名杨明）、黄裕梅和凌云衢（后来这4位就同我一起去做组织一个革命团体的工作）。这时候我在广州岭南大学已经工作了两个来月，在校内也开展了一些学生工作，但是效果不显著。在鲁迅纪念会上认识了这几位革命青年之后，我在广州的革命工作就逐步开展起来了。

在这个鲁迅纪念会上，我还朗诵了我写的几首纪念鲁迅的诗。1936年暑假在上海我忽然有了写诗的冲动，在短时期内写了大约有二三十首诗。诗是“远学马雅可夫斯基，近学田间”。这些诗当然是很不像样的，后来把它们统统忘记了。我觉得统统忘记了很好。天晓得怎么还记得一句：“鼓风炉里吐出了火舌头。”在鲁迅纪念会上朗诵的那几首（是几首也记不得）被黄裕梅拿走，在他们编的一个学生刊物上印了出来。这是前几年见到黄裕梅时他告诉我的。

广州的鲁迅逝世纪念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去参加这个纪念会或者不去参加这个纪念会使我一生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1986年鲁迅逝世50周年时，我提议给鲁迅塑造一个铜

像，现在它就立在广州图书馆的院内。铜像背后刻有一段话，其中就提到我热心制作这个纪念物的事情。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时我到了广州，杨明也去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把黄裕梅找到的。他在广州一所学校里教书。李康寿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凌云衢1938年在翁源公路上遇见过，以后失去了联系，不知道还健在否？

在这个纪念会上讲话的洪深是左翼戏剧界的前辈。我与艺术界很少往来，但是在纪念会那一天能够见到他还是很高兴的。当时我没有进一步与他交谈的愿望。尚仲衣是个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教授，我有些问题想向他请教。纪念会后有一天，我曾到尚仲衣教授住所找到了他，谈了不长的时间。1938年我又一次去广州。广州沦陷，我经四会到翁源工作。1939年初又到了韶关，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这时候尚仲衣也在韶关，他租了一条船，泊在韶关的江面上，以船为家。他同我在船上做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平常不吃鱼，可是他每天在船上吃的都是船娘做的菜饭，我们谈话那一天船上正好钓起一尾两尺来长的鱼，所有的菜都是用这条鱼做的，我也就破戒吃了一顿“鱼餐”。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也去过翁源。他还在翁源遇到过参加托派的杜畏之。从那次见面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以后的情况我也一直不清楚，只知道他早已去世了。

198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我为在白云楼建立鲁迅纪念馆的事也热心了一番。我到了鲁迅在白云楼住的那所房子，我去的时候还有住户在那儿。我向广州市的领导提出

建议，把住户迁出去，再请教一下在白云楼见过鲁迅的老人，在那里建立一个纪念馆。鲁迅的铜像在纪念日前夕落成了，白云楼纪念馆，隔了几年听说也已建立起来了，不过建立后我却没有去过。

3.5 有待亮出旗号的民先广州地方队部

鲁迅逝世纪念会后，我的活动中心就转到了校外。

我同李康寿、黄裕梅、杨宗锐、凌云衢商量好马上行动起来，在广州组织一个团体，分头发展成员。李康寿介绍他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霍英。仲恺农工学校本来就有六七十个学生团结在一起，除我见到的黄、杨、凌三位外，还有梁展智等三四个人。我在仲恺农工学校的宿舍里同他们见了面。他们全部愿意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中来。我常去汉民路几个书店买杂志，同开明书店的店员谢恩昆交上了朋友。他是上海人，我的同乡，是上海总部派到广州来的。经过谢恩昆，联络了汉民路其他几个书店的店员，每个书店吸收一个人，就有四五个人。力伯皖是 1935 年暑假在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到广州国际广播电台任职，没有能参加北平“一二·九”那天的游行，但同北平“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有经常的联系，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我从北平得到了他的地址，找到了他。他就成为我们这个团体的一员。清华大学的同学王良恭，他是我在北平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我因少读一年中学，到清华后就比他高了一班。他是“一二·九”参加者，民先队员。他的父亲王鹤清是北

师大化学教授，教过我和王良恭师大附中这一班的化学。1936年王鹤清到广州来担任勷勤大学校长。王良恭在清华还差一年大学毕业，也就跟着他的父亲到广州。他是我们这个团体的当然成员。他还介绍了勷勤大学的一位 miss 梁。记不清楚通过什么关系，我们同广州河南纺织厂的几个女士也联系上了，而且同士桥乡的农民也发生了联系。我去过两次广雅中学，找了一位同学，希望他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中来。广雅中学在广州是很有名的中学，历史上也出过不少革命者，我希望通过他团结一批同学。我们这个团体那时人数虽少，加在一起不到30人，但是有各方面的人，每个人的周围还有不少人，很有发展前途。同时我们还在自己团体之外联系了不少朋友，其中以中山大学的人多一些，也有一些文化界的人，使得我们的团体不再是孤立的。总之只不过两个月的工夫，这个团体就初具规模，大家对这个团体的发展充满着希望。

1936年下半年，在北平召开了全国民先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性的民先组织。原来民先队的名义就是“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七个字的上面不再有什么限制词。代表大会后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且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全国总队部。李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队长，并且通过了章程，全国各地成立起来的组织称“地方队部”。全国总队部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章程寄给了我。在这之后，我同李昌的联系就成为同全国总队部的联系。我在广州建立起来的这个团体，实质上就是民先的广州地方队部。我经常同全国总队部联系，接受总队部的指导，民先队的文件包括它的章程我都

给我们这个团体的成员阅读与研究。我还经常把北平民先总队部的事讲给他们知道。参加我们这个团体的全都知道这个团体同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关系。也可以说有不少人就是冲着这个关系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中来的。广州有一些没有参加我们这个团体的人，也很看重我们同北平的这种关系。我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民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布置下成立的，是党领导的，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同我们这个团体发生关系，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同中国共产党发生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团体之所以在一个多月中发展得很顺利，这一点是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我主张稍晚再打出民先广州地方队部的旗号。我想等力量再强一点，对参加的人的情形了解得更多一点，把地方队部建设得更好一点时，再亮出这块金字招牌。

工作不能等待，除了在团体内部提倡读书和歌咏等外，我提出办一张小报。报名定为《一条心》，取其团结起来救亡抗日的意思。我主张把这张报纸办得很通俗，当地工农群众能看得懂，因此主张用广州话来写。广州话有许多字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有的字与普通话相同，但读音不同，用法不同。比如在广州话中有“乜”这个字，读音同北方话中的 miē 相同，但意思与北方话的“什么”相同，用得很普遍。“乜嘢”就是什么东西，“乜”这个字普通的字典中有，可是“嘢”这个字就没有了。我不懂广州话，要用广州话办这张《一条心》，就有一个学习的问题。我买了一本广州话读本来学。这本《广州话读本》是用传教士创作的“道字”注音，道字的原理同速记符号相近。我至今还记得

那本广州话读本第一课的课文:“人,唐人(中国人),西人(外国人,不知道日本人是否包括在内);书,唐书(中国书),西书(外国书);呢个(这个)唐人读唐书,个个(那个)西人读西书。”同时我买了一些用广州话出版的报纸来专门收集广州字,做了不少卡片。我希望这张报纸能在两个月后(那就是1937年2月)创刊。因为我们把办这张报纸当作开展我们工作的主要工具,每次开会碰头都谈这件事,因此大家也常常用“一条心”称呼自己的这个团体。

3.6 杨匏安夫人

1936年11月后,我在广州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在这个青年革命团体中有一位是杨宗锐。他是仲恺农工学校的学生。由于他普通话(那时叫国语)讲得好,而我不会讲广州话,我出去活动时就常常找他一起去,帮我翻译,因此我同他就比同别人要接近一些。

有一次,我对他做“思想工作”。我说“我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如何……”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没有想到他说:“我不是在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这样我才问他的家庭状况。他说,他家是中山县农民。他的父亲就是杨匏安。杨匏安是很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而且是党中央委员。1931年他35岁那一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注)。杨宗锐小时候一直同他父亲一起生活,过的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困苦的家庭生活。

我再问他的母亲。他告诉我，他母亲和父亲是在家乡结婚的。他的母亲姓吴，叫吴佩琪，也是中山县人。1918 年全家搬到广州，住在一个叫杨家祠的地方。这个杨家祠就是他的家乡中山县南屏乡北山村姓杨的人家在广州兴建的祠堂。他们全家在那里住了几年，杨宗锐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杨宗锐的妈妈从他丈夫和同志们的谈话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她还跟着她的丈夫去过外国，对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得不少。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做的事是正义的、光荣的、很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她见过的革命同志一个一个地牺牲了，她怕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最后她的丈夫还是被杀害了。

杨匏安的家本来就穷。丈夫死后，孩子又很多，生活很困难。她的大儿子在香港一个小店里打工，二儿子（就是杨宗锐）在仲恺农工学校读书，那个学校不收学费，生活也有补助，其他的孩子在中山乡下。她自己有病住在广州。

听了杨宗锐给我讲的这些情况之后，我对他的父亲产生了一种崇敬的感情，对他的母亲也很同情。于是我就要杨陪我去杨家祠，看看他的妈妈。

1937 年 1 月的一天，我去看她了。

我看到她住在杨家祠一间很大的大厅里。我没有看清这个大厅里住有多少人家。我的印象有许多家住在那里。杨匏安夫人住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一张凳子这么大的空间。她住的地方同别人住的地方之间没有墙壁，而是用柜子隔开的。

我们去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大概她的病不能下地，主要是卧床。她生的是什么病，杨宗锐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血崩”。我想大概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子宫癌。但是又穷得没有钱去治疗，而且还要赚点钱过日子，因此还在劳动，躺在床上剪放在面条上的红花。剪 100 个只有几分钱的手工钱。我去的时候她手中正拿着剪刀在做活。

在她儿子把我介绍给她之后，她让我坐在那张凳子上，她对我说了一句：“现在的世界真不好。”她一下子就讲到世界，的确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的口气。我听了很激动地对她说：“世界不好，我们就要把它翻过来。”我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带了我这样一个从北方来的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发出要把世界翻过来的这种豪言壮语的人，有着丰富经验的她，一下子心里可能明白过来——她的丈夫后继有了人，显然是得到了一种安慰，但同时又很担心自己这个儿子的安全。她对我苦笑一下，说了一句“宗锐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再没有多讲。

她显得非常衰弱。我算了一下，五年前杨匏安去世时才 35 岁，假定他们夫妻的年龄相近，那么她的年龄也就是 40 岁左右，可以说还属于中年的范围。但是她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六七十岁。那天她似乎不想多说话，我想多说一些。可又考虑到我们在一个完全不隔音的地方，不能多谈什么，因此坐了一会儿之后，只好匆匆告辞。临走时，我握着她的手，不知说些什么好，只说了三个字“你放心”，就同她分手了。

我这次见到她，从见面到分手，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是留

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一直想着她说的那句“这个世界真不好”和我说的“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翻过来”。我说的这句话，仿佛是我的一句誓言。

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这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最后一次见她。不但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杨宗锐最后一次见她。出了杨家祠，我和杨宗锐分手，他到仲恺农工学校的同学黄裕梅那里去，我到汉民路去学日语。没过多久，杨在汉民路的书店找到了我，满头大汗，告诉我黄裕梅刚刚被反动派逮走了。除这位同志之外，我们那个团体的好几个成员也在同一天被捕。于是我就把杨宗锐带去了香港，后来杨又同另一个战友到了海南岛，来不及向他患着重病的妈妈告别。

杨宗锐的妈妈病故了。她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亲人在她身边，都说了些什么话，我们都不得而知。后来我见到杨宗锐时，只问了她妈妈去世的时间（他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没有问更多的情况，因此至今一点也不知道。

（**注**）：杨匏安 1896 年 11 月 6 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后改中山县）。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接触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1917 年 12 月 28 日，即俄国十月革命后才 50 天，他就在广州《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李宁（即列宁）胜利的原因》一文，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第二年，1918 年 9 月 14 日又写“露西亚（俄国）之有李宁，而历史上顿增异彩”。1919 年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从 1919 年 5 月 21 日起至同年 12 月底为止，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著文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

是在同时，他在五大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1927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南洋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活动了一个时期，于 1929 年到上海，在党中央工作并编译《西洋史要》、《地租论》等著作。1931 年在上海被捕，8 月在龙华遇害。他一生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诞生 90 周年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匏安文集》，在他的家乡，今天的珠海市内，建造了他的铜像。在广东，知道杨匏安的人较多，但仍有不少人不了解他。全国其他地方知道他的人就比较少了。应该使更多的人了解他，向他学习。纪念他百年诞辰，我认为不论在广东还是全国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7 战友们被捕的当日和翌日

正在我们这个团体顺利发展的时候，寒假到了。清华同学民先队友黄超显（现在的名字叫黄秋耘，他是香港人）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到广州找到了我，并且带来李昌代表民先总队部写给我的信，信中要我去广西找李宗仁、白崇禧，向他们宣传民先队，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且要李、白为民先队捐款。于是我就同力一一起进入广西。先到梧州，在梧州广西大学找到了民先队友清华同学黄汉炎。他的父亲是广西大学教授，家就在广西大学宿舍。黄认为李、白这时正在跟蒋介石拉关系，我们这时候去桂林不合时宜。我和力一对广西的情况都不了解，听了黄汉炎的劝告，就放弃了原先去桂林的计划，以民先总队部派去的人的名义，在梧州活动了几天之后返回广州。我们来

去都坐船，中途没有停留。

考虑到自己去广西走了一个多星期，在广州的我的这个团体的工作也许有些停顿，因此我一回广州，立即把杨明（即杨宗锐）请来，让他陪我去通知参加会议的人，研究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杨是骑自行车到岭南大学找我的。仲恺农工学校和岭南大学都在“河南”（广州对面，和广州隔一条珠江）。于是我和他一起坐船过江，杨的自行车放在船上。下船后，我们按照各人所在的地点，决定第一个找黄裕梅。于是杨推车，两人走路来到黄裕梅家。我们和黄谈了一阵之后，杨便把自行车存在黄家，再陪我步行去汉民路通知谢恩昆和几个店员开会。到这几个书店一问，都说我们要找的人“不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们回答时神情有些特别，但我们都比较麻木，没有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离开汉民路，我们就去找李康寿，他住在越秀北路。到他家时，院子里有一大群人。当我们问李“在不在”时，家里人也说“不在”，回想起来神情更不对。后来知道这时刚刚把李抓走，而且在我们去李家的路上李康寿看到了我们，但他故意避免同我们打招呼，否则我们也会被捕。但我和杨明还没警惕。他去黄家取自行车，我去一个姓谢的人那里学日语，恰巧那个教员临时有事请假，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到汉民路的书店里去买书。就在这个时候，杨明推着自行车在汉民路找到了我，满头大汗，告诉我在我们离开黄家不久，黄被逮捕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汉民路书店的几位和中山大学的李康寿也都被捕了。

我们就是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动手逮捕我们同志的当天知道了这件事。这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通知还没有被捕的战友，要他们赶快撤离。我想了一下，需要通知的还有王良恭、霍瑛和力伯皖，以及仲恺农工学校宿舍的凌云衢等人。于是我和杨明先去王良恭家。他在，我们向他通报黄、李及店员被捕的情况，要他注意并请他告诉 miss 梁（过了些日子，王以为没有事了，可是有一天还是在家里被抓走了）。再去找霍瑛，那时她也没有事。可是她未采取措施，过不了几天也被抓走了。最后到广州东山区找到力伯皖，那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在力伯皖的家里过夜。

力伯皖担心晚上会有人到他家，把我们三人抓走，所以一夜注意着动静，未能安睡，而我们两个走了一天，累得要命，呼呼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清早，三个人讨论决定，杨回仲恺农工学校向住在学校宿舍的几位通报。我不清楚昨天国民党反动派是否也到岭南来逮捕我，想回岭南看看。三人约定下午 7 点在天字码头附近一家茶楼的三楼见面。

我过江到了康乐，没有从学校大门进去，而是走一个边门，直奔陆佑堂。进去一看，并没有人进去过的痕迹。于是我就把该毁的一些文字上的东西都通过抽水马桶处理了，然后离开康乐回到市内。中午吃了点东西之后，去找一位名叫宋绿猗的进步人士，向他通报了我们这个组织被破坏的情况，请他向广州的其他革命组织和革命组织者打招呼提高警惕，并请他考虑能否找到人出面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设法动员舆论界反

对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从宋绿猗家里出来，一看时间离约定杨、力两人碰面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就买了一根甘蔗，边走边吃，显得非常从容。

关于那天晚上三个人的碰头，还有一段故事。我们约好在那个茶楼的三层楼碰头，但是没有明确是什么意义下的三楼。我是把底层叫做一楼，他们则是不把底层算做一楼，他们两个在楼上，我在楼下，一直等不着，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后来他们才想到了可能有这个问题，才下楼找到了我。

在茶楼我们研究的结果，决定第二天清早我就去香港，通过香港舆论界把我们这个组织被破坏的事情向社会公众揭露。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可以对反动派施加一些压力，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这件事由我来办，杨明跟我去香港。力伯皖则留在广州观察动静。在茶楼我们商定了香港和广州两地之间的联系方法。

这一晚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到别的地方睡觉，就在茶楼一边谈话，一边等天亮。

3.8 在香港

来广州传达民先全国总队部要我去桂林找李宗仁、白崇禧的清华同学黄超显，家住香港坚道 60 号。我们到香港要有一个落脚点，同时我们组织被破坏的事也要黄向北京报告，于是到香港后，就先找黄商量做什么工作，研究我们在香港活动的方案。

香港有两家可以考虑去争取的报纸，一家是《港报》，它的背景是陈济棠。还有一家的背景是中国革命大同盟，也就是李宗仁、白崇禧。其他的报纸都是蒋介石的。此外香港的学联也是我应该联系的对象。我在香港的活动除了争取舆论界声援之外，也想同香港的抗日救亡组织建立联系。我考虑既然很可能自己在广州呆不下去，那就设法在香港开展工作。

由于杨明的哥哥杨立在香港，我就住在坚道 60 号，杨就住在他哥哥那里，杨的哥哥所在的铺子就在皇后大道，从坚道下山到那里很近。

在香港，我们进行的活动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时候陈济棠和李、白都正在跟蒋介石拉关系，港报和李、白那个报社（它的名称一下子记不起来了）的负责人一方面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同时把当时的背景透露给我，说这个时候他们不想发这样的消息。我当然不能勉强他们。与香港学联的接触，我倒比较满意，他们为我到香港召开过专门的会议，但在声援我们这个团体这件事情上，还是要经过新闻传媒，他们单独做不了什么事。在香港我还接触到福建抗日义勇军的代表。据了解，用抗日义勇军名义活动的，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力量。具体的情况我没有了解清楚，不过同他们的接触是很愉快的。

正在这时候，香港的一家亲蒋介石的报纸《工商日报》登出一则消息，占的篇幅很小，地位也很不重要。这个消息说某月某日（即逮捕我们战友这一天），当局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共多少人被当局逮捕。所有这些被捕的人，经过审讯，已经在某月某日在广州大沙头枪决。看得很清楚，说的

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事。

我不相信这则报道。但我想回广州设法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同时在我离开广州时，我还不知道在逮捕人的名单中究竟有我没有，如果名单上没有我，我就应该坚持在广州工作。声援难友的事在香港我已经不能有所作为，没有再留在香港之必要，加上岭南大学开课的日子也到了，我决定在学校开学上课前一天晚上坐香港到广州的轮船，第二天清早到广州。

3.9 在岭南讲了最后一堂微积分

我知道岭南大学寒假过后要在 2 月 1 日星期一开学上课。那一天上午 9 点有我一堂微积分的大课。我算准了时间，在 1 月 31 日晚间在香港上船，第二天清早 7 点就可以到广州，再坐小船到康乐，9 点钟的课误不了。我就完全按照这个时刻表行事。

我这堂课是在“哲生堂”的大教室里举行的。我从香港回校，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到任何别的地方，径直到了教室，那时上课的铃正响，学生已经坐在那里。我没有带课本，向同学借了一本书就讲。下课我走出教室门，正好同教另一班微积分的王子辅打了一个照面，他上课的教室与我的教室正好对着。他见到我，把我拉到教员休息室，问我怎么回来了。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我没有讲话，他接着告诉我，政府已几次来学校抓你，因为你不在没有抓着，你不应该回来。我故意说，我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抓我，我是这里的教员，教学是我的本职，怎

能不回学校，要抓就让他们来抓，我倒想同他们评评理，究竟凭什么来妨碍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王子辅劝我“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躲一阵子好”。他让我暂时在教员休息室，他到我的宿舍，为我取了一些简单的用品，并且到学校替我领取了一个月薪金，为我雇了一条船，陪我去了广九车站，亲自送我离开广州。

这次回广州我来不及办别的事，只是明确了一件事，我是已经在当局被逮捕者的名单之中了。要了解被捕同志的处境这件事，办起来不那么容易，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找别的适当的关系才行。现在我既已被送上了去香港的火车，我也就只好放弃这件工作了。

为什么逮捕我比逮捕李康寿、谢恩昆、黄裕梅等人迟了几天呢？后来弄清楚这次破坏是从谢恩昆引起的。谢恩昆同上海的一个革命组织有关系。那个组织在上海被破坏了，上海国民党当局把谢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广州国民党当局。广州当局在抓谢恩昆时发现谢的一个笔记本上有李康寿、黄裕梅几个人的名字，而没有我的名字，所以那几位就马上被逮捕。我的名字是他们后来才了解的，所以对我采取措施的时间迟一些。有的人根本没有被了解到，他们也就始终没有动手去抓，力伯皖就是其中一个。霍瑛、王良恭和凌云衢等麻痹了一点，过了几天还是被抓了进去。抓他们的时间比到岭南抓我的时间是早是晚，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香港报上报道的那条新闻当然不确实，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这件事。这些同志被捕后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放出来。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要抓我，我在岭南大学是呆不下去了。在广州暂时也呆不下去，于是民先广州地方队部、《一条心》的工作就只好暂时收场。我在岭南大学教的那一堂微积分，是从1936年开始我去广州后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对王子辅非常感谢。是他把要抓我的消息告诉了我；是他把我送出了广州；也是他给我取了些行李，使我生活上获得方便。一个月的工薪一百几十元小洋，也是我生活的必需。不仅如此，他还把我未能带走的东西保管得很好：我买的两本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原著，还有一本《露和字典》和一本《为说英语的工人而使用的俄语读本》；那本《俄语读本》中夹的一张1936年1月《北平时事日报》这家英文报纸的剪报，那是一张在南下扩大宣传团途中外国记者给我、李昌、杨学诚等4人拍摄的照片。1938年我重返广州时，他都拿出来给了我。而这些后来在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时都丢失了。王子辅教授（这是后来晋升的）比我大几岁，现在该有八十五六岁了吧。不久前我给他在清华的住所打了一个电话，他因卧病在床，没有能与我通话。

3.10 告别华南

广州我是呆不下去了，但是我不打算离开华南。在广州被捕的那几个青年的命运我不能不关心。我从北平到广州时，民先总队部希望在华南为民先打开局面，我的工作刚有些进展，现在受到挫折，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认为自己不应该随随便

便地离开这个地区。因此我决定留在香港工作，把民先香港队部建立起来，同时继续关心广州的工作，等待机会再去广州。我们那个组织中的人也还有没有牵连到的，此外，我也认识了广州的其他一些革命青年，在广州不会无所作为。

王子辅送我上了广九铁路的火车，2 月 1 日当天到了香港。岭南大学 2 月 1 日这一天开课，清华大学也在这一天开课。我到香港时黄秋耘已经回清华上学了。但是我在香港为声援广州被捕的青年活动时认识了一些在香港活动的革命分子，他们虽然还不能说是我的老朋友，但在我对他们讲了自己的意图后，大家都肯帮忙。他们给我在九龙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业，我决心留下来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民先总队部李昌的来信，要我尽快回北平，到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接信后，我想一定是全国总队部成立不久缺少人手，既然李昌代表民先全国总队部要我去北平，我去就是了。本来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去北平不但意味着我工作的地点从华南到了华北，而且还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有可能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职业革命者。在这里我可以讲讲我家的经济情况。从进高中最后一个学年起，我就不再由家庭养活我和供我上学了。那时家里实在穷得没有办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认为非继续上学不可，于是我就开始“打工”。我顺利地找到了各种职业：在学校里教书，当家庭教师，在一家化工厂当技师，有时还替人翻译点英文技术资料。三年的时间内我不但不要家里负担我的学费，而且贴补了家用。有时我身兼数职，兼职兼薪，收入颇丰，

比大学里当助教收入还多。当然我的收入还是不稳定的。后来我从清华毕业到了广州岭南大学，虽然还只是助教，但每月薪金小洋一百二三十元（小洋拾角合一元），经济来源就稳定了，用不着为此动脑筋，我母亲也可以不再为家里揭不开锅发愁。我到北平去，很可能不但不再有这个稳定的收入，连那时“打工”的收入都没有了。可是那时对这些我连想也没有想，接到李昌的信之后，立刻从香港经上海回北平。

我就是这样离开了广州，也离开了华南，重返我熟悉的北平。

4 抗战前在北平的四个多月

4.1 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我在广州因为政治原因呆不下去，民先总队部又要我去北平，意味着我不能在华南继续我的职业，这些事我不好对家里说，也不好给朋友说，总得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还没有找，这借口自己送到我跟前。那时我正好看到报纸上一条消息，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准备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于是在我回到上海之后就对家里人说，在广州当一个助教没有多大出息，我要去北平应试。在上海我天天读俄语，想掌握读懂列宁、斯大林原著的工具。我父亲只懂英语，不懂法语，更不懂俄语，还以为我为到法国去而攻读法语呢。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但是我想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于是去民治中学听吴清友讲课。吴清友的俄语水平当然很好，不过他用的教材却使我吃惊。他把苏联法

院院长审讯托洛茨基分子的判决书作为哲学教材。文字相当不好懂，而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讲这样的东西，也真有些特别。我心中对这件事一直没有弄清楚。

不久我就到了北平。有了那一个借口，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没有怀疑，可是这件事也总要找到一个台阶下来才行。这个台阶也是自己送到我的跟前。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我在系里的学业成绩同钱三强互有短长，我还是有竞争力的，我的退出，也还得到一些好评。这个好评完全是白拣的。这么一来我马上能在民先总队部工作了。

不久之后考试成绩揭晓，三强被录取了，我很高兴。他当约里奥的学生比我合适。三强动手做试验的能力比我强，他在中学又学过法文，我相信他一定会学得很好，而且一定会有很高的造诣。在他被录取之后，他就开始准备行装，准备赴法。在他出国前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要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事情果真这样：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亚洲大陆就是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在清华授课，没有多久北平就解放了。他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64 年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到中国来，三强对坂田讲了我

在他纪念册上留言的故事。三强的故事，引起坂田很大的兴趣。回日本后，坂田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科学界的新风貌》，书中转述了三强讲的这个故事，说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1964 年，我想看看三强那本纪念册，几次到三强家里都忘了提这件事。1990 年想起这件事，打电话给三强。他让人转告我，这本纪念册在文革期间非常遗憾地被销毁了，成了一件憾事。为此，今天我讲这段故事时，不能准确引用我当时写的话了。

4.2 我的入党

我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写报告申请加入党。当时我以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怕牺牲，就已经是党员了。所以当 1937 年我到了北平，我的入党介绍人黄超显（黄秋耘）对我说“现在党决定吸收你入党，你有什么想法”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入党。他说罢，我就马上说我愿意入党。这时黄对我说：“入党不入党是一个人最大的事情。你不要马上答复我。你考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再答复我。”他走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该考虑什么问题。我认为自己早就下了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自己也不怕苦不怕牺牲。在这之外，我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呢？以前我不知道还要履行一个入党手续，现在就该履行这个手续了。隔了一个星期，黄再来找我，我说我考虑过了，觉得没有

什么要考虑的。当时黄对我说入党的手续有四条:党员介绍;个人申请;党组织批准;再通知本人,就完成了入党手续。于是我写了入党申请。过了几天,李哲人对我讲,他和我都是党员,过些天会有人通知我去过党的组织生活。果真,两三天后袁也烈找我。他是民先队的军事教官,为我们民先队编了一本《游击战争纲要》。我认识他,他的外号叫"老官话",我也早知道他是党员。他正式通知我编入以他为小组长的党小组,暂时单线联系。第一次见面他和我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过党组织生活的事并介绍了一些党领导机关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过党的生活。过些时候他又找我谈了一次,还给我看了一个军事方面的文件。不论怎样,我是真的入党了。我只有一个入党介绍人,当时没有说有候补期(也没有说不要候补期),而且也没宣誓。我入党的时间是1937年3月。我入党的情况就是这样简单。

后来我也想过,我这样入党也太简单了一些,入党本身应该是一个教育过程,我在入党时受到的教育只是入党介绍人告诉我入党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硬要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本来我是应该在这时候对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区别弄得更清楚一些,结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后也没有人对我进行新党员的教育,也没有上过什么课,看过什么文件。

当时民先全国总队部有一个党团。党团现在叫党组,是由非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的党员组成的。我知道民先总队部党团是归北方局领导。我入党后并没有明确我是否参加了这个党团,我在北平也没有参加党团的活动。不过我想李昌、李哲

人两位一定是党团成员。自从我入党之后，李昌、李哲人等在我面前谈党内的问题就不再避开我，因此我就了解了原先不知道的事情。有一次宣布一位同志因出差被捕的事，需要暂时停止过组织生活，开会时我也参加了。后来我在保定见到彭真（那时候大家都把他叫老魏），知道他就是北方局中分工领导我们这个党团的负责同志。

4.3 两个“第一次”

1937 年 5 月至 6 月间，我“第一次”拿到党的绝密文件。

一天，李哲人给了我一个油印的小本本，内容是张闻天在延安举行的“白区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李哲人在把文件交给我时说，这是李昌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后装在一支牙膏罐中带出来的，并且说这个文件的机密性很强，务必注意不要丢失，要仔细看，不许做笔记，要记在心里，看后退还给他。

这是我入党后党组织给我看的第一个文件。我躲起来看了这个文件。它的内容是讲在白区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工作方法，讲由于抗日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党一定要加强公开工作，同时又要坚持秘密工作。文件既说明了公开工作的重要意义，又讲了坚持秘密工作的必要性，强调了一定要保护党的地下工作的秘密，指出公开工作要和秘密工作配合，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又必须分开，说公开工作是公开的，秘密工作是秘密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之间的联系也是秘密的。看了这

个文件之后，觉得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深刻，也非常重要。对它，我的确看得很仔细，看了好几遍，记得很牢。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以后再没有看到过它，可是有些内容现在我都能基本上复述下来。

这个文件是用蜡纸油印的。我真欣赏刻出来的字是那样的整齐和清晰，我觉得真够得上是艺术品(注)，从内容上它有很高水平的系统的分析，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性。这样的一个具有很高机密性的文件，就是李哲人不说，看了我也会懂得的。

在给我文件的同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李哲人又给了我10 块钱，他说："这是党给你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当时我的生活的确很困难。我家境贫寒，我从来不向家里要钱，尤其是在我毕业已有了比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之后。家里没有钱可以给我。那时手边的钱快要花完，正在准备设法借钱，党给我的 10 块钱我是很需要的，不仅可以解决我的困难，更使我感到一种温暖，并且有点兴奋。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东斋。这个学校的传统是，即使不是真正的北大学生也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学校不管，工友照样服务。我不用花房钱，那时天气也已不那么寒冷，我从广州带去的衣服足够换洗，这 10 块钱也就够用了。

在拿到文件和 10 块钱时，我正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不敢带着文件挤电车，就叫了一辆黄包车。在车上怕文件丢失，手就一直伸在裤兜里握着它。下车后过了一段时间，需要钱用，一摸原先放在另一只裤兜里的 10 块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10 块钱的数目很小，可这是党组织第一次给我的，它有一

种与别的钱不同的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一直记住了这件事。

（注）1937 年 2 月我从香港回北平路经上海时，一天傍晚我的大同同学程淡志抱了一包材料来找我。他告诉我，1936 年暑假同我们一起活动的一位同学有几天没有回家住，朋友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程淡志怕出了问题，因而到他家里找到一包材料，让我同他一起处理。我就去了程淡志家。等到夜深人静时，在他家楼下的客厅里打开来看，全是党的文件。都是 W·W 发的，内容是一些临时性的指示号召等，其中记得清楚的有关于 1936 年纪念“红五月”的号召。这个 W·W 我们一下子就猜出是文(wen)委(wei)两个字的字头，猜出这些号召是文委发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旧文件，如《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的宣言》等等。这一个文件是党公开发布过的，但是由于反动派封锁，人们很少看到。这些文件是油印的，而且刻得非常好。内容上也比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重要。

我们认为把这些文件保存在家里不好，于是看一篇烧一篇，这样在客厅里看了很久。当我们处理完毕时，住在楼上的程的父亲走到楼下，问我们在干什么。原来一张一张纸烧，在客厅里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烟却跑到楼上去了。好在程淡志家是个独门独院，没有发生什么事。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文件决不能这样去处理。

4.4　1937 年的“五·四”纪念会

在我的记忆里，“一二·九”的历次活动都是成功的。虽然有时受到一些挫折，如“三·三一”抬棺游行，策略上有错误，“左”了一些，但不能说是失败。可是 1937 年的“五·四”纪念

活动应该承认是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窝囊。

这次活动是我们学联组织的。我们决定在顺城街法政学院举行大会。这个学联就是在“一二·九”时建立起来的、领导了一年多北平学生运动的那一个。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北平学生的团结，后来也成立了一个学联。于是北平就有了两个学联：原来的学联和它的“对头”——新学联。新学联那天在和平门外的师大操场召开唱对台戏的另一个纪念会。他们的“群众”可以说是只有被反动派把持的几个中学的学生。在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决定法政学院的会不开了，通知参加我们学联的大中学校也去参加北师大新学联召开的会议。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指导思想，一是显示我们团结全体北平学生共同抗日的诚意，二是借此影响那些在他们影响下的中学生。

我想观察这次纪念会进行的情况，就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去师大参加那个会了。

我们组织去师大的同学到会场的时间比较早，就站在操场上靠近主席台的位置。新学联组织的中学生来得比较晚，只好站在后面。快到开会时间，新学联主持会议的人上了主席台，我们学联也派人上台交涉，提出这次纪念会应由两个学联共同主持。结果两个学联在台上争执起来。后来新学联的人不顾台上我们学联的人的反对，自行宣布开会，并且唱起“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曲。唱的人很少。台下就唱起革命歌曲来了，唱的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我们学联的人比新学联的人多得多，我回想起来场上估计有两三千人，学联的队伍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学

联的队伍的组织性也好得多。洪亮和整齐的歌声显示出我们的力量，而且连新学联里也有人发生共鸣，也有人跟着唱了起来。这时候台上新学联的人突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志诚中学的童子军就拿出童子军的棍子冲进学联的队伍动手打人。我们事先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队伍中的大学生，不敢还手。大学生怎能同这些中学生对打？再说我们是为了团结而去，怎么能打架？同时大学生和中学生打，多数人打少数人，胜之不武，影响会很不好。如果有某个或某几个中学生皮肤上有一点伤痕，新学联的后台国民党的那些反动家伙就会大做文章。而如果不去打，就只有撤退。于是我们的学联决定按原来的计划到政法学院开会。这里，北师大在打走了学联的群众之后继续开会。

我想看看他们这个会究竟怎样开下去，就留在北师大操场上没有走开。我们的人走了之后，会场显得冷冷清清，新学联的台柱子是志诚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很反动的家伙，名字叫做吴葆山（这个名字，如果问一些老战友，一定有人还记得）。他利用校长的位置，让不明事理的初中学生来参加会议。学生不知道都被灌输了些什么思想。志诚中学也有民先队员（曾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的彭华那时就是志诚中学的学生），吴当然不让他们来。他只挑选了一批听从他指挥的初中学生，事先做好准备，一律都穿童子军服装并且要求都带上棍子。在这个童子军队伍中，还有好些教练，也穿着童子军服，他们也是经过挑选的。冲进学联队伍时，童子军的教练们高喊："棍子队快上！"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在大学生们走后，教练

又重新整队，让童子军们站到台下。除志诚中学外，还有几所中学，但人数都比志诚少得多。

开会了，台上那些有北平的国民党头头们露面了，陶希圣、熊梦飞、杨立奎都坐在台上。陶希圣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五·四'，旧学联的那些不要中国只要苏联的家伙到这里来捣乱。我们唱国歌，他们唱什么？《保卫马德里》！"他在群众大会上公然造谣，实际上当时没有一个人唱一句《保卫马德里》。

我等到终场之后才回去。总结经验教训时，我认为有一条，凡事都应好好分析，做好必要的准备。这次对反动家伙们都有可能做出什么事看来估计得太不足了。如果有充分准备，我们也不必同中学生对打。我们人数多得多，不妨几个人对一个人把他们拉开，做中学生们的工作，一定会使一些中学生明白过来。他们就不至于神气活现、兴高采烈。在后来开的会议上，我听一个人说："他们——指我们学联去的人——都是一些脓包，是乌合之众，我们团结起来同他们一斗，他们自知理亏，只好抱头鼠窜。"听了这话，我是很不愉快的。

4.5 我做了一件荒唐事

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实际上做的是组织工作。具体说一是负责与民先地方队部通信；二是给各地方队部和关系户寄材料。

通信的办法是，总队部按照当时掌握的各地方队部的通

信地址发信。他们来信信封上写的名字是约定的总队部各式各样的化名，地址是原先讲定的许多学校，其中也包括北大。信寄到后，学校的门房照例是不送信的，而是把信插在门房墙上的布口袋里。当时帮我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郭敬堂（郭敬堂建国后曾在北京市文化局任局长，后调入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一位是王念祖（他一直在全国合作总社当副主任）。他们骑自行车到各学校取信，把取来的信给我看，由我告诉他们如何写回信，然后回家去写回信并寄出。

寄材料的办法是，法政学院有四五个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组成一个小组，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要发的材料按照上面提到过的地址寄出。寄的东西常常是民先总队部的文件《我们的队伍》，还有小报《解放之路》和北方局北平市委出的《长城》（后改《新长城》）、《国防杂志》、《人民之友》等等。这些杂志并不公开表明是党的刊物，但从口气上可以看出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还有临时的单篇的文章等等。这个小组成员我记得起名字的有后来在重庆做过全国学联主席的郑代巩（他后来在一次运动中自杀了）和一位叫苏农官的民先队员。

除了这两件工作之外，我还给民先队的小报上写点文章，当时李昌的笔名是“金路”，我用的笔名是“马义”。

这个时期在北平这些青年党员之间有一个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做民先工作的人强调在众多的青年组织中间要有一个骨干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民先，它是青年组织中的左派团体，有了这个团体才能广泛团结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我是站在这个观点立场上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国民党的高压

政策，这样的左派团体会受到反动派的镇压，必然变成狭小的地下组织，起不到好的作用，因此不主张去发展这样的组织。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我看到华云的一篇文章《论左派》。当时我就听说“华云”是刘少奇的笔名（前几年编《刘少奇选集》时，我向编辑这部书的同志提出过有关这篇文章的线索，没有得到反馈。后来在长沙开少奇思想的研讨会时，我又问了一下负责研究刘少奇著作的同志，得到的回答是：华云确实是刘少奇同志的笔名）。文章中讲了一篇为什么在统一战线中应该有左派的道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透彻，讲了我们自己讲不出来的道理。但是这篇文章的口气是党在说话，不是民先队的口气，于是我就“动笔”在口气上改了一下，换了一个题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去掉了华云的署名，铅印了单页，利用我掌握的发行系统，让法政学院那个小组寄出了。

随随便便就把党的负责人的文章修改一通的做法，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可当时我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这么办了。

这篇文章发出去了，后来知道在一些左派组织中反映比较强烈。香港一家李宗仁、白崇禧的报纸，想以他们自己报社名义发表，后来发现我寄的单位比较宽，没有敢这么办。我还把这篇文章的单页卷在一捆报纸里寄给了上海的程淡志。在邮检中被查出了，特务就去找程“谈话”。程面临着被捕的危险。程同他周围的同志商量的结果，在黄埔江畔留下一双鞋，写了一封控诉特务迫害他不得不跳江的“绝命书”，就离开上海去了太原。由于他是大同大学的高材生，他初中毕业直升大

学跳过了高中阶段，上海许多报纸对他自杀做了突出的报道。因为程是出名的好学生，大同大学的同学对特务的这种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上海有的报刊也发表评论，对当局进行谴责。由于知道他假自杀的人极少，他的朋友中就有人写信给我，对他被迫自杀表示十分惋惜。人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我惹出来的。我虽然一点也不知道真情，但是当我得到他“自杀”的消息时，完全不相信。延安《解放》周刊第二期根据上海报纸也发表了博古同志写的一篇短评。

上帝容许年轻人做错事。这件事我没有受到批评，不过对我是一次教育。

4.6 和本人的毕业论文最后告别

在开始考虑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时，我是很认真的。年轻人的抱负不小。“一二·九”后，参加革命活动与做一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的追求不能兼顾，便没有认真去做那篇论文。我心里一直觉得辜负了周培源老师对我的一片热心。我曾就是否放弃这篇论文、是否毕业这件事同李昌商量。他说，你如果能在科学上有一点地位，对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会有好处。听了这个意见，我勉强把论文写完，自己知道没有尽力而为，本来应该写得好些，可是结果并没有写出什么水平。

1936 年我大学毕业。我的论文导师周培源去美国 Princeton 进修。他带去自己的论文，也带去他指导下学生的论文，其中包括我写的那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1937 年 6

月，周培源老师从 Princeton 回到清华，知道我在北平，便把我找了去，说他把指导我写的论文带去给爱因斯坦看了。爱因斯坦看后，提出一些意见，他要我根据爱因斯坦的意见做一些修改，然后用他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在物理学报上发表。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没有问过党组织之前我不敢做主，只问了一下修改起来工作量大不大。周老师回答说，并不要求做许多新的研究，做新的研究是做另外一篇论文的事，这回只是做一点修改，工作量不会很大，我答应回去想一想。随后我把这件事情和李昌商量。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同他在我没有毕业前问他的要不要去完成毕业论文争取大学毕业时发表的意见原则上一样，主张我按照周培源教授的意见去办，说如能发表那篇论文对我从事革命工作会有好处，至少能起一种掩护的作用。我就同周老师约好过些日子详细听他的意见。

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前的廊坊事件。抗日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也就没有按照约好的时间去清华。接着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改论文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同自己的毕业论文也就最后告别了。

前些年周老师当北大校长时，我常去他家。他告诉我，他对原先指导我做的那个研究领域中的问题，还很有兴趣，并且正带着研究生在做。而我自己的物理学已经荒疏，无法在周培源老师的指导下继续进行那样的工作了。这一点周培源老师很清楚，所以根本没有要我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意思。（注）

（**注**）1995 年有一次见到我的师兄彭桓武（他比我高一年级，但是比

我小一岁），他告诉我，他正在做的题目就是周培源想做而未完成的这个题目。

5 北平沦陷前后的经历

5.1 “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

“九·一八”以来,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上街游行、请愿示威,不惜坐牢乃至牺牲,直接的目的就是推动抗日战争。中国人要不做亡国奴,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只有打胜这一仗。1937 年 7 月 7 日毕竟不同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也不同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有了“一二·九”运动,有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有了西安事变,党的逼蒋抗日的策略产生了效力,我们盼望了很久、为之奋斗了很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别提有多么高兴!全国的人是这样,在北平的人更是这样。芦沟桥就在郊外,更使在北平生活的我们兴奋得不知怎样才好。抗战一爆发,我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一下子发生了 180°的大转变。回

想“一二·九”运动受镇压后，我们这群革命青年不但坚决反对实行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对宋哲元也非常不满。“一二·一六”大示威既是冲着日本帝国主义、冲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是冲着宋哲元。特别是在1936年1月，由北平西郊几所学校的同学组成的抗日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第一、二团是北平城内的学校，第四团是天津的同学组成的）前进到高碑店被宋哲元派去的便衣强行押送回校时，可想而知大家多么愤怒。在被强行押送去高碑店火车站的路上，我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但是现在宋哲元的部队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我们就喊出了拥宋抗战的口号。北平学联就组织同学们一批一批地到二十九军各驻军地点慰问前线官兵。在我们这些青年革命团体中顿时呈现一片参战景象。

1936年底1937年初，北平党办了一个党刊，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不断改换名称，先是叫《长城》，后来改成《新长城》、《国防杂志》，在抗战前不久改为《人民之友》。大约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四五天光景，党的北平市委就在党刊《人民之友》的号外（来不及出刊物，这号外只是一张小报）上，对党员和革命青年发出号召：“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尽管后来我们认识到，作为指导思想，这样的口号未必正确，但它的确代表当时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我们是多么希望北平能够成为中国的马德里！我们希望自己能像马德里的英雄那样，在北平浴血抗战，使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脱身不了，以便赢得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自从市委发出那样的号召之后，同志们都准备在城里和日本军队打仗。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部及其地方队部号召同学们修筑街垒，准备巷战。我也很想和同志们一起在城内参战。那时我虽然已经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党领导的一个最重要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但是毕竟才22岁，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充满着罗曼蒂克，非常热情，把事情看得很简单。

5.2 接受去保定的任务

没有想到，“七·七”过后没有几天，党组织找我谈话，说：“你在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与各地方队部联系的工作。这个工作不能因为打仗而中断。现在总队部在北平城内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过些日子仗一在城里打起来，就更无法工作。因此党决定派你到保定去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用总队部的名义继续与各地民先队部联系，开展工作。你还要特别致力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

这就是说，党不要我在北平城内“流血”。我的工作岗位将在外地。党组织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只得开始做离城的准备。

准备工作有两个方面：

一是北方局把保属特委的金杰同志召来北平和我见面，当面讲清楚我去保定的使命，要保属特委支持我的工作，并且商量好我去保定后同他接头的方法。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金

杰没有把他的姓名告诉我。我看他长得胖胖的，身体圆乎乎的，模样又很“土”，就开玩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肥原（圆）”（土肥原是一个当时在华北活动的很有名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名字，是个特务头子，对金杰起这样的外号实在不好，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尽管我和金杰已经见过面，但是党组织还是为我开了一封组织介绍信给特委。那是一张很小很薄的纸，写有很少的几个字，叠得很小，也没有给我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就缝在我衣服的夹层里。

还有一方面的工作，是把我平常联系的民先各地队部和某些在外地的个别民先队员的通讯地点编成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单子，用很小很小的字抄在棉纸上面，以便能够带出城去。

至于发动河北游击战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最后想到一条：在北平从多方面调查河北省若干县民间枪支和武装力量的状况。结果问到大约二三十个县枪支和人员的数字，我把这些数字用拉丁化新文字记在燕京大学制作的一个小本本里。本来我打算多看几遍、记在心头后就把这个本子毁掉。我认为没有必要冒险把这样的东西带到保定去。可是后来忘了毁掉，放在西装裤兜里险些出事。

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时，党组织又派了赵德尊同志和我一起工作。赵是我清华同学，学外国语。他比我低一个年级。他是民先老队员，可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不做民先工作，而是在清华大学做党支部书记。他是东北人。

进行这几件工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加上对城内战争气

氛的留恋，直到 7 月 27 日，我还在北平城内。

5.3 与日寇坦克车队在田村遭遇

7 月 28 日凌晨，李哲人（他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1936 年秋民先全国总队部成立时，党组织把他调到北平做民先工作。他是仅次于李昌的负责人，是我的领导。）到我居住的沙滩北京大学东斋的宿舍，使劲地推醒正在床上熟睡的我，说："小于，你们快走，日本兵就要进北京城了。"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连盥洗都没来得及，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包袱，找到赵德尊，立即往西直门走去。

到西直门已经快 7 点了。日本兵快要进城的消息，已经有一部分人知道了。一些住在北平城里的同学也到了西直门，准备离开北平。也有一些住在西郊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同学到了西直门，准备进城暂避。我和赵德尊出西直门朝着门头沟方向前进时，就有不少人跟在我们后面。我认识的共产党员、我的党小组长袁也烈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我故意不向他打招呼。大多数人我虽不认识，但我敢判断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民先队员。他们离开北平，一望便知也是为了到别的地方同日本兵打仗的。走在路上，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见到一个散兵还背着一支枪，就要去买。那个兵要十块大洋，他只肯出五块，这个买卖没有做成。

我们先是沿着西直门外的铁路线朝南走。走了不久，只见一列军车迎面从南向北开来。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就在路旁

隐蔽起来。火车开过去了，大家最后也没有弄清楚这列军车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军车过后，我们继续沿着铁路线前进，走不远，我决定离开铁路线，改道走公路。我手边带了一张这个地区五千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看清楚哪一条是去西山八大处的大道。当我们一行（大约有二三十人）走近田村东头时，走在最前面的我，发现一辆日本坦克就停在村口。我向同志们喊了一声："日本坦克！"就急忙钻进一片玉米地，希望大家隐蔽起来。可还是被日本军队发现了。我趴在地上先是听到坦克发动起来的声音，后来看到它冲着我们开了过来，接着就是日本坦克向这片玉米地盲目扫射。我听到了机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地上弹起的一排排尘土。许多机枪子弹就落在我的身旁。我望了一下玉米地：平地一片，没有沟垅，没有任何地形地物可以隐蔽，只有无可奈何地趴在那里不动。

要打仗就不怕牺牲。这样的精神准备，可以说每个党员都是有的，何况不久前党又发出"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号召。在抗战前我也常想到牺牲。处在敌人的统治下，就有可能被捕乃至被杀害。可是抗战爆发后我又是一个想法：打仗当然要死许多人，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前面，也就会先死，我想自己是不会活到战争胜利这一天的。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我身旁打起一排排尘土的时候，"打仗要死许多人，共产党员会先死"的念头便涌上脑海。可是又奇怪："怎么战争刚爆发没有几天，第一次遇到日本兵，自己就这么轻易地被打死了呢？"我这么想着，觉得很有些滑稽。但是这机枪子弹、这开过来的坦克是真的要我命的东西。事后我想，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有产

生任何恐惧，而只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一点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得可笑。

接着是日军坦克在这块玉米地上来回压，想用压倒这块地里玉米杆子的办法把伏在其中的人逼出来。他们大概估计有不少人藏在这片玉米地里面，其实其中只有我一个人。当坦克靠近我时，我闭上眼睛迎接死亡的到来。只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猛睁眼一看，我正在坦克的下面，身躯和坦克前进的方向并行，两边是坦克的履带。幸亏那时我不像现在这么胖，夏天穿的也很单薄，所以虽然这辆小型坦克两条履带之间的空间狭窄，底盘也不高，但还容得下我，我一点伤也没有受，只是臀部的裤子上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

坦克上的日本兵好像见到了什么，在我上面停了一下，又向前开出大约四五十米，然后又向我打了一排机关枪。不知道为什么，子弹仍旧没有打到我的身上。于是几个日本兵下了坦克走到我跟前，我也就站了起来。从坦克开进玉米地鬼子开枪扫射，到坦克车从我身上压过，到最后又向我打这一排子弹，我一直在“等待”这“奇怪”的死亡，却又“奇怪”地安然无恙。

5.4 在田村的几个小时

那天在玉米地被日军抓到的只有我、赵德尊等走在前面的五个人。我和赵任务在身走在最前面。第三个是我的表弟周国铨，他在清华读书。我出西直门时，他听到日军要占领清华的消息正要进城找我。我说：“你跟我们走吧”，他就紧跟着

我。还有两个，后来知道都是北大同学，一个叫汤德明，一个叫向长青。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赵没有钻进玉米地而是就地在公路上卧倒，两个日本兵正飞跑过去抓他。另外有两个日本兵带了周、汤、向三个人走过来了。日本军队以为还有什么人躲在什么地方没有出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一句中国话，大叫“朋友！”“朋友！”吆喝人出来，也进行了一番搜索。后面的人跑得快，一个也没有被抓住。

日军把我们带进田村。街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所有住户的大门都紧紧关闭着。几个日本兵正用脚踢农户的大门。用中国话叫“开门！”“开门！”可是没有一家的门打开，没有一个人走到街上来。在田村的街上，我看到一个二十九军的战士，头颅被劈开，身子在台阶上，头下垂，脑浆正往下流，真不想多看一眼。在田村街中心放了一张桌子，我被带到桌子旁边。让我站好。然后要我蹲下，再站起，又蹲下，如此三次。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看我是否是军人，而我恰好一天军训没有受过。后来我明白，那时日军主要是盘查军人。因此第一件事要辨别我究竟是军人还是老百姓。不过在我蹲下站起三次，他们看出我不是军人之后，两个日本兵还是把我手臂捉住，由另一个兵用手掌猛抽我的脸。我看他们的表情是恨我在玉米地里怎么也不出来，又有点奇怪怎么枪打、坦克车压都不能置我于死地。这时候，我考虑既不应该表现痛苦，又不想显出自己软弱，但也认为不宜表现出愤怒，因为政治面目并没有暴露。我决定来一个“无表情”。当他们猛打我的时候，我观察那个打我的日本兵，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以前看旧小说，书中描写凶狠的人“一

脸横肉”，我一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在这个日本兵的脸上看到了，他脸上的肉果真非常明显地是横的。日本兵检查我、打我，他们花的时间比较长，其他四个人没有挨打，用的时间也短。他们一直把我看成是主要的角色。

在搞了我们一通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走，带到靠近村西头一面土墙旁边后，做出要我们蹲下的手势。

当我们蹲下去的时候，我想起不知道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的枪毙人的镜头：让被处决的人蹲着，然后行刑者在这些人的后脑勺上每一个人打一枪。可是他们没有对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只有一个持枪的日本兵，看管着我们，来回地走动。猛然一声枪响，我不知道谁被打了，一看大家都安好。原来是他用枪打鸟。这个兵只顾自己走来走去，不理我们。我和赵德尊在这个日本兵走远的时候相视一笑。后来两人谈起那一笑的意思，两人竟然是同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要枪毙我们，要喊两个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蹲一会儿累了，就自动改蹲为坐。那个看管我们的日本兵也没有管。我们在土墙边一声不出地坐了有半个小时或者还多一些时间。

说来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来了个日本兵，衣服兜着许多从地里挖来的香瓜，用手势问我们是否愿意也吃一个。我当时正渴，心想过不了一会儿，也许会处决我，现在有吃的为什么不吃，旧社会杀头还“请”犯人喝酒和吃红烧肉呢！于是用自己的衣服把瓜上的泥土一擦就吃。

又呆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日本兵，要我们站起来跟他走。

原来又把我们带回打我的那张桌子旁边。这时桌子上堆放的东西更多了。在离开那张桌子去土墙的时候，桌子上放着的只有从我们五个人身上搜走的东西：其中包括我带去的那个小包袱，那张五千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那个燕京大学制作的小本本（真该死，我忘了撕去其中记有河北几个县民间枪支数和人员数的那一页）。还有赵德尊的一个包袱和另外三个人的东西。现在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这是日本兵在“打扫战场”时拾到的、我们的同行者扔掉的东西：有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药物、好几本书，等等，如果那个中学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做的那个买卖成了，那支枪有可能也在桌上，这样我们的麻烦就多了。放在桌上的书有三种，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种是我们民先总队部发给民先队员的《游击战争纲要》。它是袁也烈编的，每个参加那次在西山举行的游击战争演习的民先队员都发给一本。还有两种，一种是学生们在军训时政府发的《步兵操典》，另一种是《阵中要务领》。这些书是同军事有关的，但似乎没有引起日本兵的注意。这些学生准备打仗，把它们带在身边，又都扔在地里，被他们捡到了。

把我们带到桌边，第一个受“审讯”的还是我。在审讯前又检查了我身边的东西。把我的手表和自来水笔都打开了。检查不出什么东西，便对我开始“问话”。由于这支部队没有懂中国话的，没有翻译，便采用笔问笔答方式。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三个字“汝狐行”，下面加一个问号。我奇怪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是认为我狡猾得像狐狸？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不像，而且也不通。真的是这三个字，谁也

不能回答。我想也许他们写了别字，把“旅行”写了“狐行”。我用笔回答：“不是，我要回家。”答对了。接着就问我的职业，我写的是事实“北京汇文中学教员”。“教什么？”“高中物理。”抗战爆发前因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不能在广州岭南大学再呆下去了，李昌要我到北平来做民先总队部的工作。我要生活，家里还要靠我的薪水过日子，就在北平找职业。我找到了汇文中学教书这个职业，刚刚拿到聘书。他们接着问“家在何方？”我答“上海”。又问“去上海为何不经天津？”我向东指了一下，答“铁路已断”。问过我，就问赵、周等四个人。问完了示意“你们可以走了”。有一个人，不记得是谁，用笔问“向何处走”，日本兵指着东方写了“危险”两字，要我们朝西走——这正是我们想去的方向。于是我就向他们提出要回其中藏有我百多个通讯处的包袱。被允许了。于是打开包袱又检查了一遍，一看全是衣服。我制作的那张单子，是塞在一只袜子里，这只袜子同另一只袜子卷在一起。包袱里一共有三双袜子，都是每双卷成一卷，其他两双袜子里没有塞什么东西。他们对这些衣服鞋袜之类不注意，打开包袱看了一下之后就把包袱还给我了。他们还指着桌上的东西一一问是不是我的，我说不是。问到那张地图和那个本子，我也说不是。他们忘了它们原来是从我的身上搜出来的。

我们意想不到就这样轻易地获得了自由。走了不到50米，北大的两个同学又跑回到那张桌子旁边。我们清华的三个人站在远处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那两个同学用手势对日本兵“说”了什么，回来手上拿着一张纸。这两位同学说

他们要来了我们再向前走的通行证明，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走到前面又会被抓起来的。看这张纸条，上面除了那些“假名”看不懂外，有“证据不充分”“赦免”“放行”几个汉字，后面写了小队长三个字，并打了一个很小的椭圆形的图章，上面是“香田”。

我们拿着这张通行证明，继续向西行进。路上遇到一小队日本兵和一辆坦克车，我们大摇大摆地走，日本兵仍然排着队行进，坦克车也没有停下来问我们什么。我们再向前走，走到黄庄，又遇到一队日本兵。一个军官把我们拦住。我们取出了那张“通行证”。看罢，他对我的包袱又做了一次检查，藏着通讯录的那卷袜子被打开了，但是他只是从外面摸了一下，因为棉纸是软的，没有摸出什么东西。如果当时他手往袜子里一伸，我就没有命了。别人带的东西也检查了一下，没有看出什么，又放行了。他在那张“通行证”上也打了一个图章。原来这个人是中队长，比小队长高一级。不过图章上他的名字记不得了。再往前走，便是中日军队控制区交界的地方，就在西山脚下。这时候天色已暗下来，又下起雨来。我们决定不走了。五个人又钻进一片玉米地——很大很大的一片玉米地。我们就在炮声和雨声中过了 7 月 28 日这一夜。

对于我们被释放和给我们开了通行证这件事，在跟朋友们叙述这个过程和向党组织交代那次本人被抓又被释放这段历史时，我全都如实地讲了。但是在抗战期间向众多的青年人讲故事时，我不去讲这些情节，“从略”了。抗战期间日军不仅对我国军队、而且对我国老百姓也非常残暴。“南京大屠杀”、

“三光政策”等都是惨痛的事实。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揭露日军对我国军民的残暴。中国人民不能忘记这些。我们被日本军队抓住是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21天，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知道中国老百姓的厉害，因而对我们实行了宽大的政策。这才会发生上面讲的那些情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遇到了全民的抵抗，他们很快就懂得不但中国军队，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坚决反对他们，并且有效地同他们斗争。他们的政策就不一样了。于是他们对老百姓和对军队就同样的凶狠。我们遇到的是在很短时间内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它虽然是事实，但是以前我还是不愿意讲这些细节，怕引起一些误会。

现在我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我觉得让青年们知道这样的细节也有好处，让他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知道在特殊的具体的条件下会发生特殊的具体的事情，并且事物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他们应该学会分析和正确判断。

抗战爆发后的第21天，1937年7月28日我就是这么过的。

5.5　7月29日晨

后来知道，7月28日我在北平西郊遇到日本兵，在田村被抓并被审讯的时候，正是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南苑激战，被日军打败，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英勇牺牲的时候。那时日军

和我军的主力都在北平南郊，在西郊的日军只是一支小部队。因此在田村黄庄听到的炮声很稀疏。7 月 28 日我们在西山脚下那片玉米地里过夜时，听到的炮声是从离那儿比较远的地方打的，而且越来越稀，到天亮时几乎都听不到什么了。29 日我们从玉米地里向外观察，不见人影，出来之后，也没有见到一个士兵或是老百姓，真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早晨。

当我们走进邻近村庄的一户农民家时，全家的人用一种惊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当我们告诉他们自己是北平城里的学生，走了一夜才走到这里，准备搭火车南下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一些。我们又拿出四个银元，作为他们把我们带到良乡火车站的代价。当时四块大洋对我们学生、尤其对农民来说都不是很少的钱，因此当我们把这钱交给这家的主妇时，她就同意自己的丈夫陪我们走一趟。不过走在路上时我们感觉到这个农民一直有逃跑的想法。于是五个人把他围在中间，使他难离开我们。好在从他家到良乡火车站走小路很近，很快就到了。到了良乡车站，我们向他致谢，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家去了。

5.6 从良乡到琉璃河

一到良乡车站，我们就完全明白二十九军是被彻底打败了。在良乡车站上没有火车，可是在站台上站满了溃散下来的士兵。有的揩着枪，有的揩着大刀。在这儿看不到有什么军官，也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这些战士——至少有千把人，有的比我们早到，有的比我们晚到，都是在等火车南

下。我们同他们在车站上呆了好一会儿，希望能够听到南方传来隆隆的火车声，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候有些士兵喊“火车不会来了，我们走！”，几个人一带头，大伙儿就沿车站路线往前走。我们也跟在他们之中。一时间那一条铁路线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铁轨两旁的土路走着人，两条铁轨中间的地方也走着人。尽管铁轨中间有许多石子，崎岖不平，但是为了早点赶上火车，也有不少人在一条一条的枕木上跳着走。

我们五个人走在这些战士之中。我想从这些战士那里了解一些昨天的战事。问他们，他们不愿细讲，也可能讲不清楚，只是讲“败了！败了！”有的骂日本兵，也有的骂长官，可是具体的情节没有问到什么。我们向他们做工作，希望他们继续跟日本鬼子打仗。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得倒很坚决。几个士兵都表示不相信打不过日本鬼子，都说到了前面找到了队伍，整顿好后回头再同日本鬼子打，出这次被打败的这口气。我们一路走一路同这些士兵聊天，倒不觉得路长。

太阳越来越高。这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7 月底的日子，在阳光直射下走路的确又热又渴。和我们走在一路的士兵，看到有西瓜田，要我们在路边暂时等候，自己跑过去用大刀把瓜割了两个下来拿到路边，还是用大刀把瓜切开，对我们只说“吃”一个字，我们就捧起来吃。这东西真好，既解渴，又可填肚子，除了在田村吃的那一个香瓜外，我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一路上我们吃了好几次西瓜。

走了 10 公里路，到了窦店，车站上仍然没有火车，大家又继续往前走。在从窦店到琉璃河的路上，有三架日本飞机编队

从北到南沿铁路线飞行。它们可能见到了我们，可是没理睬我们，我们也没有去管它，照样走路。又走了20公里，到了琉璃河车站，有一列客车停在那里。士兵们见了，就跑步上前，我们也加紧步伐。走近这列客车，看到许多车厢已经挤得满满的，而且有不少士兵已爬到了车厢顶上，不怕火车行进时摔下来。我们五个人也挤上了一个车厢，一下被挤进了又臭又小的厕所。

正在这时候，士兵们喊日本飞机来了。还是方才南飞的那三架，现在是朝北向我们飞来。它在我们这个车站上空盘旋了几圈，飞得很低，似乎要打机关枪或投炸弹。可是转了几圈之后，一枪不发地走了。大家又是一场虚惊。

士兵们如果不都上了火车，这车是不敢开的，士兵们会打枪。过了一会儿，大概所有的士兵都上了车，火车就开动了。我们五人在厕所里真是又热又闷又臭。后来想出了办法，一个人看着表，五个人轮流把头伸到窗外呼吸“新鲜空气”，每人五分钟。

火车一路不停地一直开到保定车站。但是开得极慢。大概走了五六个钟头，到晚间9点左右才到保定。这时天完全黑了。到保定车站，我和赵德尊是非下车不可的。我希望我的表弟周国铨留在保定和我们一起工作，可是周还是想回上海，他同北大的那位同学继续留在火车上。我们两人就同另外三个人在车上告别。

5.7 进保定城

到保定车站时见到的是一片刚刚被轰炸后的景象。被炸的火车还在燃烧，间或还有零星的爆炸声。车站上的人都在骂汉奸。原来上午从后方刚运来了一列火车的弹药到保定，汉奸马上报告了日本军队。我们在窦店看见的三架飞机就是来炸这列火车的。我们在琉璃河车站遇到的那三架飞机，由于在保定投完了炸弹，打完了枪弹，所以在琉璃河只能对我们侦察了一阵子，便宜了这一列车上的人。而在保定时它们可威风了。那儿高射炮似乎一座也没有，让这三架飞机——而且只是三架小小的飞机，耀武扬威，把整列军火统统毁了。对这一点，人们也在骂。

我们在琉璃河上车时，天完全是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下起雨来，在保定下车时雨下得很大。大概是飞机刚轰炸过或者其他原因，保定城门关了起来，我们就没有法子进城。又因为下雨不能不找一个避雨的地方。没有找多久，总算发现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乞丐难民收容所。那是一间临街的房子，房间很小。我们到时已经有不少乞丐和乞丐模样的人在里面，不过还有狭窄的空间可以容得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挤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地上又湿又脏，坐不下去，就只好站着。也不想靠墙，墙也很潮湿，而且很脏。我和赵德尊背靠背，互相依靠着站了几个小时。好在夏天天亮得早。天亮了，雨也停了，保定城门打开了，我们就进了保定城。

由于事先讲好在保定找“土肥原”的办法，进城后大清早没费什么困难就找到了他。他从北平回保定后早就为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安排。我们一到，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东大街撒珠胡同2号康琳家里，并且安排冯书春同志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保属特委决定冯、康两位负责协助民先临时总队部的工作，有什么困难都可帮助我们解决。冯很年轻，当时还不到20岁，不过也已有两三年党龄了。康琳是他的未婚妻，比冯更小，也已被吸收入党，我们住在那儿既安全又方便。

我对在保定工作过的这个地方很有感情。1966年我利用阴历大年初一这个假日，全家坐上硬席火车去保定“旧地重游”。因为把东大街误记成南大街，没有找到康琳的家。前两年见到冯书春同志（现在他改名冯直，离休前在六机部工作。康琳早已过世），才弄清楚这“东、南”之误。他告诉我那所房子前些年还在。

5.8 民先临时总队部在保定一天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艰苦的工作精神真是没得说的。28日在田村折腾了一天，没吃没睡。29日白天又走了一天，除了西瓜外，什么也没有吃没有喝，晚上在火车站那个收容乞丐的地方猫了几小时。30日进城，一会儿也没有休息就在撒珠胡同开始工作了。我和赵德尊商量了一下，由我执笔写一个《日军攻陷北平后的形势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战斗任务》，这是给各民先地方队部的一封指示信。赵负责刻钢板。赵德尊有很好

的刻钢板的手艺，刻出来的字又端正又清楚。我们两人采用流水作业，我一边写，赵德尊就一边刻。刻完了，冯、康等帮助印刷，当天就把信件装在不一样的若干个信封里，分投到保定城内的好几个信箱里，作为普通的信件发出了相当大一部分。金杰、冯书春等还为我们安排好在保定设立的民先临时总队部的若干个通讯处。它们是若干所学校的地址，用的都是假名字，即便被反动派查到，也找不到具体负责的人，我们在信上也把这些通讯处告诉了各地民先。7 月 30 日，我们紧张了一整天，7 月 31 日继续发信。两天来我们做了民先总队部的第一件工作。

5.9 见彭真

7 月 31 日清早金杰来撒珠胡同，通知我北方局一位负责同志要找我谈话。民先全国总队部在北平时，它的党团（相当于今天的党组）就是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具体说就是由彭真同志领导的。不过那时他不用彭真这个名字，大家称呼他老魏。他在党刊上发表文章用的是“玮玉”这个笔名。我知道北方局书记是少奇同志，他的笔名是 KV 和胡服。华云这个笔名他也用过，而玮玉是北方局另一个负责同志。彭真直接同民先总队部党团联系，不过在北平我并没有见过他。这次金杰来通知，我猜到是彭真。见面后，果真是他。他是 7 月 30 日从天津（北方局设在天津）来到保定的，住在保定的一家旧式旅馆。这旅馆不算小，彭真住的那一间很宽敞。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

他穿上长袍，戴上礼帽，的确很像一个商人。

见面后，彭真问我是如何离开北平的。我就讲了7月28、29两日的经过。他听了很高兴。我还向他汇报了民先临时总队部已第一次发信与全国联系，并且给了他那个油印的《形势和任务》。他很高兴。他说了一句青年干部的成长常常是一窝一窝的话。他的话鼓励了我们。这次见面只有我和他在场，金杰把我带到后就回避了。彭真同志指示保定不是建立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的好地方。他说从战争形势来看，保定很快也会被日军占领。他要我把民先临时总队部立即迁去太原。他还说，我们红军从来没有到过河北，高蠡暴动也失败了。但是河北省党的地下组织的基础最强，将来党是会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的，但是像保定、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是保不住的，得先在农村扎下根去。他还讲了不少，最后和我约定8月2日上午9点在太原海子公园碰头。

见过彭真同志后回到撒珠胡同，我们决定赵德尊留在保定继续开展河北的工作，我自己第二天早上就坐火车去石家庄。

5.10 会见全国学联前线慰问团

7月31日我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与全国学联前线慰问团见面。全国学联与民先总队部是地位相当的革命青年组织，是姊妹团体。全国学联来了人，我作为民先临时总队部的负责人应该同这个团带队的同志见见面。

我知道这个慰问团的工作很难进行。北平战事失利。7 月 29 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后，准备大军南下。二十九军溃不成军，有待整休。我军前线究竟在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保定军方态度暧昧。他们并不需要像全国学联那样的组织来慰问。这个慰问团一定不会受到欢迎。我想自己在保定同特委有联系，理应设法协助他们的工作。可是想了一阵子，觉得真的是无能为力。

没有想到在与那个慰问团见面时，带团的不是别人，而是韩天石。韩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在民先全国总队部成立前，他是民先队的总队长。1936 年暑假他去成都，在成都四川大学学习。他在成都建立的民先地方队部，是民先许多地方队部中除了北平、天津地方队部外最好的一个。我和他一直有通信关系。见到他，我们讲了战争形势，也讲了民先工作。

5.11 离开保定去石家庄

8 月 1 日清早我去石家庄。在石家庄我只去了一个地方“朱琏诊所”，见到陶希晋、朱琏夫妇。陶是我们党在石家庄的负责人，朱也是党员，擅长针灸，开设了一个诊所。这诊所事实上就是党的机关。陶希晋的弟弟陶鲁笳还是民先石家庄地方队部的队长。我找到了陶希晋，向他通报了民先总队部的情况，讨论了一下战争形势。我告诉他，平津一带的民先队员很有可能去太原，而石家庄是进太原必经之地，希望他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谈话的时间不长，谈罢就上火车站赶去太原。

本来我是想见陶鲁笳，和他专门谈谈石家庄民先队的工作。可是因为我在石家庄的时间很短促，他正好不在“朱琏诊所”，因此我想给陶鲁笳说的话就只好请陶希晋转告。

5.12 太原典膳所 2 号

我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按照我从北平带出未被日本兵搜出的那张单子找到那个地方的民先地方队部，找到一个落脚的处所。8 月 1 日到太原我就直奔典膳所 2 号，因为在我带出来的单子里就有“太原典膳所 2 号朱青”这个地址。那时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密码改成可以直接看得懂的文字，不过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

朱青一定是个假名字，这是我估计到的。但到典膳所之前不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假名字。原来在典膳所 2 号住的是山西省民先队长马寅。1937 年初马寅去租房的时候，他了解到房东是不敢把房子租给单身汉的，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女同志，谎称是他的妻子，一起去租房。这个女同志在租房时临时起了一个假名字“朱青”。但在房子租好搬进去时“朱青”没有去，马寅对房东说她到山西外县教书去了。于是典膳所 2 号就有“朱青”这样一个收信人的名字。马寅和北平民先队部及山西外县的民先队部联系时也就用“朱青”这个名字。“朱青”这位女同志从来没有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可是她的信件却不少。

见到马寅，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年轻。那时我也只有 22 岁，而他只有 18 岁（也许 18 岁都没有满），他是我的同乡，上

海人。他是回族，父辈六房只有他一个男孩子。1936 年在上海正风中学读书时入了党。我不知道他怎么到了太原，怎么当上了山西省民先队队长。接触中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便决定把民先临时总队部设在这典膳所 2 号。我也就同马寅睡一个炕。从 7 月 28 日清早到 8 月 1 日傍晚，过了五天的流浪生活，现在总算安顿下来了。这个地方不大，只有一大间平房，但是我所需要的空间弹性是很大的，几十个平方米，也就可以对付一阵子了。

那天晚上我和马寅谈到深夜。

5.13 海子边公园接受任务

太原人没有不知道城里有一个海子边公园的。彭真约我上午 9 点见面，我一清早起床吃了一碗醪糟煮鸡蛋，就按照马寅的指点去这个公园。

进公园时 8 点刚过不久。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人到公园里去做晨操。这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一，天气晴朗，公园里几乎没有游客，非常之安静。为了彭真一进公园就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在靠近公园大门的地方找了一张椅子坐着。快到 9 点他来了，穿的还是我在保定时看到的那件大褂，戴着也是看到过的那顶礼帽。我站起来慢慢地走，在他走近我并排时，看看旁边没有人，就靠近一起散步。一边走我一边向他简单地汇报我在石家庄见到陶希晋的情况，并向他汇报我在典膳所住下来了，向他报告我准备让马寅兼临时总队部的组织部长，再通

过牺盟会里的熟人，找一个宣传部长，把临时总队部正式成立起来，问他是否可以。我汇报的事有些无需他发表什么意见，我请示的几点，他表示同意。在这之后，他就要我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办一所“陕北公学”，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入学，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他说现在延安已经有了一所抗大，它的全称是抗日军政大学，给人的印象是学武的。现在办的这所陕北公学完全学文，它能吸收更多的人到那里去。他说现在很需要革命青年工作，发展民先队员、发展党员固然重要，但是让他们到延安去接受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你们不仅要开展外面工作这一头，还应该把动员青年到延安进陕北公学作为任务之一。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二件事是他问我从北平带出的通讯地址中有没有在晋察冀三省接壤那个区域的。我说有，而且不算少。他说这些地址很有用。他告诉我，八路军已从陕甘宁边区向山西进发，要经过太原开到晋东北和河北西北部那个地方去。那儿很快会变成前线。他说你们应该做两件事：一件是要动员群众对路过太原的八路军战士进行热情的慰问。这对鼓舞士气是有用的，也是对太原群众的一种教育。另外就是把你带来的那些通讯地址交给我，我可以把它们交给到那个地区工作的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去和他们取得联系，便于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同时也便于开展那个地区的工作。说到这里，看到路边有一张长条椅子，我们两个人就坐了下来。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本中国的分省地图册，翻到山西省的那一页，用

手指在晋东北、冀西北、察哈尔与晋冀两省靠近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说八路军现在就要开到那里打仗，将来我们要在那个地区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带来的那些地址，都是与地下党有关的，那儿的民先有的就是地下党帮助建立起来的，有的是北平的学生回到家乡建立的，在建立后也都会与地下党建立起联系，它们可以成为在那儿建党的基础。

我听他这么说，非常兴奋，也为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对党有用高兴。我答应回典膳所立即把这些地址抄下来给他，并约好给他的地点和时间。

我和彭真同志这样一个见面的场面，后来我常常想起，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们谈话的时间是 1937 年的 8 月 2 日，当时晋察冀只是彭真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的一个圈。没有隔多久，经过艰苦的战争和组织工作，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党中央的科学预见，是把理想变为行动，把观念转化为现实的结果。

陕北公学后来办起来了。它是许许多多革命干部的摇篮。这也说明党中央决定的英明。1993 年 10 月的一天，延安大学校友会召开大会（这个校友会包括延安的许多学校），在大会上我发言，回忆了这个亲身经历。

5.14 民先临时总队部和太原平津流亡同学会

在海子边见过彭真同志回到典膳所，我正式决定让马寅兼任临时总队部组织部长。我又找到清华同学“一二·九”的

积极分子纪毓秀——那时她是山西牺盟会五个常委之一——要她介绍一位同志到临时总队部担任宣传部长。她介绍了薄怀奇同志。加上我这个临时总队长，临时总队部就有了一个集体领导。

我有一个好朋友，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因为1937年我从北平寄给他一篇少奇同志用华云笔名写的文章，被上海的特务查到，找他麻烦，逼得他在上海搞了一个假自杀，制造了跳黄浦江的一个假现场，自己就跑到了太原，改名卢明德，在国民师范。我找到他，要他到临时总队部来工作，并且也住到典膳所来。他就成了临时总队部的一个专职干部。这样一些工作，我用了两天的时间都办好了，临时总队部就立即正式开始工作。

算起来，应该在8月3日或8月4日，有三位天津的革命同学从沦陷后的天津到了太原。他们是徐达本（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徐达本的爱人（天津的一个中学生，她的名字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刘邦彦（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他们到典膳所来报到，因为他们都是民先队员。那时从沦陷后的北平来到太原的还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和三个天津学生就成立了一个太原平津流亡同学会。这个会的会址也设在典膳所2号，我估计平津学生过些时候总会有许多人来太原，这个平津流亡同学会就可以出面接待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帮助他们找工作，或者动员一些人去延安进陕北公学。

于是典膳所2号就更加热闹了起来。常住人口有马寅、我和卢明德，经常来的人就有薄怀奇和徐达本等。抗战爆发后，

太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房东也不害怕了，他明白这里不是一对夫妻的家，但也不再来管了。

5.15 第一次见周恩来

果真像彭真所说的那样，八路军从陕甘宁边区来到山西，每天太原东门外火车站上都有太原各团体组织的慰问团。民先临时总队部和省队部每天都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去火车站。这件事主要由马寅负责，薄怀奇也积极参加，连我自己也去过两三次。

大概早就安排好的，八路军的战士只是路过太原，不在太原逗留。在火车站只是在站台上休息一阵子、吃点东西、接受群众的慰问之后就上火车继续前进，没有一个士兵进太原城，因此在城内根本看不到八路军战士。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军官进太原城，在城内从事一些上层活动。

我从党内得到消息，我们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太原城内。太原城内的几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起来邀请周恩来和其他八路军的将领对太原城里的群众发表演说。我们民先临时总队部和山西省队部是好几个出面组织这个演讲会的成员之一。当我们听说周恩来副主席和其他几个将领应邀发表演说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次演讲完全是几个民间团体组织的，没有山西官方的人参加。地方只能找到一所中学的礼堂，是哪一个中学我说不准了。那个礼堂的舞台不是现在剧场通常的那种样子凹在

里面的，而是凸在外面。观众只能站在舞台的两侧和台前。在台上的正前方和左右方都有不到一尺高的栏杆。整个礼堂很小，没有座位，站着也只能容几百人。太原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听说周恩来演讲，尽管我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那天到会的仍有1000人以上，礼堂挤得满满的，但是秩序很好。

演讲的时间是在晚上。那时日本飞机常去太原空袭，晚间实行灯火管制，不敢亮电灯。演讲的时候就在舞台的栏杆上点起几十支蜡烛，总算还可以看出演讲者的容貌姿态和表情。三个人中周恩来第一个发表演说。那时他39岁。在长征时（或许在中央苏区时）蓄起的长胡须已经刮去了，显得非常英俊。他讲的主题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演讲中讲到现在在山西当局的合作下我们的队伍经过山西的许多地方开往前线，准备与山西当局和各界人士一起抵御日寇向山西的进攻。他声音洪亮，那时没有麦克风，但是他讲的话在礼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更不要说我就站在靠近舞台的最前面了。演说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最强烈，那就是他讲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为了与日军作战，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界，可是山西当局不仅不合作，反而进行阻拦，而阻拦红军东进抗战的不是别的军队，正是阎锡山统率下的军队。讲到这里，周恩来提高了嗓门，说“那时红军为了开到抗日前线，被迫同你们的阎司令长官决一死战。”他接着讲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已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已来到山西，开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希望得到山西各界人士和广大青年的支持，也愿意取得阎司

令长官的合作，共同抗日。在听他讲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就在阎司令长官统治下的太原，他这样尖锐明确地发表演讲，真有气魄，真能长我们的志气。他的演讲很神气，我们听的人也觉得自己神气了许多。

另外两位将军的演讲也使听众很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去世时的年龄是78岁，我第一次见到他，听到他发表演讲时，正是78岁的一半。

周恩来、徐向前、彭雪枫同志在太原演讲的时间，算起来应该在8月7日或8日（有人对时间提出不同的回忆，待算清楚后，再作补充），也就是离芦沟桥打响抗日战争第一炮正好一个月。上面我就写了这一个月——尤其是7月28日到8月7日这10天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中，我记得的事真不少，有许多是我忘记不了的事情。这个月的头20天我在北平。7月28日和29日除了在火车厕所里和在乞丐收容所呆了几个小时外，30日、31日两天在保定。8月1日就经过石家庄到了太原。从8月1日到8月7日过了一个星期安定的日子。这一个月我并没有日记，而是一天一天推算出来的。每天都有自己认为值得记一记的事情。在听周恩来的演讲之后，我在太原还呆了一个月多一点，也有许多值得记一记的事情，但不是每天都有突出的事情好记了。

6 抗战初期在武汉

6.1 接受去武汉工作的任务

1938 年 8 月下旬，民先总队部总队长李昌从沦陷区来到太原。这意味着总队部正式迁到了太原。李昌到太原后不久，告诉我他将离开民先总队部去北方局组织部工作，要李哲人做民先总队长，我帮助李哲人。后来李哲人调走做别的工作，李昌又回来做总队长。这时太原的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估计不久也会沦陷，于是北方局准备向临汾转移，民先总队部也跟着走。

9 月中旬的一天，党组织找我谈话，告诉我北方局决定要我去武汉，在武汉建立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黄河以南各省（含河南全省）的民先队部与海外民先队部由办事处联系，黄河以北各省的民先工作由总队部直接管。谈话中还要我在武汉办一个刊物。那时长江局还没有成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还都由以

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领导。于是我就接受北方局和民先总队部的派遣，带上北方局写的介绍信，很快地到了武汉。我观念上很明白，这是北方局交给我的任务，这样的工作我是对民先总队部负责的。

6.2 和陶铸、杨学诚在一个党小组

当时武汉还没有党的正式领导机关，我带往武汉的介绍信，要我交给杨学诚。杨是我清华同系（物理系）不同年级（他比我低两个年级）的同学。“一二·九”后平津学生组织了一个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平西郊的学生是这个团的第三团。这第三团有一个先遣队，杨学诚、李昌、我都是这个队的队员。我和他是很熟悉的。他是1937年初北方党组织派去延安参加代表会议的很少几个代表之一（李昌是另一个代表）。在延安的会议上，他发表了一些见解，我知道之后并不完全赞成，但是没有机会当面讨论。

我到武汉时，杨学诚还住在武昌国民党省党部二楼的一间面积很大的房间里。那里是平津流亡同学暂时居住的地方。没有床，所有在那里住的平津流亡同学都打地铺（省党部二楼那个房间是木头地板）。我就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杨学诚，并把介绍信交给了他。我也在那个房间打地铺睡觉。在那个房间里，白天几乎没有人，一到晚上，二三十个人在那里睡觉。

我和杨见面后，就在街上一边走一边谈，彼此沟通南北之间的信息和工作状况。他告诉我，为了发展新党员，他起草了

一个内容相当于党的十大纲领那样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他起草的这个没有某个组织署名的“文件”。其中有一条是“争取党的力量在全国的平衡发展”。这一条我知道是党的正式文件从未提过的口号，现在他写了下来，作为培训党的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的教育材料。我原则上不同意这个提法，认为在华北抗日前线，党的组织应该得到优先发展。但是考虑到这个材料是用来教育在武汉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在武汉应该讲适合武汉的话，因而没有同他争论。那时候我和他都是“风华正茂，少年气盛”，都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可以在抗战前在北平时把刘少奇同志用党的口气写的《论左派》，改成用民先的口气写的文章，寄到各地；他把自己的见解用党的十大纲领的形式写成材料，教育准备吸收入党的人，在当时我们来看都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可以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是没有、也不会从组织观念上去考虑这样做不合适的问题。

到武汉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当白天没有人在省党部楼的时候，来了一个 30 来岁的人。9 月的武汉，天气还相当热，这个人却穿了一件黑色的布大褂，脸上留着小胡子。看样子是杨和他约好这时候在这个地方见面的。杨把他介绍给我（当时用很低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他是陶铸同志。我们三个人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陶是我们的小组长。介绍之后，陶要杨和我同他一起上街，陶对我和杨说，由这三个人组成的党小组是临时性的，并且不久后延安的党中央要派人到武汉来。那天我们三个人只是接了一次头，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陶走后，杨对我说：“你看他这一身打扮，还留着小胡子，

一点也不像平津流亡同学，幸而房间里没有别人，否则一定会引起怀疑。”杨又说：“平津流亡同学中说不定有政治倾向不好的人，何况这个地方又是国民党的省党部！”

我觉得杨讲的很有道理，觉得自己的政治警惕性不如杨高，他不这么讲，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后来杨又对我说，陶才从南京监牢里出来不久，他的行动恐怕是受到反动派特别注意的。不过这时候同抗战前不一样，就是一向实行高压政策的武汉也比以前宽松了不少。事实上我们的小组活动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又过了几天，陶又来找我们，还是在省党部的二楼。见面后又上街。这次他只非常简单地说了一句，党中央派到武汉的同志已经来了。他通知我们隔一天就去汉口的一所中学开会。

我在这个党小组的时间总共不到一个星期，我和他只是见过这样两次面，两次见面的时间都很短。

1982 年聂荣臻去广州主持讨论第二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会议，见到陶铸（那时他是设在广州的中南局的书记），要把我介绍给陶铸。陶铸马上说，用不着介绍，我们是熟人，曾经在一个党小组。在武汉我只见过他两次，从 1937 年到 1982 年 45 年没有再接触过，我对曾与陶在同一个党小组这件事记得很牢，这是因为那时自己是个新党员，经历的事不多，没有想到陶铸的记性竟然这么好。

6.3 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

原来要我去那个学校开的会是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工委)的成立会。中央派到武汉来负责党的工作的是郭述申同志,他在会上宣布临工委成立,说到会的都是临工委的委员,并说临工委当前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发展党员,建立若干支部。临工委委员的分工也是一个委员负责建立若干个支部。

在抗战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湖北没有党组织,但是有失去了与党联系的党员。还有"一二·九"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在武汉建立起秘密民先、秘密学联。我到武汉后的几天中,用我掌握到的武汉秘密民先的地址,把谢文耀、林贤复、范元甄等几个人找到了,并且举行了秘密民先会议。向他们介绍了华北形势和民先的状况。我看这些人的革命觉悟都很高,有一部分人早已有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因此,我认为在武汉迅速发展党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除郭述申和我外,记得清楚的还有杨学诚、谢文耀和余梅青。会上提了一下陶铸也是临工委的委员,可是没有到会。会上分工,杨学诚负责建立省高、一中、女师三个支部,我负责建立省师、乡师两个支部,谢文耀负责建立武汉大学的支部,余梅青是临工委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分工的范围我记不清楚了。

武汉的同志们所熟悉的陈约珥、密加凡、尹卜贞、赵辛初等不少同志就是在临工委这个布置下经过我们的工作入党

的。我做了赵辛初的入党介绍人。

在临工委工作期间，我了解到在抗战前的武汉有一个曾经加入过党的人和一些革命青年曾自发组织的共产党的组织，这就是武汉党那一个历史时期里的所谓“自发党”。后来，杨学诚到武汉，有些自发党的成员就被杨吸收成党员，这也是郭述申建立武汉临工委前的事。临工委建立后，指示杨学诚对前些日子吸收的党员重新正式履行入党手续，党龄从正式履行手续时算起。其实杨学诚自己吸收党员的时间同临工委建立的时间相差不过半个月左右（后来我才知道，在郭之前杨也在武汉成立了党的临时工作机构，也有临工委的说法）。

回忆起余梅青，在这里附带说一件事。她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就在临工委成立的那一天，她告诉我，由于考虑到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时会遇到麻烦，如果加入青帮，亮出这个身份，就有可能化险为夷。她告诉我，李昌、孙传文等民先总队部和北平地方队部的几位同志都已经加入了青帮，她自己也加入了。她说中国大学有一位姓邝的教授，他的辈分比蒋介石还高，拜他做老头子可以不磕头，只要鞠三躬，给两块大洋就可以了，这个邝教授正在汉口，问我是否也参加。我同意了，并给了余梅青两块钱。隔了一天，也就是在开临工委成立会的那个会议室，向邝鞠了三躬，邝给了一张印有一只船的小纸片，告诉我所属的船只旗号，还告诉我他是我的本命师，我还有一位传道师没有来，要我记住他的名字。他还对我讲了一通帮规和使用的语言。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用上这种身份。那天拜邝教授做老头子时，不止我一个人，同时还有两位同志，

不过记不起是谁来了。因而余梅青还是我的“师姐”哩!

6.4　1937 年在武汉民先办事处和《呼声》杂志的工作

临工委全力做在武汉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工作，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管青年群众团体的事情。因此，北方局和民先总队部交给我的任务，就只有我独立地去进行，不能、不必、也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向临工委去请示，干扰临工委的工作，也不可能得到指示，虽然我的组织关系已经在临工委，不同陶铸、杨学诚在一个小组了。

在国民党省党部继续打地铺当然不行，我很快找到了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那就是聂瓒绪（现名聂菊荪）的家。聂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那时也已经是党员。他的家在武昌城内西门的一条街上，房间不多，而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能住下我们几个人就行了。住在聂家，一开始是我和跟我一起从太原来帮我做民先工作的卢明德（本名程淡志，是我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在我去武汉前不久在太原入党），以后谢邦治来武汉参加民先，也暂住在这里。有了地方，就马上把摊子铺开，给各地民先队部去信，发资料，工作方法同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工作时差不多。在那段时间里，过路的民先队员还不知我们住的地方，找来的不多。

《呼声》杂志也马上筹办。我找到当年“一二·九”参加者武汉的鲁明健帮我工作。诗人柯仲平从日本回国，也来我这里

编《呼声》。那时我不会编刊物，《呼声》的文章比较枯燥，民先的对头、国民党的党棍子陶希晋看到《呼声》，非常敏感地说，这准是民先队办的。

民先和《呼声》的工作是我在太原接受的任务，是不能不做的。这里临工委分配我的工作也是很紧急的任务，也必须完成得好。我不想对临工委反映我的难处，因此只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早起晚睡，不知道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把休息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那时我忙的程度。有几天我牙痛了起来。牙痛不算病，痛起来可真要命，很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可是我没有时间进医院，在武昌大街上看到一个“镶牙补牙”的小店，我就进去求治。他们要我拔去那颗病牙，其实只需要补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被拔去的第一颗牙。拔后倒是不痛了，这个小店要的钱也不多。三年后我在延安，去医院也是看牙，医生说，那颗牙的牙根还在里头，才重新把牙根拔了出来。幸亏那几年留下的牙根没有出问题。

6.5 洪湖之行

临工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它就升级为湖北省工委（以后才正式建立湖北省省委，那是我离开省工委以后的事）。省工委的书记还是郭述申（省委书记是董必武，郭任副书记，管常务）。省工委任命我为这个委员会下面的农委委员。我们这一任农委书记是李华，他是 20 年代的党员（后任书记是

方毅），有两个委员，一个是何功伟（何斌，40年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还有一个就是我。

到省农委后，分配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鄂西去整顿那儿的党组织。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洪湖地区自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后，这个苏区就重新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党员大都跟着红军走了，但是也有一些党员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走成，留在那里。这些同志已经失去了组织关系，但革命的积极性很高，经过串连，公安、石首、监利、华容等地的党员（其中华容是湖南省的一个县，其余都属湖北省）慢慢组织了起来。后来又有一些党员从外地回来，同在洪湖的党员取得了联系。“一二·九”后，荆州沙市有一些青年也积极找党。于是就在上述说到的那几个县和荆州沙市自发地建立起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以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同上级没有联系，得不到指示。湖北在抗战前有两个“自发党”，一个在武汉，一个就在鄂西。

抗战爆发后，国共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有了八路军办事处。到1937年秋后，他们打听到湖北省工委已经成立，于是就派邓东（陈中旺）到武汉找到了省工委，要求承认他们的组织并指示工作。省工委就派我这个农委委员去那里考察这个组织的状况，相机建立那儿的党组织。省工委具体向我交代这个任务的是组织部长钱瑛大姐。

这时我不到22岁半，是个新党员，以前一直是做青年群

众团体的工作，对农村工作、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毫无经验。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组织上既然要我做农委的委员，又交给我那样的任务，我也就“勇敢地”接受任务，很快地由邓东陪同，坐船去沙市。

到沙市上岸后，我们步行到荆州——江陵城，住在城内邓东家里。我要邓东通知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来江陵，我要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

洪湖自发党的组织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王凤亭，宣传部长夏阳，陪我前去荆州的邓东是组织部长。

一到江陵，我就同邓东详细谈话，了解整个洪湖自发党的建立经过、有些什么样的党员；王凤亭和夏阳两人以及他本人的情况；自发党成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很快我就见到了王凤亭和夏阳。王是洪湖农民出身的干部，外貌谈吐也完全是个农民，人很精干，洪湖几个县的党员都是他联络上的。由于没有人告诉他党的政策已经从土地革命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前他还在他们活动的地区执行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政策。他自己还正在做当地土匪的工作，想利用土匪和把土匪队伍改造过来。夏阳是个小知识分子，两年前从南京自首院出来，出院前履行过一个手续，写过几句自首性质的话。出院回到当地后，立即搞革命工作。在同我谈话中，他对自己出院前的行为表示深切的忏悔，表示愿意立功补过。这几年他的行为也的确证明他在悔过自新。我感到他对党组织没有想隐瞒什么，只是希望我能代表党组织理解他、谅解他。我对他进行一番气节教育，批评了他，也鼓励他继续为革命奋斗。

个别谈话之后，我把三个人找去一起开会，要他们对公安、石首、监利、华容的党员状况和工作状况，就他们所知道的一个一个地汇报。他们对这四个县几十个党员每个人的情况都能介绍得很具体。我对农村缺乏了解，对他们这样有血有肉的介绍很感兴趣。为了完成去鄂西的任务，我对每一个党员的出身、职业、家庭状况，参加革命的动机、表现，个人的性格与能力问得很细。一面听，我一面想，这些人同我以前接触到的党员很不相同，很难对他们做出恰当的评价，认为这些人能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很不容易。

这样的汇报进行了一天半，再用半天讨论党的路线政策。看来他们对统一路线政策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只是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问题，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给他们做了回答。

江陵几天的调查，使我做出省工委可以承认这个组织的判断。几十个党员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大都表现得很不错，不但对党非常忠诚，而且行动积极，至于在执行中有些毛病，这是应该谅解的。做出这个判断后，我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说还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接着我就去沙市。沙市的革命青年很活跃，有一个叫余鸣籁（余杰）的是当地青年运动的组织者。他与王凤亭的自发党有联系，主要是与邓东建立了关系，但邓东他们没有吸收他入党。因为鄂西这个自发党的成员都是原先的党员，没有发展新党员。

余鸣籁对在城市学生中做青年工作这一套相当熟悉，在沙市学生中用读书会的形式提高学生们对时事的认识，也通

过搞歌咏队这类文艺活动的形式，更广泛地团结青年学生。我去沙市的目的是考察那儿的党的积极分子，考虑发展党员的问题。余鸣籁是我了解的主要对象，因此找了他个别谈话，谈了不止一次，了解他本人和团结在他周围的积极分子。我觉得他的觉悟和我在武汉接触到的地方民先队员差不多，具备可以发展为党员的条件。他也有愿意入党的要求。和他谈过后，我又让他把他团结的四五个党的积极分子作了介绍。余说这四五人有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我找来谈了一次，亮出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介绍党的主张，要求他们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沙市我采取了与在江陵不同的工作方式，在江陵我不公开露面，一直呆在邓东家里，除"支部"三个人外，我只见了在江陵的几个党员，而且都在邓东家里。在沙市我就公开以民先总队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在群众中活动，向青年们作关于全国和武汉青年运动状况和任务的演讲。

本来我还应该到洪湖各县的农村中同参加这个自发党组织的成员直接接触，可是我有民先办事处和《呼声》的工作在武汉等着我，我人来到了鄂西，可对武汉那一摊子工作放心不下，因而有一个急于回武汉的心情。同时我同王凤亭商量，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到下面去活动以什么名义、以什么身份出现好？一个外地人一下子在他们所在的农村出现，对这些党员的处境会不会发生不好的影响？王表示我以不去那些地方为宜，但是我要去，他也会想法掩护我的活动。我看出他有顾虑，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不下去。因此我又从沙市回到荆州邓东家

里，把原来支部三个人找在一起，这时我发表意见说，我认为可以承认他们这个组织，在他们的活动地区建立一个湖北省工委领导下的“荆州沙市特别支部”（简称“荆沙特支”），公安、石首、监利、华容和江陵各先建立一个党小组。沙市则发展余鸣籁入党，并由余鸣籁去发展那四五个党的积极分子，也在那里建立一个党小组，也由荆沙特支领导。这个荆沙特支的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不变。我说你们可以去发展那些觉悟程度高的人入党，在人数多起来之后，各县就可以改党小组为支部，你们这个荆沙特支也带有党委的性质，也可以改名为特委，不过这要请示省工委。对我这个决定他们当然很高兴，不过我说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到武汉后还要向省工委汇报，要由省工委做出最后决定，不过你们可以先按我的意见去工作。

我要他们造一张各小组和荆沙支部的名册，带回给省工委。我做出决定并同他们三位讨论后又去沙市，由我做介绍人介绍余鸣籁入党，并主持了宣誓仪式。

我没有再回江陵，一个人坐船回武汉。

回武汉后，我向钱瑛和李华做了汇报。汇报后，钱瑛认为我那次去鄂西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任务完成得不那么好。她认为让夏阳这样的人当宣传部长不合适。我自己也认为做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承认自己掌握的分寸太宽了一些。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省工委又派了组织部干事罗卓夫第二次去那里，继续完成钱瑛认为我没有完成的任务。不过那时候我已离开省工委去了长江局。以后的情况也是别人告诉

我的:罗卓夫去鄂西后,改变了我的决定,没有让夏阳当宣传部长,但保留了党籍。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与鄂西的同志也没有再联系。

1939 年我去延安后,知道余鸣籁在 1940 年是作为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的代表去了延安,可见省工委(后来改为省委)还是很看重他的。不过在 1942 年整风和整风后的审干中,余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把他参加党的七大代表的资格取消了。这当然是冤枉的,后来经过甄别,纠正了这个错误,可是七大他还是未能参加。当时曾有一种说法,说我代表省工委承认的那个鄂西党是个"伪党"。而据说苏区的规矩是凡上级派去整顿组织的人,就算是半个介绍人,因此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对那些党员(其中包括余鸣籁)承担责任。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许多起。当然这个党组织并不是"伪党"。

现在我任命的原荆沙特支的三个负责人都已谢世了。王凤亭做土匪工作,不知道为何被土匪杀害了。邓东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夏阳一直留在党内,工作很好,不知何时也去世了。余鸣籁(现名余杰)前几年还在武汉任教育局长,可是几次去武汉一直没有见面,不知现在情况如何。钱瑛大姐则已过世多年了。

6.6 争取集中力量做青年工作

1937 年最后的两个月,在工作上我是很苦恼的。

一个人要同时做青年和农民这样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工

作是很困难的。何况这两者又都是党组织要求我做好的。加上做青年工作要求在武汉，而农委委员的工作要求我经常下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实在不能兼顾，对此我实在发愁。

对当时党的工作部署我有这样一种理解：抗战后不久，八路军得到去华北抗日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机会，于是党就决定用最大的力量在华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民先总队部也非常拥护这一点，并在自己工作的部署上也强调队员留在华北抗日前线。于是总队部的其他负责人全都留在华北，只派我一个人去武汉。派我去武汉，是考虑到华北地区外的这个广阔的地区，在中原、东南、华南、西南各省也要去开展党的工作，因此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全国性的骨干青年团体的民先队也要去进行工作。

这个工作只派我一个人去做，我感到责任是很重大的。我必须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同时湖北在党的全国工作中的地位我也感到非常重要。特别是去荆沙走了一趟，对洪湖地区党的斗争历史和工作基础有了一番了解之后，认为这些地区将来应该成为重要的革命的支撑点。从北平、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很快被日军占领的情形来看，武汉沦陷的事也只是时间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武汉沦陷后，党的工作重点势必转到农村去，像洪湖这样的地区一定会重新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农委的工作我也应该全力去做。对这两种工作的责任感时时在我脑中斗争，真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从我个人的工作方面来考虑问题的。

从更广阔地区的青年工作的角度来考虑，在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求得一个解决。因为在这个大半个中国的广阔地区，党的青年工作究竟怎么做，方针如何并不是很清楚的。由于没有党的统一领导，青年党员之间存在不少不同意见的争论。离开太原时交代我到武汉去搞黄河以南民先的工作，除了设立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和办杂志这两条外，在青年运动的方针上没有指示我怎么去做。我到武汉后，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只做了些扩大民先的影响的工作。杨学诚热心在武汉成立青年救国团我是很支持的。武汉有的青年向我表示愿意参加民先，我就要他去参加青年救国团。广东省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而不成立民先队我也赞成。但是整个说来民先该怎么办，我认为不是我能够拿主意的事。有些反对发展民先的公开议论，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又没有主张在全国发展民先，特别是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在路线方针等方面给各省的民先队以帮助。而在武汉我们听不到党对这方面工作的指示。外省民先组织在同我们联系时经常提出要我们给他们政治上以帮助，而我们做不到。因此仅就民先工作这一方面来说，我也感到很苦恼。

从个人和从整个青年工作两方面出发，在 1938 年 1 月，当我了解到中共长江局在武汉成立之后，就写了一封关于加强长江局对青年工作领导的建议信送到长江局，其中提出建立长江局青委的建议。信中也反映了我个人的苦恼。除了这封信之外，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习笔记一起送给长江局，想听听领导同志

对我这个学习心得的评论。

这封信寄出之后，很快长江局的领导人——我说的是王明——找了我、杨学诚、蒋南翔、谢邦治、张维明五人去。杨这时候是湖北省青委书记。蒋南翔刚从山西临汾来到武汉，在做与全国学联联系的工作。谢邦治在民先武汉办事处做临时工作，他是北大学生，“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建国后曾任我国驻芬兰和上沃尔特的大使）。张维明是中国大学学生，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任董老秘书。王明在会上说长江局研究了于光远的建议信，同意在长江局建立青委，现在这个青委就成立，参加这个会的都是青委委员，并说你们推出一个人当这个委员会的书记。我推举蒋南翔，蒋南翔推举我。王明说，就让于光远当青委书记吧。

于是我不再担任湖北省农委委员的职务，集中力量做党的青年工作。党外做民先总队部办事处主任，党内做长江局青委书记。我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6.7 长江局青委成立后

长江局青委成立之后，在工作上我的信心提高了。我决定支持湖北青年救国团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工作，重申不在这两个省发展民先，其他的一些省份，用什么名义建立党领导下的骨干青年团体，视各地情况而定。长江青委成立后，我们派谢邦治同志去河南，兼河南省青委书记。临走时我告诉他，河南省因为 1937 年初郑州和开封两个地方队部被国民党

反动派彻底破坏，我估计在河南成立民先队部，青年们会心有余悸，也不要马上建立民先队部。中大学生、民先队员、党员张益珊从贵阳来到武汉向我报告，他从北平回贵州后，已团结了一批青年革命工作者，打算建立民先队部，问我是否可以。我同意在贵州建立民先队总部，并说就由他负责去做这件事情。不久他从贵阳来信，报告民先贵州队部已经成立。南方各省那时有民先队部而且力量比较强的就只有四川成都地方队部和这个新成立的贵州贵阳队部。但是各省的青年运动开展得很不错。那时候我有时以民先总队部的名义，有时以长江局青委的名义处理工作。

我是长江局青委书记，同时兼民先总队部的工作，自己认为一定要注意避免对民先特别偏爱。当我发现有一位同志在当时武汉出版的刊物上公开提出应该发展民先后，就以青委的名义找他谈话，批评他把党内的不同意见拿到党外去，在组织上是不允许的。这位同志马上表示自己那么写是错误的。

我在长江局工作任内，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解决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问题。清华、北大和南开三个大学在平津沦陷后迁往长沙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到 1937 年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看到长沙有可能很快成为前线，决定搬往昆明。这时党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国民党逃跑主义的表现。我们长江局青委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战争期间不应该中断教育事业，指责内迁昆明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这也会使我党脱离群众。我还认为在云南我们党的力量薄弱，三校内迁之后，可以在那里壮大党的力量。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

中也有人认为抗战前线也很需要人，谁跟着学校去昆明，谁留在华北、华中，需要有个统一安排，于是我在请示长江局之后前往长沙。对那次长沙之行，我另外写了一篇《第一次到长沙》，在湖南省作家协会办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

1938 年 1 月到 3 月，我当了两个多月的长江局青委书记。3 月底或 4 月初，宋一平从延安到武汉。宋是老资格的党的青年工作者，抗战前在少共国际当执行委员，长期在莫斯科。也就在这个时候李昌、黄华来到武汉，于是长江局决定改组青委：由宋一平任青委书记，黄华、李昌和我三个人任委员。李昌是民先总队长，他当然领导总队部工作，但是武汉办事处主任的工作还是由我去做。黄华的工作我不很了解。张维明不再当长江局青委委员。杨学诚和谢邦治一个负责湖北、一个负责河南的青年工作，就不再兼任长江局青委委员。蒋南翔也没有参加青委。宋、李、黄都住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外面。

那时在武汉有这样几个青年群众团体：一是全国学联，它是由蒋南翔同志领导的，他担任青委委员时是这样，不当青委委员时还是由他管。在长江局改组后，全国学联有一项工作是长江局青委直接管过的，那就是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外地有一些学联代表到武汉。这个代表大会的报告由广州来的吴华做，报告稿是蒋南翔主持起草的，长江局领导青委的何凯丰审改。这个报告一开头引用《松花江上》这首流行得很广的歌词是何凯丰加上去的。在党领导的青年工作中，这样规模大而且比较隆重的会议，在那个时期只开过这一

次。

那时在武汉还有一个青年救国团，它是湖北省青委的同志组织起来的。青年救国团的工作没有在长江局青委讨论过，几个青委委员也只有我同青年救国团的人熟。青年救国团的总部也在武昌，地点是三道街39号，我常去。青年救国团的许多同志我都很熟，胡克富、密加凡等许多同志至今都有来往。

还有一个青年团体的工作倒是在长江局青委研究过的，那就是中国青年救亡协会。

青年救亡协会的主席是国民党元老叶楚沧的儿子叶南，秘书长是他的夫人袁晓园，组织部长是他的妹夫赵梅生。袁晓园的妹妹袁行庄（后改名袁静）和弟弟袁君实都在青协工作。钱俊瑞是负责与这个协会联系的党员，他在协会中担任宣传部长。叶、袁两家族都靠拢党，赵此时正在解决他的重新入党问题。叶、袁成立的这个组织想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希望得到党的支持。钱俊瑞把这个问题提到长江局青委来，青委同意给予支持，请示长江局得到同意，于是民先和全国学联各派一个代表（民先的代表是我）做它的领导成员，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民先总队部还派刘导生同志去青协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叶南虽与国民党中一些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蒋介石不支持，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工作越是不能顺利进行，越需要得到我们党的支持。我们长江局青委也就决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也帮助它扩大影响。1938年2月袁宝华同志从河南南阳来武汉，找到了我，研究在河南成立青年救亡协会分会的问题，长江局青委同意成立这个分会。青协派

了赵梅生去，谢邦治作为河南青委负责人也参加了它的成立会。那时开封已经沦陷，青协河南分会是在南阳举行的。青协越靠拢我们的党，国民党对它就越不喜欢。最后国民党三青团成立，青协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这时武汉还有许许多多青年团体，搞了许多与青年有关的活动，但是都比较小，我同他们中间的不少组织有联系。

在长江局青委改组后，青委还派我去南昌帮助陈丕显同志做开展南昌市青年运动的工作。在南昌，我也有一些经历想写成回忆文章，不过因为这些事不发生在武汉或湖北，在这里就不写了。

6.8 武昌育婴堂街7号

育婴堂街7号是1938年1月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地址。1937年底夏农苔同志从法国回到武汉。在法国时，他已经是党员，同时又是民先巴黎队部的成员。我听说他家在武昌蛇山脚下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就跟他商量要几间房给我们用。他很快地做出了安排，让我们住了进去。

在这个院子的大门和二门之间有一个狭长的院子，大门两侧有对着二门的四间房，就让我们使用。夏农苔的家人就住在二门里面。我从未进过二门，里面究竟有几进，都有些怎样的房子，至今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了这样几间房子，而且地理位置又这么好，办事处的工作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马上就离开原先所在的聂瓒绪同志的家，搬到育婴堂街来。

这一处工作地点刚安排好，就有两位青年拿着延安陕北公学民先队部的介绍信到这儿找我。信上说，这两位愿意到武汉来工作，希望办事处协助解决。这两位都是湖北人，一位是毛雍如，他是黄梅人，一位是蔡锦楹，他是房县人。陕公民先队部就是因为他们两位是湖北人，希望他们回到家乡来工作。这时候卢明德已经被湖北省工委调回黄安参加办党训班，谢邦治也被调去开封负责河南省的青年工作，办事处正缺人手，我就同他们两位商量，留在办事处工作。有了房子，有了他们两位，民先总队部办事处的工作就正规地开展起来了。

1938 年，民先总队部办事处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来来往往的民先队员都会到办事处来取得联系，从这里听取总队部对当时政治形势和青年工作任务的看法，请总队部帮助解决自己的某些问题。各地民先队部更要到这里来汇报工作。外地来的包括海外归来的民先队员，也会到民先办事处了解形势和工作方针，乔冠华、张铁生从德国回来即到民先办事处来。

有了这四间房，来往的民先队员没有地方住的，就住在这里。当时在两间房里搭起了长条的通铺，一个铺可以睡五六个人，大家挤着睡。办事处的工作也很忙，因此凡是住到育婴堂街来的，我们都要他们做些工作。也有正式分工的，比如武衡和刘导生两位都做过“统战工作”，即对外联络的工作。建国后在统计局工作过的常城臂部受伤，来武汉也住在育婴堂街 7 号。还有一些同志，虽然不是民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可是常来这儿工作，什么工作需要人手，他们就参加，苏州来的顾文

华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民先办事处工作的人，流动性强，可是毛、蔡两位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在办事处工作，他们是这个机构的骨干。刚来办事处时，他们两位都还不是党员，可是毛参加革命比我早得多，20 年代就是共青团员，不久，我就介绍他们两位入了党。当时，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同东北救亡总会住得很近，两个单位里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每个单位的党员又各自编成一个党小组。我和他们两位在同一支部、同一小组，毛还是我们这一小组的小组长。

毛、蔡两位是民先总队武汉办事处的骨干。到办事处来的人都是他们两位接待。经他们动手以办事处的名义写的介绍去陕北的信，每天都有好几封。许许多多问题，凡是他们两位觉得自己可以解决的，就都处理了，需要我知道和做出决定的，他们才要我办。但是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只要我不是“出差”或者到汉口开会，他们做的工作当时我都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办事处的事主要是他们两位做，沈毅从法国回来参加抗战，他是里昂队部的民先队员，我也把他留在办事处工作，不过他主要做统战工作，白天在育婴堂街的时间不多。

我对自己在武昌育婴堂街 7 号过的那些日子和当时一起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很是怀念。1985 年我去武昌，请当时在武汉一起从事青年工作的朋友密加凡陪我去育婴堂街寻找那所房子，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不但街名变了，而且那所房子也没有了。最后了解到街名改了，并且在中日战争期间，日军看中了这所房子的木材，把它们拆了做军用。当时青年救国

团活动的所在地三道街 37 号，我们总算把它找到了。蒋南翔等同志编《战时青年》时居住的武昌胭脂巷，原先是在蛇山脚下的一个小土坡上，当我去访旧时，那个山坡上已不再有“胭脂巷”，而只有一条比较宽阔的“胭脂路”了。

6.9 长江局做出关于在全国建立民先队部的决定

我去南昌的日子，曾经记为 1938 年 4 月，由于我在武汉过“五一节”的记忆是很清楚的，我在南昌工作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经过一番盘算，肯定是 5 月到 6 月，不是我曾经说过的 4 月。6 月从南昌回来后，我第一次列席了长江局的会议。

这个会议专门讨论青年工作，没有其他议题。四个长江局的委员都到会。而我们四个青委委员也全部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王明首先发言。他主张以长江局的名义做出决定要在全国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民先地方队部，使得民先成为党领导下的主要的骨干团体。各地已经建立起来的性质上类似民先的团体，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湖北青年救国团的队员与团员都转为民先队员。他提出这个主张的理由的大意是：1935 年党中央决定把 CY（共青团）归入党内之后，民先在北平、天津等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平津之外的各个地方建立了一些队部，民先有了全国总队部，但是抗战后没有在全国普遍发展，各地成立了如青抗先、青救团的团体，现在国民党成立了陈诚做头头的三青团，声势和规模都搞得很大，如果我们还是各地分散成立各青年团体，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团体和三青团抗衡，同国

民党讲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时我们就会处在不利的地位。而新建一个全国性的强大的青年团体不容易，也不可能及时成立，考虑只有利用民先做基础才比较合适。长江局的委员们也就同意他的这些意见。于是长江局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就我的认识而言，在王明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改变青年救国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名称的意思。民先队在这些性质基本相同的群众团体中当然是老大哥。在不与其他团体产生矛盾的情况下，一些省份中如果有条件，我是愿意发展新的民先队员和建立队部的。但是有些省份已经建立和发展起类似的群众团体时，我就没有想去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队部的意思。我在武汉直接感触到青救团员对青救团有着浓厚的感情，青年们总是对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更加热爱。我认为没有一定去发展民先的必要。民先同他们建立姊妹团体的关系也很好。当然我也不那么满意的是在看到湖北青年救国团的负责人中有人热衷在别的省份也去建立青年救国团，我认为这对青年救国团偏爱得近乎狭窄了。可是当王明这么提出问题时，我觉得毕竟是党的领导人，问题看得深，就完全接受他讲的那一篇道理。长江局青委的四个委员和我知道李昌是一定会赞成这个意见的，在那天会议上，他就表示赞成这种主张，宋一平、黄华也都同意。会上没有请湖北省青委书记杨学诚列席，如果他列席，我想他就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三青团已经成立，所以我们的行动就要快。会上要求把这一决定迅速传达到各省。于是要求青委起草这个决定的草稿，

长江局审定后发出，还说青委要迅速派人去广州和武汉进行传达，迅速把湖北、广东等省的民先队部组织起来。王明主持下做出的这个决定事实上没有能够贯彻，第一个原因是战争形势发展得太快了，原先以为比武汉安全一点的广州反而比武汉先被日军攻占，武汉也就在广州沦陷后不几天沦陷了。第二，国民党在政治上倒退得很快，它了解到共产党将要在武汉和全国发展民先之后，不但很快宣布不允许民先活动，就是青年救国团的活动也取缔。第三，党中央也不同意长江局做出这个决定，从组织上说，长江局只是中央派出机关，关于全国青年运动中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请示中央就由长江局做出决定，而且立即贯彻是不符合党规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我们只认为这个决定是党做出的，作为党员就应该努力贯彻。

附一

渡船上的冯玉祥

我本来不会有机会见到冯玉祥，就1938年我从事的活动性质而言，我也不会想法去找他。但是那一年在武汉我却几乎每周都见到他，甚至有时一个星期内见到他不止一次。

说起来也很平常：我住在武昌，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在武汉的负责人。民先武汉办事处设在武昌蛇山脚下的育婴堂街7号。我经常在那儿工作，可是我又是长江局青委的委员。长江局机关在汉口，我每隔一两天就要去汉口

一次，这就经常要坐渡轮过江。有一次我同武汉的一个朋友一起过江，他指着一个人的背影对我说“他就是冯玉祥”。当时和以后见到他时，我就注意观察了他：他身材高大魁梧，似乎总是独自一人，我相信他一定会有随从，但没有一个近到他的身旁，没有一个跟他谈话。他的面部很严肃，没见到有什么表情，总是在上下渡轮的口子旁边，面对着大江，望着江水，默默地站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常同我一个时间上船。依我观察他似乎也住在武昌，因为我和他同船从武昌去汉口时总是在上午，而我同他同船回武昌时总是在下午。我也注意到他上船下船时没有汽车接送。我真不知道那时他常从武昌去汉口为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冯玉祥在武汉的处境和思想情感，我只是知道他是著名人物，而从他的举止来看的确非常平民化。他似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事实上他也很安全地在武昌汉口之间渡来渡去。过了许多年，我去泰山游览，看到冯玉祥的白话诗《我》刻在脚下的一块很大的石壁上，开头的句子就是“平民生、平民活、不爱钱、不爱阔。”看到这几句，在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他的背影，面对着大江，默默地站着。

附二

长江局机关生活回忆片断

1938 年 1 月起，我在长江局机关工作了七个多月。

长江局的机关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那座建筑物里。

这座建筑物本来是日本大石洋行的行址，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不知道在后来哪次战役中被毁坏了。武汉市的同志为了纪念，找了不少在那里居住过的老人了解那座建筑物的情况，在原址尽可能按照原来的样子重建了，成了现在的八路军办事处博物馆。因为我也在那里工作过、生活过（虽然不是经常住在那里），也来访问过我。我对这个建筑物留下比较清晰的记忆。我还能提供一些情况。有一次去武汉，我到那个博物馆去了，又提了一些意见。想当年长江局四个委员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都住在那里。四个委员中，何凯丰是分管青委的委员，经常参加青委的会议，见面次数最多。我在长江局工作前一段，见到王明的次数也比较多，那时没有明确凯丰管青委，我就去找王明。在长江局机关吃饭分大灶小灶。我住在外面，到机关吃饭时都在小灶吃，四位委员常常同桌吃饭。董老几乎每天都在机关吃饭，他是办事处主任。长江局组织部长黄杰也是这样，在吃饭时常常见到八路军的将领彭雪枫、罗炳辉、李涛等，这些将领我不清楚是办事处的成员还是到武汉商量事情来的。在饭桌上可以听到各种方言的谈话，也经常听到爽朗的笑声。

长江局的会议我只参加过一次，那次长江局四个委员全到了。这是一个专门讨论青年工作的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因此把我们四个青委委员都叫去列席了。那是1938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开会的地点在八路军办事处楼上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会议室现在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个问题讨论了两个多钟头。当然是王明讲的最多。讨论时，我记得没

有发生什么争论。会上我不记得周恩来的发言都讲了些什么，只记得由于武汉的飞虫很多，夏天又不能关闭门窗，许多有趋明特性的虫子就围着电灯泡飞。不知谁想了一个办法，在灯泡底下弄了个纸兜，虫子就在兜里，飞不出去了。在那次会上，周恩来过一会儿就用手去捏那个纸兜，把兜里的小虫子弄死。几年前我去参观博物馆，在那个房间里挂着一盏可以拉下来也可以推上去的电灯，完全符合我回忆中的那间房子内的陈设。我只是希望夏天还可以弄一个纸兜挂在下面，我还记得那纸兜是白色的，它的样子我也能回忆出来。

1938 年的“五一”节，我是在长江局机关过的。那天，从长江局委员到警卫战士、“小鬼”、炊事员，晚上在一起开了个庆祝会。这一天也为吴玉章过 60 岁的生日。他是 1878 年生人，比徐特立只小一岁。那一天宋一平和小吴结婚，这个庆祝会同时也就算做他们举行婚礼的仪式。会上长江局的领导、吴老等都讲了话，宋一平也讲了几句。会议虽然简单朴素，可是我很喜欢那个气氛。

那时我还没有到延安，当然也没有到过苏区，不知道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总觉得到了长江局机关里就好像到了革命根据地，有一种和旧社会很不一样的气氛，因此自己也就有与在旧社会——这旧社会就在当时这座建筑的门外——很不一样的心情，主要是在那儿人和人的关系和旧社会里不一样。那时候我不懂得在党内还有尖锐的政治斗争，不知道有王明路线这回事。

附三

全国学联在武汉

我不是写这段历史合适的人。我只知道一些有关全国学联那时的情况，但是了解得很不具体。照说我在长江局青委工作应该对这个团体有较多的了解，但是因为有蒋南翔在抓这个工作，我就觉得自己用不着多操心。不过当时在全国学联工作的同志，许多已经作古了。蒋南翔是最有资格讲这段历史的人，他是全国学联党组织的领导者。当他是长江局青委委员的时候，他在青委中的分工也是在这个方面。以后不再担任青委委员，他与全国学联的关系似乎没有变。可是他已去世好几年了。除蒋南翔同志外，祁式潜、郑代巩也是在全国学联工作的，他们也不在了。与蒋南翔同志很接近，同全国学联关系相当密切的何维登（后改名何礼）、杨德基（后改名杨述）也不在人世了。我记得李赓同志也在全国学联工作过，他还健在，我想他可以提供比较多的情况，可是我没有同他共事这段历史。

现在我只是就当时接触到的两件事说一说。

一是1938年6月间，全国学联的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为这个会议做准备的是当时在武汉做全国学联工作的同志。蒋南翔是主要负责做这件工作的人。在大会作报告的是来自广州、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吴华（后改名吴济生，也已经作古了），报告是蒋南翔主持起草的。对吴华的报告，

长江局负责青年工作的委员何凯丰也花了不小的气力去改。这个报告一开头，引用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几句歌词就是何凯丰加上去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在武汉召开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会议。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武汉办了一个刊物《战时青年》，它虽然似乎不是全国学联的机关刊物，但它是蒋南翔、杨述、何礼等几个同志编的。在武汉时我把自己办的《呼声》与《战时青年》相比，我认为《战时青年》比《呼声》办得好。蒋、杨、何居住的地方，也是这个刊物“编辑部”的所在地，是武昌胭脂巷。那是一条紧贴着蛇山、建在比地面高六七米的土丘上的小巷。现在武汉已经没有这样一条胭脂巷，而是在邻近地面上建有一条比较宽的胭脂路了。

附四

在武汉到过的地方

抗战八年，后六年我在延安，前两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河北、山西、湖北、广东、武汉，其中在武汉呆的日子最长，从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几乎占了前两年的一半。那时自己风华正茂，少年气盛，可记之事不少。今早躺在床上，回想那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倒也有趣，每处都可讲一段故事。受时间篇幅限制，只把记得起来的武昌11处，汉口6处，外加渡轮1处，共18处，基本按照时间次序开一张单子。

(1)武昌国民党省党部。我一到武汉，就在那儿二楼睡地

铺，那是收容流亡学生的地方。那时杨学诚、我和陶铸在一个党小组，陶是小组长。党小组在这省党部碰过头。

（2）武昌聂璐绪家（聂是武昌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我到武汉后，就在他家从事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和我主编的《呼声》杂志的工作。

（3）汉口的一所中学。党中央派来郭述申到武汉重新建党，他就在这所学校召开了一个小会，宣布成立党的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郭是书记，我是委员之一。

（4）（5）武昌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和乡村师范学校。临工委分工要我在这两所学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6）武昌武汉大学。我在那里召集抗战前已成立的民先地方队部的成员，同他们见面。

（7）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党的长江局机关就设在那里。1938 年起我在长江局青委工作，经常去那里。此处现建为纪念馆。

（8）武昌蛇山脚下的育婴堂街 7 号。我在这里工作，也住在这里，是我在武汉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它是民先总队部办事处的所在地。80 年代初去武汉找不到这所房子，原来抗战后期日军看上了这里的木材，拆房取木，毁掉了这个院子。

（9）武昌三道街 39 号。它是武汉青年救国团所在地。我常去。那次去武汉找到了这所小楼，不过已经很破旧了。

（10）在武昌胭脂巷蒋南翔等租了几间小房住在那里，编《战时青年》。现在“巷”扩建成“街”，那几间房，连房下的土丘都推平了。

(11)武昌芸花林有一个礼堂,一次王明在那里演讲,我和蒋南翔去听了。回家的路上,两人对这次演讲不敬地议论了一番。

(12)汉口一家旅馆。民先柏林队部的乔冠华、张铁生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我去过他们两人合租的房间,找过他们。

(13)汉口一品香西餐馆。上海、北平两个救国会1938年春在武汉会合,组成了一个政团"抗战建国协进会",它是今天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在这家西餐馆举行成立大会,推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我被推选为一员。

(14)汉口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会址。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元老叶楚沧的儿子叶南在党的支持下成立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作为民先总队部的代表,我参加它的领导机构。

(15)韦君宜在汉口的家。我去找她,也见到她的妹妹魏莲一。

(16)武汉一家邵阳面馆。叫了一碗牛肉面,辣极了。那时我靠每月党发的10元钱生活,花了钱不能不吃。

(17)武昌街上"镶牙补牙"的小店。牙痛,忙得上不了医院,马马虎虎进去把那颗牙拔掉了,许多年后发现牙根还在里面,幸而没有发炎。

(18)那条渡船经常坐。在船上常见冯玉祥将军。

是否只到过这18处?当然不。在武汉我还记得做了一些事,可想不起是在哪儿做的。

写到这里一看,一篇"流水账",这算什么文章!转念一想倒也别具一格。从中可以看出我很活跃,但接触面限于青年朋

友和党以及军队的老同志。文艺界、新闻界没有什么来往。说来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在这临时首都，国民党国民政府在那儿当时不知道，也没有想知道，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武汉任何名胜古迹望都没有一望。

党的"七大"之后，毛泽东要抗战后在各地担任过一定责任的干部分山头举行会议，回忆各地抗战时期工作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由于抗战初期我在武汉的领导机关工作过，我被通知参加湖北山头会议。会议开过几次，后来日本投降，毛说"历史经验不忙总结，下去摘桃去吧！"这个山头会议，连小结都未做，统统停下来了。

附五

在武汉初次见到的人

在上篇中我回忆了当初在武汉到过的十几个地方。现在我想按照时间的先后回忆那时我在武汉初次见到的人物。以前见到过的（如1937年8月我在太原听过周恩来的演讲，就不写了）和在这个时期出差在外地见到的人就一律不写。

（1）陶铸。1937年9月一到武汉我与他编入同一个党小组，小组长就是他。接触过两次，都穿着一件黑衣大褂，留着小胡子。

（2）郭述申。抗战前湖北没有党组织。抗战前郭奉中央之命来湖北建党。10月成立武汉临工委。郭是书记。他把我找去，当一名委员。

(3)余梅青。她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也是临工委委员。据她说在反动统治下革命者如遇险情，加入青红帮就有可能脱险，我在武汉也拜中国大学的邝教授为老头子，余是我师姐。

(4)谢文耀。武大学生。地下民先队员，抗战前我与他有通讯的联系。他也是临工委委员。原先是地下民先，我去武汉才见面的还有林贤复、范元甄这些同志。

(5)柯仲平。诗人。抗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民先办的《呼声》工作。蓄有大胡子。

(6)赵辛初。作为临工委成员，我分工建立省师、乡师两个支部。赵是抗战前的积极分子，我做了赵的入党介绍人。

(7)何功伟，又名何斌。湖北省工委农委书记是李华，何与我两人为委员。40 年代被反动派杀害。

(8)何伟。抗战前他在上海工作，与武汉不少积极分子有联系。省工委成立后曾做宣传部长的工作。

(9)钱瑛。她是省工委组织部长。我去鄂西解决当地自发党的工作，是她向我具体布置的。

(10)王明。我写信给长江局建议成立青委，王明接见了我，告诉我长江局同意我的意见。他是我的上级，后凯丰直接管青委。王有口才，但浅。凯丰没有口才，会写。1938 年全国学联召开大会，报告稿一开头引了“松花江上”那一句，就是凯丰加上去的。博古也是那个时期见到的，他出口成章，编好句子一句一句讲，在句子还没有编好时，吸一口烟，把烟吐出，接着讲。长江局的机关设在八路军办事处内，我在长江局青委工作，有时在那儿吃住，见到许多八路军、新四军将领。

(11)董老。只谈过一次话，他要我正式以党的名义对派到胡宗南那里工作的熊秉铨(熊向辉)进行一次谈话。

(12)钱俊瑞。他是在上海救国会中党的骨干。1938 年初上海、北平两救国会合流而成的“抗战建国协进会”和国民党元老叶楚沧的儿子叶南为首的青年救亡协会成立时，都是钱来找我要我参加。在青协我还认识了叶南的夫人袁晓园和她的妹妹袁行庄(后改名袁静，与孔厥合写《新儿女英雄传》)，妹夫赵梅生，弟弟袁君实。

(13)宋一平。他是少共国际的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回国来到武汉担任长江局青委书记，我改任青委委员之一。

(14)毛雍如、蔡锦楹。这两位都是陕公民先队部介绍他们回家乡湖北工作的，毛，黄梅人，1926 年加入青年团。蔡，房县人，抗战前参加抗日斗争。我把这两位留在民先总队部办事处工作，是办事处的专职骨干。

(15)沈毅。民先法国里昂队部队员。回国后也被我留在民先武汉办事处工作。从法国回国的还有夏农苔和陈柱天。夏把自己家的房屋一部分给民先总队部办事处使用。陈在汉口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从德国回来的民先队员乔冠华和张铁生，也都是在武汉第一次见面。

(16)顾文华。从苏州来武汉，他不是民先队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却经常来办事处，关系密切。

(17)师田于、董速。一个是文艺工作者，一个后来长期担任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在住的地方邻近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师、董和一位名叫孙昨非(孙中原)的入党问题就是在那个支

部解决的。东北救亡总会的那几个领导人，如闫宝航，也是在那个时期第一次见面。

(18)我常去三道街39号青年救国团，因此在那儿相识的还有密加凡、胡克实、许宝珍(许云)等。湖北省青委、青年救国团内原先在北平认识的，我就不写了。

又是一张单子。用开单子的方法写回忆，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一下子把许多人回忆起来，可以表现出我的接触面，缺点是太简略。补救缺点的办法是将来有机会有选择地再对其中有些人多写一些。

附六

怀念郭述申

郭述申同志逝世快两年了。1994年7月14日上午，这位90高龄的老人还在催促家人给湖北孝感教育基金的钱早日寄出，午睡时就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他是湖北孝感人，在他的一生中为湖北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他最后的一件工作也是关于湖北人民的。湖北人民会永远地怀念他。他也是我在湖北工作时的领导。1937年9月22日他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武汉。我也是同年同月很可能同日从太原来到武汉。在抗战以前有几年湖北不存在党的领导机关，郭一到武汉就在汉口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党的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他是书记，并把我也找去，要我担任委员，是他布置武汉临工委的每个委员分头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

十来年前，一次在他家里回忆当年在武汉的工作，他记不起自己担任过武汉临工委那一段。当时我想他毕竟是80开外的人，老了，记忆力可能有些衰退。最近他的夫人许云同志（她也是我在武汉工作时的青年同志）送来《郭述申年谱及著述补遗》，翻到1937年9月那一段，里面仍然没有把他当过武汉临工委书记这件事写进去。我又有点奇怪，因为那次我们共同回忆那个时期历史时，他已想起了武汉临工委这一段工作，记起他开过的那次会，记起听过我作为临工委委员在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后向他作的汇报。我把去建立武昌省师、乡师两个支部的党员名单（其中有赵辛初同志）交给了他，这件事他也记起来了，但是在年谱中仍旧未提。但转念一想，在他从1927年到1964年的这37年中，他担任过的领导职务，不讲在军队中的，在人民团体中的，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许许多多职务，也不讲在党委工作中担任过的委员、部长和由于被降职而担任过的下级领导机关中的书记等，单说省、区一级的书记，他就做过不下十多个。我查了一下年谱，里面有京汉路南区特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豫东南特委书记、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鄂陕特委书记、湖北省工委书记、湖北省临时省委书记、辽北省委书记、吉江省委书记、嫩南区党委书记、旅大区党委副书记、旅大市委书记（后第一书记），共十三四个，很可能还有遗漏的。他当地方党委书记的时间真长，也真多，而武汉临工委书记的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而且有可能没有经过上级，所以没有写进去。

1937年至1938年我在湖北省党委机关工作的时间很

短，临工委和省农委加在一起也只有三个来月，郭述申同志的资历又这么深，我没有资格去评论郭述申。但是我对他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在武汉和后来在北京接触中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印象。看了这个年谱之后，也感到正是他品质上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他在党的工作中几经逆境，屡受坎坷，几次受到批判、撤职和险些被杀头。当然这有党历史上的一般性质的原因以及可能有本人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为人忠厚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终于保持了节守，保持了人格，也终于享受 90 高寿，这对他来说应该是庆幸的。

7 长沙之行

“第一次”的印象总是比较深的。

我第一次到长沙的时间是 1938 年 1 月至 2 月。

我去长沙是完成中共长江局指派的任务，研究处理临时大学内迁昆明的问题。这是我主要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

7.1 临时大学

平津沦陷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决定在长沙成立一所三校联合的临时大学。最初三校当局还以为战争的烽火不会很快蔓延到中原，长沙还是大后方。可是到 1938 年初看法变了：日寇在“八·一三”侵入上海后，沿长江西进的势头很猛。南京各机关纷纷撤退，九江、南昌乃至武汉受到威胁。于是国民党政府教育

当局与三校负责人商量决定西迁到远离前线的昆明。消息传到学校，三个学校里都有一部分中共党员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逃跑主义的表现，主张党对这项决定进行抵制，阻挠其实行。我们长江局青委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党不应该持这种态度。理由有三：第一，内迁是国民党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我们党在校内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力量不足以阻止这个决定的实行，抵制的结果只能是党的力量退出学校，而学校仍然内迁；第二，三校原有同学不想继续学习、投笔从戎的人大都已经离校。当时在临时大学的学生中虽然还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尚未找到合适的岗位，暂时在校内安身，但多数同学还是愿意继续上学，因而愿意到一个能够安心读书的地方。如果我们抵制内迁，就会脱离广大同学；第三，在云南地区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很薄弱，三校内迁，一部分中共党员随往，对党在全国开展工作有积极意义。长江局同意这些看法，并且要我立刻去长沙，做好党内工作。工作的内容：一是说服一些抵制三校内迁的同志，使党内同志正确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二是对校内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中何人随校内迁、何人离校留在抗日战线前沿阵地做出部署，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既要使迁往昆明后的学校内部有一个坚定的有力的党的领导，能在校内和当地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又要满足战争前沿对革命青年的迫切需要。长江局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商量，一起解决好这件事。

后来可以看出，长江局批准的这个方针是很正确的。只是当时眼光不够远大，没有把战争不能使我国的教育科学事

业中断，在战争期间仍旧要有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青年人才和在科研文化领域做出创造性的成就视作一个必须坚持的方针。临时大学西迁后改名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不但在政治上和科学文化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培养了若干卓越的人才，说明在战争时期继续办这样的大学十分必要。

一到长沙我就住在临时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大学党支部书记是清华同学，我们是熟人，见面后谈了许多。但是我还是很快去找省委，我带去长江局的信是给省委的。当时省委书记是高文华。那次没有见到。我见到的是王凌波。他有一个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的公开名义，实际上做省委的工作。王凌波的外貌既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也不像革命军人，比较土。在我同他讨论问题时却马上感到他是很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他完全同意长江局的意见。我们研究了如何落实的办法。他对临时大学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的工作安排提出了意见，希望给湖南留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我记得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胡光世分配到桃源的学兵队，就是王凌波提出，我们一起定下来的。最后他正式介绍我和临时大学党支部联系。当时我们在组织关系问题上很严格。我和临时大学党支部的同志中有的人很熟，彼此也知道是党员，但是直到王凌波介绍之后，我才正式向他们传达长江局的看法，王凌波的介绍使我在临时大学的工作具有正式的性质。

那一次我工作得很顺利。在那两天我了解到积极主张抵制内迁的党员只有很少几个。他们都是好同志，讲清楚了利害得失，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看法。与临时大学党支部一起

讨论问题也很顺利。在临时大学我没有召开党员大会而是召开了一个民先队员的大会，讲了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把我们对内迁的考虑也适当地讲了进去。所有学生党员都同时是民先队员，在这个会上我事实上也带有同全体党员见面的性质。

临时大学在长沙的哪一个地方，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在临时大学呆过的人，我记得大都不在人世了。不知道有谁还能回忆起当时临时大学的情况，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编者按：当时临时大学的地址在韭菜园圣经学院。）

7.2 黎澍、杨赓和《观察日报》

那次去长沙，风景名胜一处都没有去。橘子洲头、岳麓山没有涉足。湘江江岸应该到过，但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只对革命工作有兴趣，其他一切对我来说几乎都不存在。那时我真单纯幼稚得可以。

除了临时大学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之外，我还去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创办不久的长沙《观察日报》的社址。湖南籍的清华同学曹国枢，告诉我曾经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生在长沙已经办起了这张报纸，影响不小，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当然想去。于是他就带我到一所像上海弄堂房子那样的两层楼的建筑物里，楼上是编辑部，楼下是印刷厂。所谓编辑部就是几个“一二·九”时北平的学生，黎澍、杨赓这两位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后来知

道还有一个叫汤德明，这位同学我倒认识，是1937年7月在北平郊区一起被日本兵实行战地临时拘留的难友，那天没有见到。所谓印刷厂就是一部平板机，几个字架，两三个工人。楼上编辑几个人挤在一起写稿、看稿、改稿、校对。开会、会客都在这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楼下排字、印刷都由两三人做。我去那里呆了一整天，中午在附近小饭馆吃了一大碗面。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跟我聊天。我也一面聊天，一面帮他们校对稿子。我观察到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几个人不断楼上楼下地跑。楼上楼下不通电话，就常常在楼梯口喊话，有问题立即解决。我看报社里的那些人全是不知疲倦、动作紧张的人，看了真使人兴奋。

《观察日报》的一个主角黎澍是北平大学的学生。“一二·九”那时我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黎澍的班次不会比我高，但年长于我有三岁。在《观察日报》社第一次见到他时，给我的印象是很老练。北平沦陷后他回到湖南家乡，一下子抓住了办一张日报这样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用很快的速度去办，很快就创刊。我从太原到武汉只办了一个刊物《呼声》，影响远不如《观察日报》。黎澍一见我就很热情，给我讲了不少他们在长沙的工作计划，也谈了他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显得雄心勃勃，有干出一番事业的劲头。我很喜欢他的谈吐。我们就是这么匆匆见了一次面，可是我脑海中一直有他这样一个人。长沙分手之后有12年没有见面，1950年他调来中共中央宣传部，我们重新见面时，我和他一见如故，我在感情上已把他看作是老朋友了。以后我

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观察日报》另一个主角杨赓，是北京大学学生。那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也非常之好。6 年后的 1946 年党中央决定办一张《解放日报》，我们成为在这个报社工作的同事。1946 年杨赓是北平解放报社的采访部主任（同时也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的社长）。我是报社研究室主任，报纸上的评论和文章由我来组织。我俩和钱俊瑞、姜君辰以及郑季翘五人是报纸的编委成员，经常一起商量问题。1946 年见面时大家都记得 1938 年那次相会。他告诉我从长沙见面后自己基本上一直从事革命新闻工作。1946 年北平发生了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来报社抓走几十个工作人员的“四·三事件”。杨被抓后，“大闹”北平警察二分局的“事迹”是很突出的。杨是一位热情又很有魄力的人，不知道受到怎样的委屈在 1957 年那场“反右派斗争”中自杀了。算起来那时他的年龄不过 40 多岁。

《观察日报》在长沙办了多久，黎澍同志在世时没有问过他，只知道后来迁到邵阳。黎澍是《新观察》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新观察》的前身是《观察》杂志——建国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不知道黎澍同这个以“观察”命名的刊物有没有关系，即这杂志同《观察日报》有没有继承的关系。

7.3 徐　老

我早就知道我们党内有一位徐特立，人们都叫他徐老。他

当过毛泽东的老师，1927 年白色恐怖时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长征五老中年龄最长的一位（1938 年他是 61 岁，这年的 5 月 1 日我们在武汉给吴玉章过 60 岁的生日，徐老长吴老 1 岁），是个革命家，也是个教育家。

1938 年 1 月去长沙，以前在武汉知道徐老以八路军驻湘代表的名义在长沙，我就想在长沙完成工作任务以后专门见见徐老，目睹一下他的风采。

第一次去徐家祠堂那条街上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我就见到徐老正在同青年们谈话。我只和他招呼了一下就去同王凌波商量事情，在向王告辞前我问起徐老的身体和工作，王告诉我徐老主要做湖南上层人士的工作。在长沙他有许多学生担任重要职务，徐老在长沙起的作用很大。王还告诉我徐老只要没有别的工作，就在这里同来找他的青年谈话。长沙的青年一听说徐老来了，住在通讯处，就到这里来找他。徐老认为这是扩大党的影响，培养革命青年的机会，就同他们谈话，一谈就是一天。

我在长沙的工作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我专门为了和徐老谈话去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去时很早，还不到 8 点，可是徐老已经在那里和青年们谈话了。谈话的地方是正对着大门的一间屋子，屋子中央摆了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徐老坐在桌子的一头，七八个青年坐在桌子的两侧和对面。我去时徐老正谈得起劲，那些青年也正专一地听。我不想打扰他们的谈话，也就同来访青年坐在一起旁听，一面听一面仔细地观察徐老和这些青年的神情。徐老给那些青年们谈的内

容很广泛，谈话的基本方式是徐老要他们提问题，随便什么问题，徐老都原原本本地回答。如果没有提问题，他就自己找个话题讲。归纳起来主要是这样一些方面：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党和红军奋斗的历史和革命烈士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青年们的学习问题、修养问题等。徐老讲得很生动，青年很爱听。徐老看到青年们很爱听，也就讲得更有劲。我坐在桌子旁边一直听他们谈了 3 个多小时。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我想这些青年们该走了，徐老也该休息用餐了。果真有的青年回家吃饭去了，可是还有几个青年没有走，徐老就要人把碗筷拿到会议桌上来，一边吃一边接着同那些青年谈话。等到同这几个青年谈话告一段落，他们告辞回家时，又有一批青年到了，徐老就又同新来的青年谈起话来。过了一会儿，早些时候回家的两三个青年吃过饭又回来了，徐又接着同他们谈。徐老也真不知道疲倦，一直谈下去。那天的谈话继续到下午 5 点左右，还是王凌波出来对青年们说，你们也该让徐老休息休息了，徐老这才离开那张桌子。这时候该我同他谈话了。

这回是我向徐老做了自我介绍，在大学我学的是什么专业，干革命后做的是什么工作，这次来长沙是完成党交给的什么任务等等。我没有想到在徐老听清楚我是长江局来的人之后，对我说他来长沙之后有许多青年来找他，有的青年来了许多次，他了解他们革命觉悟不低，很想介绍其中某几个加入我们党，可是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说他有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不宜介绍人入党，并且认为来找他的青年中不能担保没

有国民党派来的人，因此不让他做介绍青年入党的事情。徐老不赞成省委同志对他的这个限制，他认为这种限制不合理，并且说他介绍人会很好地进行考察，做那样的事是完全有把握的。他对我说自己在省委会上提过好几次意见，可是多数人硬是不同意。他对我说，你是上级机关派来的，请你回去反映一下，设法让省委改变主意。

初次见面，一个很老的同志，对我这样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党员诉说自己的苦恼和愿望，而这个苦恼是党组织不让他发展一些他认为够格的青年入党，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同时我在他身上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的真诚、朴实，和青年人一样的单纯。

两年后，我在延安又见到了徐老，在延安和河北的平山，在北京，我和徐老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同我结成忘年交。我第一次见徐老时的印象一直没有变。有一回，徐老过生日，大家向他祝寿，我也讲了一段祝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徐老不老，徐老是个老青年"。在1979年2月1日他102岁诞辰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仍是《徐老是个老青年》。

8 出差南昌

8.1 南昌市的青年工作

1938 年 5 月 1 日过后不久，我出差到南昌。这次出差的任务是长江局交代的。凯丰对我说，设在南昌的东南分局是中央委托长江局指导的，现在东南分局要开展城市青年工作，你是长江局青委委员，我们派你去帮助工作一个时期。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就从武汉坐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坐火车来到南昌。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南昌这个城市。

到南昌后，我很快找到了新四军设立在南昌的军部。东南分局机关就设立在军部的这个院子里。新四军南昌军部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不同，那儿不是楼房而是平房，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对这个院子我至今还有比较清晰的记忆。

1988 年我去新余市开会，路过南昌，知道这个院子已经建为纪念馆，可惜在南昌停留的时间很短，没有能故地重游。在新四军军部，我见到了分局的那些领导同志：书记项英、组织部长兼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宣传部长黄道……几乎天天在一起的是陈丕显。

没有去南昌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青年工作没有什么了解。凯丰要我去，大概那儿工作状况不怎么好。去看一下，事情并非如此。在新四军军部，从陈丕显那里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就出去了解情况。南昌市的青年工作进展得还是很不错的。

应该说南昌市的青年工作才开始。长征前，中央苏区在江西，国民党“剿共”的重点也在江西。当时以陈毅为首的红军在江西、福建等地坚持了 3 年游击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之患。因此抗战前白色恐怖比较厉害，对南昌青年的革命活动一直严密监视和控制。北平“一二·九”运动在南昌几乎没有响应。抗战爆发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外地江西籍的青年也回来了不少，这个市的青年工作开始活跃起来。在北平等地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在南昌成了青年运动的骨干。平津流亡同学会成为革命力量汇聚的地方。读书会、歌咏队是主要的活动方式。当地的青年也开始有人参加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是在南昌，不仅民先那样的共产党领导的色彩比较浓的全国性的组织不可能成立，就是共产党领导色彩不那么浓、完全地方性的革命青年团体，像武汉的青年救国团、广东的“青抗先”，也还缺乏成立的条件，只能采取各种比

较低级的形式在发展着。我觉得南昌市的同志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而确定的那样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步骤都是正确的。

那时在南昌市负责青年工作的是邹文宣。他是邹韬奋的弟弟，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他担任南昌市青年部长的职务。平津流亡同学有程一惠、张馥、吴志元（后来是石西民同志的夫人），他们也全都是“一二·九”时北平的大学生，对在城市搞青年工作那一套都熟悉。

陈丕显负责整个东南地区（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几个省）的青年工作，东南分局设在南昌，他对南昌市的青年工作也就更加关心。他长期在苏区工作，新四军的名册中也会有他。像他那样身份的人当然不便露面到群众中去活动。邹文宣是南昌市的青年部长，在组织关系上直属江西省委（江西省委不公开），关于他的工作陈丕显得间接从江西省委那儿知道。当然陈丕显完全有权从邹文宣那里直接了解情况，但是陈丕显住在军部，不便出去，邹文宣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想暴露，也不去军部。我住在军部，又不怕别人注意到我，经常出去，因此当我在南昌的时候，白天出去看到听到的情形晚上回来都告诉陈丕显。我倒可以起一些在陈丕显和邹文宣之间的沟通信息的作用，不过我发现他本来对南昌市青年工作的情况很了解，既不少也很具体，在这方面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

总之，我到南昌之后发现这儿并不特别需要我，不过我既然来了，还是每天白天同邹文宣等在一起，晚上同陈丕显在一起工作。到南昌之后，我不只是以长江局青委的身份在陈丕显那里工作。我想自己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又是民

先全国总队部的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公开的民先队的工作者，何不利用这个名义直接在南昌市的青年中间活动活动，给他们讲些革命的道理等等。我去南昌还带有一些朋友介绍的在当地工作的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力伯皖的哥哥力伯杭，他在国民党的一个军事研究机构工作），我也想见见他们，并且带了一本民先队的捐册在身边，随时请人捐一点钱，补助我们的经费支出。

8.2 一件学生装惹出的麻烦

就在南昌工作的日子里，我被当地保安处拘留了三天。由于这三天的被拘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诬我“从狗洞里爬出来”，想把我“打成”叛徒。

这次被拘留的起因是：当我从武汉去南昌时，因为没有钱买合适的上衣，就向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的蔡锦楹借了一件他在中学念书时穿过的草绿色的学生装，颜色同国民党的士兵的服装一个样子，但是服装上的铜扣子有学校的标志。可是在街上还是被一队巡逻人员（有六七个人）误认为是散兵游勇。加上那时我不刮胡子，只有23岁的我胡子却长得很长。这就加深了“散兵游勇”的印象。巡逻人员把我截住，带着我同他们一起走。我毫无精神准备地被截住后，就在脑子里考虑如何应付这件事。我首先去想我身边带有什么东西是不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我想到身边有一个民先总队部的捐册，捐册上有几个捐了一些钱的人的名字。我想这件事本来属于公开的活动，

并不要紧。又想到身边还有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事情，如果搜出后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会对工作产生不利的后果，应该设法不让这个笔记本落在他人手里。我一边想一边被他们带在街上走。他们在继续巡逻。在他们巡逻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可以把那个有字的本子扔掉的机会。那时，这一队人不知道为什么走进了一家很大的酱园，而且走到这家酱园的后院去，任我一个人呆在这家酱园的前院，只有一个队员守在酱园的大门口。我要逃跑是不行的，但院子里有许多麻袋，我完全有可能趁大门口的那个人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个小本子扔在麻袋背后。这样做，短时间是不会被人发现的。不过以后也还可能被人发现。我稍一犹豫，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这一队人从后院出来了，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被带到一个挂有保安处牌子的门前。在这个机关的门房处，我又有了一个处理那个笔记本的机会。因为这队人把我一个人留在门房里，没有人看守，而那个房间的木头地板有一个洞，我就当机立断地把有字的几页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塞进洞里。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把工作机密保住了”。可是当他们回来带我进去时，我忽然想起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有一个当天晚上江西省委约我开会的地址。江西省委在南昌是不公开的，这个地址如果落在反动派手中有可能出问题，想到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一页很小的纸撕下来毁掉，刚想把它放在嘴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手臂被他们抓住，不能把那张纸放到嘴里。我只能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他们想掰开我的拳头，我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如此挣扎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的拳头被

掰开了，可是那个用铅笔写的纸条就完全模糊不清，看不出任何痕迹了。这件事引起保安处的怀疑，他们已经看出我不是什么散兵游勇。他们从我身上搜出民先队的捐册，更证实了我不是散兵游勇。接着就开始“问话”。由于保安处的人并不知道民先是个怎样的团体，以为它是国民党某个派系的组织，于是先问姓名，我直说了。后问身份，我说在民先队工作。再问民先队的地址，我说出了在武昌的地址。再问我何时和怎样来南昌，我也把经过九江和到南昌的时间直说了。接着再问我到南昌的目的，我就以为这个团体来捐钱相答。最后问到我在南昌的居住地点，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这时候我考虑到自己的民先工作人员的身份由于被搜出捐册已经被他们知道了，而我民先的身份本来就是公开的，也不怕他们知道。但是民先队和党的关系却是不公开的。我记起在北平看到的张闻天1937年春天在白区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公开工作是公开的，秘密工作是秘密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是秘密的这个原则，我认为不能把我的住所——新四军总部的地点告诉他们。因此我就回答说我在武汉的住址已经告诉你们，没有必要再告诉南昌的住址。问到这里，他们就不再问下去，把我押下去进了拘留室。

从问话中我看出保安处并不知民先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在南昌没有民先队部的活动）。他们看到我回答问题的表现很自然而且理直气壮的那个样子，以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背景，一时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再问下去，而去进行研究。果然第二天中午时间，保安处很客气地把我请出去，说有一位

"先生"要同我谈话。这位"先生"已经在保安处等着我。我见了他，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穿着一身西装，说话很斯文。他要我跟着他出去，到一家饭馆一起吃饭。在饭馆坐定后，我见到他手里拿着一纸公文。那是用很端正的毛笔字写的，我一望就看出是从我身边搜出的那个捐册中摘下来的"材料"。他自我介绍是南昌国民党党部的工作人员，然后东拉西扯的，说话的意图我听明白了，就是要问民先队是国民党哪个派系的组织和我本人在国民党内的身份。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民先队是抗日青年救亡组织，没有党派的背景，本人也不是国民党员，同任何派系没有关系。谈完话，这个人把我送回了保安处。

大概是保安处已经不再怀疑我是国民党某个派系中人，就不再对我那么客气了，又找去问话，想逼我说出在南昌的住址，说只有汉奸才不把自己的住处说出来，你不说出来就要把你当作汉奸来看待。我回答说我是有住址的人，我已经把武汉的住址告诉了你们。无论他们怎么逼，我始终不告诉他们在南昌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我看到这个局面很僵，不知道以后事情怎么发展。没有想到，过了一天，他们又把我找了去，问我是否可以在南昌找到保释自己的人，我就说了南昌平津流亡同学会可以保释我。第二天上午，北平流亡同学会的程一惠和张馥到保安处把我带了出来，在保安处我一共被拘了三个整天。

在审查我这段历史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在始终没有讲清自己的住址的情况下保安处释放了我。如果要分析的话，还是因为那时正是抗战后国共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加上正好

世界学联主席格罗克曼马上要访问南昌，国民党当局已经知道民先是个革命青年团体，把我关着可能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影响，而且我又不是他们要捕的人，因而就这样放了。

还有一点，当我回到新四军总部，我想详细地向曾山和陈丕显同志报告自己这次被拘留的经过。曾山说你不必讲，我们很清楚你的情况。他告诉我，程一惠同志和保安处的那个负责人都是青帮里的人，他们很熟。程一惠在保安处看了我的全部材料，包括他们问话时我的回答。曾山对我在保安处的表现有一点批评意见，那就是我本来可以告诉他自己住在军部，这样我很快就会出来，我那样回答有点故弄玄虚。他说民先队是党领导的，这一点国民党是早就知道的，只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你不说就白关了两天。不过我还是认为不应该说出自己在南昌的住所，我没有接受这个批评，我认为自己应该坚持原则。不过另外一个批评，即说我的政治警惕不高，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要想到可能被捕，因而事先要做好遇到了情况如何应答得更好的准备。如果那样，我就不会因为毫无准备，处于被动地位了。这个批评我是完全接受的。

8.3 回忆同陈丕显相处的日子

我去南昌工作了大约一个月，除在保安处被拘留两个晚上外，其余都住在新四军总部的院子里。在那个院子里，几乎天天同分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在一起。他在 1995 年去世了。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我略大他一岁。都是年轻人，就很容易说

到一起。大家都叫他阿丕，过了些日子我也叫他阿丕，他叫我小于。在南昌的日子，我是最轻松的，因为没有什么重的任务要我完成，因此我与阿丕之间谈的事情不少。

他告诉我，党中央在江西苏区时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儿童局书记。我对这个职务名称感到挺有趣，或者说感到有些滑稽。在我表达了这个看法后，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当时在苏区还设有一个中共中央青年局书记，胡耀邦就当过这个书记。耀邦同志的悼词中说他担任过中央青年局秘书长。有一次我遇到冯文彬，问他是这个说法对还是我在1938年听到的那个说法对，他说还是悼词上的说法对。不过我还是相信陈丕显告诉我的那个说法。我想或许那时秘书长和书记两个名称是混用的，当时在口头上不分。后来我又听说张爱萍同志是胡耀邦的前任，他可以把这件事讲清楚，可是我不想为这样的事去麻烦张爱萍同志。

陈丕显给我讲的最多的、我也最感兴趣的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们的艰苦奋斗。我对二万五千里长征听到的介绍多，看到的书中对长征的描绘也多，可是对陈丕显介绍的三年游击战争却知道得很少。听了陈丕显给我讲的那些故事之后，我了解到，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性的确不亚于长征。现在已经有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电影，看了很动人，而陈丕显讲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染力就更强。我记得他对我讲，有一次国民党进来搜山，他们已经不能转移了，只好躲起来。搜山的国民党军队来到他们躲藏的地区，他们便藏在草丛中。为避免战斗，游击队员伏在草丛中不敢发声，陈丕显对国民党军队的脚步声听

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发声，最后躲过去了。

建国后，有一年我去江西，到了江西与广东分界的梅岭。陈丕显告诉我，他曾在这几个地区同陈毅元帅在一起很长时间。我看到那儿的地貌，想起陈丕显讲的故事，对陈毅的诗感到特别亲切。

在南昌，陈丕显还给我谈起苏区杀AB团的事。他说那次错杀了许多人，他的哥哥是个小学教员，就被认为是AB团的而被杀害了。因为他年龄小，也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不怀疑他，不但没有受镇压，而且照样得到信任。我听了也很奇怪，如果不是他亲口给我讲，我断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当然，我和他的聊天不是单向的，他要我讲讲北平的“一二·九”，讲我怎么来到武汉等等。比起陈丕显他们的经历，我觉得没什么讲头，那些故事太平常了。不过他听了还是很有兴趣的。

那次我在南昌东南分局机关没有见到陈毅。不久前我到江苏溧阳，到新四军设在那里的指挥部，才知道我去江西的那段时间里他正在苏南浙北一带开展斗争。

在新四军总部还见到一些别的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了叛徒的郭潜。

我在新四军总部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留下很深的印象。东南分局领导人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同我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看到的可以说完全一致，不论物质生活或是人际关系，都十分朴素、朴实。生活在这些老同志中

间，我就感到同住在自己的家里那样自由自在。我现在说的那些老同志，当时的年龄大都在 45 岁以下，当时 45 岁的人，今年整 100 岁。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老前辈、老同志，大概这是因为自己那时太年轻了，只有 23 岁。

9 广州沦陷前后在广东

9.1 南下广州执行任务

1938年8月长江局派我南去广州，下达给我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任务是向广东省委传达长江局7月间通过的关于在全国发展民先队的决定。

为了贯彻这个决定，长江局决定李昌留在武汉组织武汉的民先队部，兼顾全国民先工作。在武汉贯彻这个决定，我预计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湖北的青年救国团改为民先队，对这样的措施，以杨学诚为首的湖北省青委和青年救国团的许多负责人在思想上是有一定抵触的。可是长江局做出了决定，省委会照办，青年同志也不能不服从。这件事要解决得好，我认为不那么容易。可是长江局既然决定要我去广东，湖北的事就不要我操心了。

当时广州没有民先，而有一个广东省青年

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它是1938年初成立的。作为长江局青委成员，我很早就同青抗先有联系，并且像支持武汉青年救国团那样支持这个青抗先。青抗先的规模与武汉青年救国团相近，人数不少于青年救国团。我们要在广东建立和发展民先，就一定要以青抗先为基础，也会遇到与武汉把青年救国团改为民先队同样的问题。因此在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我与同行的几个人也一直在议论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省委的态度是起决定作用的。我说现在议论也没有用，等看了省委的态度之后再说，何况我们对青抗先的情况也不如对武汉青救团那样了解，两地的情况也许不很一样。

我南下广州还有一个任务，是在广州建立民先总队部华南工作部。这个机构的任务是以民先总队部的名义开展华南各地的工作，联系和指导华南各地民先队部。所谓“华南”，在武汉时总队部同我商定除广东外，还有福建、广西、贵州、云南四省（也包括海外）。四川省与苏、浙、赣归武汉总队部直接管。可是福建民先从来没有基础，广西、云南我知道有民先队员，但未取得联系，只有资料。我在武汉时，有一个抗战前在北平的民先队员张益珊到总队部办事处来过，他对民先工作很积极，对建立民先贵州队部信心很足。我估量贵州工作有可能走在前面一些。总之，华南的工作完全属开创的性质，也不是当务之急，第一步还是把广东的问题解决好。

这次南下，我带了四个人同行。一位是沈毅，他原先在法国里昂民先队部，1938年初回国参加抗战，到总队部报到后，

我就留他在民先办事处工作，这次同我一起南下，我希望他能成为我的主要助手。同行的还有一位林金瀚，他是福建人。我是想要他熟悉一段民先工作后派他去福建开展工作。还有一位黄儒汉，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一二·九”的参加者，他的妻子俞竞患肾病，他们夫妇俩从北方到武汉来工作，对俞竞恢复健康较为有利。在1938年8月我南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武汉的战争形势比较紧张，估计广州这个城市的形势在短期内还不至于有危险，环境比较稳定一些。我把他们夫妻两位带在身边，为的是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也许可以把身体养好。

这次我去广州别有一种滋味。我回想正好一年半前我离开广州北上，在广州时我做的也是民先工作，不过那时我不是党员，我的活动同党也没有直接取得联系。而现在我是作为党的一名青年工作者负有一定责任重返广州，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搞广州民先工作，条件与一年半前大不相同，工作规模也大不相同。我想在工作中去设法与1936年参加我组织的那个团体的人联系，把他们也吸收到新建的民先队来。

我去广州估计到会有一些困难，但还是信心很足，雄心勃勃。

在这里，我想围绕发展民先的问题再讲一段党的青年运动史。193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但由于加入青年团的人，国民党抓住后完全同党员一样残酷镇压，因此青年团也就不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组织，成了与党差不多的第二党。1935年党做出决定解散青年团，青年团员

转成共产党员，团龄算作党龄。各地青年团实际解散的时间，有的早些有的迟些，到1936年，解散工作大都完成。这时候民先队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了。它带有较大的群众性，但加入民先队的大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武汉青年救国团和广州青抗先这样的组织在性质上同民先队是相同的，不过在“红”的程度上略低于民先。尤其是青抗先，它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做得比青年救国团还要好。青抗先的总队长邓明远是共产党的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广东省国民党省委书记谌小岑对党的态度也比较好，对青抗先比较支持。建国后谌当了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公开民先是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王明认为对党有很大的好处，这件事回想起来，这只是王明的一个逻辑推理，事实上未必如此。可是历史也未能对这么做的是非做出检验，因为武汉、广州沦陷后，民先队这样的组织事实上很难活动，把民先发展成为全国性党公开领导下的青年团体的这个决定事实上没有执行，也无法执行，成为一个不了了之的事情。此外长江局通过这个决议之前事先没有请示在延安的党中央，决议通过后也没有请示中央，就去向各省传达，这在组织上是有错误的。在1938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讨论青年工作的一个会议上，这个决定受到了批评。但是这个会的精神传达到广东已经到了1939年，民先的决定早就不再提及了。

9.2 广东省委

到广州，我找到吴华，他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中国大学的学生。不久前在武汉召开学联代表大会，他作为广州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且作为全国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做了报告，我们在武汉就一起工作过。我知道他是广东省青委书记，就通过他找广东省委。

那时的省委不可能有什么办公室，我是在一个民间住宅的大厅里见到了省委的同志。吴华把每个人的名字都给我做了介绍。这同白色恐怖下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广东省委书记是张文彬，我不知道他的详细经历，只知道他是红一方面军的，参加长征到陕北，不久前由中央派来广东主持省委工作。那次来听我传达的广东省委委员还有李大林、尹林平、张越霞和吴华。张文彬看上去很年轻，大概只有30岁左右，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不可能是大学生，但是给我的印象是大学生，一点也不土，而且说话青年化，初次见面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把我记得的决定全文背给他们听了，另外把王明的几次讲话综合在一起做了介绍。他的反应很简单，我感到他办事很有能力，一句拖泥带水的话也没有，这一点又显出他的军人气质。他听完之后，就代表省委全体说：“长江局有了决定，广东得赶快贯彻。”一句犹豫和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的话都没有。我觉得去广州前我们几个人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工作比预计的还顺利。可我还是有些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青抗先的队员

们会不会因为对自己的团体有感情而接受不了民先。张文彬马上说，现在在广东的这些青年中党的威信很高，只要我们党公开与民先的关系，说一句民先是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他们会感到加入民先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会有什么抵触。

接着他问了我民先队的简单历史、党对民先队的领导、民先队的主要负责人、民先队的组织形式、有无章程等等。在我一一答复后，他要我以民先的名义在广东青年包括在抗先队员中间做一些介绍。

省委的委员们除了尹林平（那时只叫林平）外，和李大林、张越霞接触得比较多，吴华不必说了，几乎是天天见面。李大林是工人出身，广东人。张越霞本来是上海纺织女工，是博古的爱人，她是宁波人，浙江的口音很重。

不久张文彬接中央的通知去延安开六中全会。他的省委书记工作就暂时由李大林代理。广东省青委书记也要跟张文彬一块去延安，省青委的工作就由梁嘉代理。他们两个人（也许还有别人，我不知道）走后，在广州建立民先的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中。

张文彬和吴华从延安回广东后，省委机关就设在韶关，那时广东省委的成员有不少变化。我在韶关没有见过尹林平和李大林，而新认识了古大存、涂振农两位省委委员。张越霞这时也在韶关（博古从武汉来韶关与张越霞相会过），这是1939年的事情。

我对张文彬的印象非常好，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粤北韶关等沦陷，党成立了湘赣粤边区的党委，在这期间，党的机关被

破坏，他光荣牺牲了，那时他只有 30 多岁。我认为这是我们党，特别是广东省的一个重大损失。

9.3 东皋大道和宪兵司令部

到广州不久，我出了一件事。

我们一行到了广州，住在属于吴华家的一所坐落在东山东皋大道的空房子里。五个人占了完整的一座楼房。黄儒汉夫妇一间，沈毅、林金瀚两人合一间，我单独一大间。吴华为我安了一张单人床，又搬来了一张桌子。

一到这个地方，第二天大家就铺开来工作。除了写信之外，为了追踪战争形势，每天买几种报纸回来剪报。我也到东皋大道同大家一起工作。只住了两三天，有一天上午 10 点左右，响起了空袭警报。广州当时没有任何防空设施，有空袭警报时，居民们从家里出来，走到比较空的地方分散开来，就算作一种防空措施。就在东皋大道附近，那时还有一个小山头。这条街的居民在空袭时就跑到这个小山上“防空”。住进东皋的第二天我们就跟着当地居民这么躲过一回。出事这一天上午又响起警报，有一架飞机来到这个城市的上空，转了几圈就走开了。原先能够听到的马达声也听不见了。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但绝大多数防空的人已回到家里去了。我上山时带了一张报纸看，还没有看完，就一个人坐在山顶上看报。偶然抬头看见有三四个宪兵从山下跑步朝着我跑来。我警觉了起来，故意伸了个懒腰，迎着他们从容不迫地下山。

“你在山上干什么?”

“防空么!”

“你怎么到这里来防空?”

“我就住在东皋大道。”

“几号?”

“××号。”

“你等一下我们看了回来。”

一个宪兵看住了我,其他的宪兵就到我的住处去,回来对那个看我的宪兵说:“都是外地人,一地剪报,连褥子都没有,不会是好人……”就把我送进了宪兵司令部。

我去广州时只带了我唯一的一条薄棉被,没钱再买褥子床单,在东皋大道我住的那个房间那张硬板床上,我把那条被子一半代替褥子床单,一半用作被子盖身体,搞了几本书做枕头,这样的情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我在宪兵司令部被拘留起来。过了一阵子,除了黄儒汉的妻子外,其余三个人也被带进拘留室来。然后问话,把我当作给日本飞机送信号的汉奸,问我为什么到那山上去,为什么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我伸那个懒腰时手中有报纸,被当作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的行动)。我给自己辩解:你们的宪兵上山时天上根本没有飞机,那天飞机也根本没有到那个地方来。你们真是胡搅蛮缠。

黄儒汉的妻子没有被抓起来,就向省委报告了。她来看我们,告诉我们组织正在设法营救,让我们放心。对这次被拘留,我不在乎,因为给我们安的罪名太滑稽了。我们几个人在拘留

室里有说有笑。看管我们的宪兵中有一个宪兵对我们很好，我们向他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沈毅还教他唱救亡歌曲，那个宪兵也跟他学（用法文唱国际歌。我也是那一回在拘留室里跟沈毅学会的）。黄儒汉还向宪兵司令部的人发脾气。

大概宪兵司令部的人又研究了一下，明白我们是救亡青年，而且向他们的上级做了报告，就有了一个变化，要我们表示一下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他们就可以放我们出去。理由是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争辩说我们不是政治犯，我们是爱国抗日，要我们表那样的政治态度完全不必要，是不合适的。这样就形成了僵局。

这时候原先民先柏林队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广东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长官余汉谋那里做参议，他到宪兵司令部来看望我们，并且要见宪兵司令部的头头。那个头头恭恭敬敬地招待了，并且把我们四个人带到会客室同他见面。我们知道乔是省委通过什么关系要他来的，我们当着那个头头的面同乔谈话，使他们了解到我们同乔是朋友，也当着那个头头的面批评了宪兵司令部要我们表那个态是无理的，抗议他们已经明白我们不是政治汉奸，却还不放我们出去。乔冠华和那个头头都没有讲太多的话，乔只是说你们暂时安心呆着，这个问题很快会解决。我们就被送回拘留室，不知道他们接着还谈什么。

又过了两天，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震广英亲自到宪兵司令部把我们接出去了。

这时候长江局已经做出决定，把民先同党的关系公开出来，作为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与国民党的三青团抗衡，所以我

们不再对民先和党的关系绝对保密。

9.4 “武装保卫大广东”

抗战以来，我的工作地点有一个特点：当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战争形势开始紧张时，党就让我离开到另一个地区去。北京紧张派我去保定、太原，太原紧张就派我去武汉。这次我去广州时，武汉的战争形势紧张，估计广州会有一个时期还在我们手里，没有想到广州沦陷竟然在武汉之前。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寇在大鹏湾——惠阳县的澳头和稔山两地登陆，广东省的战争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广州的各机关、学校乃至工商业机构都很担心广州的安危。从当时整个中国形势来看，北平、保定、太原、上海等地纷纷沦陷，广州也很难保住。但是广东余汉谋的兵力听说至少也有六七万人左右，装备与其他国民党地方部队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主力正好分布在广九沿线的惠阳以及广州附近地区。日本兵那时战线已经拉得很长，也不会有很大的兵力。广东部队能打仗这一条，日本兵“一·二八”时在上海也是领教过的，所以广州老百姓的第一个反应是广东的军队总可以抵抗一阵子。

日寇在大鹏湾一登陆，广东的形势顿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省委原先正在进行的在青抗先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民先的工作就暂时停了下来，全力应付战争局势。我们领导下的主要青年团体就是青抗先，此外还有别的团体，如“青年群”等。这时候由于吴华已经去了延安，代表省委指导青抗先的任务

就交给了我。这时候有一位姓梁的同志(可是我们都叫他老马)从他的家乡南雄来到广州。他是广东一位老青年工作者,有一次去广西,不幸传染上了大麻风病,而且发展得已经相当严重,前几年回到南雄家乡,这时候他正好在广州治病。省委认为他的工作经验很丰富,要他帮助我,于是我就搬去和他同住,而且躺在一张床上。那时我对传染上大麻风病这一条不那么看重,事后想起来,这是很冒险的。我们俩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战争形势发展我们党的力量(这个"老马"在广州沦陷后单独回到南雄,听说不久就去世了)。

就在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后的3天左右,广州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武装起来保卫大广东"。当时有两首歌很适合这次示威游行:一首是"保卫华南",一首是"武装保卫大广东"。这次游行是官方支持的,分行业分单位组成队伍。我提出我们青抗先的人不站在本单位的队伍中间,而是单独打起"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旗帜,扩大影响,而且在游行过程中有时离开大队,向群众做关于青抗先立场观点的宣传,强调不能依靠国民党当局,必须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且欢迎青年当场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在整个游行队伍中显得特别活跃,组织得也特别整齐,歌声口号声特别嘹亮。也有人临时参加进我们的队伍。游行后,我们这一支队伍不马上分散,而是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日军登陆后,从广州的报纸上和口头上传来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当局毫无积极抵抗日本攻占的思想,既没有信

心，也没有办法，而且不做任何抵抗，节节后退。在广州根本听不到我军抵抗日寇的消息，而日军向广州推进的速度很快，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后来听说在广州沦陷前只有增城一个叫做正果街的地方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阻击战，只伤了日军几十个人，日方形容说他们好像被蚊子咬了一口。那一次游行，本来应该带有战争动员的性质，但是正规军不抵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又没有任何办法，游行中喊的“保卫大广东”完全是一句空话。在那次游行中，还有一个喊得很多的口号是“广东人唔做衰仔”，这句话更加空之又空。见到这种情况，我判断广东省的抗日斗争的领导权很快就会落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手中。尽管我知道那时党的力量并不强，但是广东国民党的力量比原先我党想像中的还要软弱。因此在日军从大鹏湾登陆后，我们就全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在参加游行示威时就有明确的思想。

至于从日寇登陆到广州沦陷这一段的事实经过，当时我们并不具体了解。广州沦陷后传闻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里的当局被日寇收买，故意不抵抗。许多人认为可信，否则国民党军队再怎么不堪一击，也不至于从日寇登陆到广州沦陷只有 10 天时间。还有中山县海中有一个小岛，名叫三灶岛，在日军进入广州前不久，便把岛占领了，封锁该岛与外界来往，不许居民离开该岛，强迫岛上居民修筑机场，然后把岛上居民统统杀光，把这个岛变成日本飞机起飞的机场。当时并没有听说日军有什么航空母舰，可是他们把三灶岛变成他们的“航空母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飞到广东上空。这样的传说直到

广州沦陷了我们都不知道!

最近我在《共鸣》杂志上读到黄秋耘写的《第一次"与狼共舞"》,介绍了他当时在香港从日本驻港机构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日军收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情况。

附

广州高楼之今昔

广州现在有多少座高楼?占地多少亩?楼层多高?建筑面积多少平方米?……这样的数字,有关部门想必已有统计。这种统计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走在街头便会给人留下一个清楚的印象。

这是"今"。"昔"时,可以拿抗战爆发时的情况为对比材料,广州有多少高楼,也用不着统计,因为太少太少了,走在街头,一目了然,立刻也可以有一个清楚的印象。

1936 年 8 月到 1937 年 2 月,我在广州搞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 8 月到 10 月广州沦陷的当天,我也正好在这个城市。1938 年我在广州的时候,著名的大楼便是长堤的"爱群"。在 1936 年至 1937 年我没有看到,大概那时还没有建成。1938 年那次我在广州,是在广东省委工作,忙于党的青年工作,路过"爱群",没有站在大楼前数一数有多少层的心思,因此至今说不出来。总之觉得它很高很高。回想起来大概有十几层之高。也因为忙,我也从来没有进过这座大楼。它的内装修怎样,甚至这座大楼用作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它是当时广州最高

的一座楼，这一点我相信是不会错的。

我想这座楼今天大概还存在。60 年前广州首屈一指的大楼，还不至于被爆破就地新建大楼吧！不过我几次过长堤都没有能把它认出来。在今天广州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旁边，它也就不像过去那样显眼了。1938 年在广州我没有坐过任何车辆，现在出入都坐小轿车，即便“爱群”还在那儿，我坐在车里奔驰而过，也更不能把它辨认出来。

“爱群”在 1938 年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还因为它采取的很特别的防空措施：在屋顶上架起许多层竹架。这种防空措施我在其他城市没有见到过，在世界上也没有听说过。这种防空设施的设计者，据说认为当炸弹向大楼落下时，接触到那些竹架就会在空中爆炸，不至于损及大楼。不过由于它并未挨过炸，效果究竟如何没有得到检验。但我对这样的防空措施感到非常怀疑，一是我估量炸弹还是会穿过竹架把楼炸毁，二是有可能炸弹从竹架那儿滑下，落到附近低层的建筑物上，结果是保护了“爱群”，却损害了它的邻居。当时我就想这是一种仅仅保护“爱群”、不顾及其他的防空措施。由此可见，当时这座大楼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了。

9.5 青抗先的队伍从广州撤退

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后不久，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广东国民党很快就要从广州逃跑，因此就利用游行的机会把青抗先的队伍集中组织起来，在游行之后不让青抗先地方队伍分散，

由青抗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在队伍中讲话:国民党不可能抵抗住日本军队,广东形势紧急,我们要做好沦陷前的准备。并且布置在第二天立即去芳村做宣传。这是我同老马商定的步骤。因为我们抗先队如果撤退,日军在大鹏湾上岸后是从东江这边来,我们就只有朝西向着西江四会、广宁一带撤退。第一道关是过珠江和另一条珠江支流才能到佛山、三水。抗先队的队伍能否顺利过这两条江是有关成败的第一步,因此借口到广州珠江对岸的郊区镇芳村进行宣传,检阅一下过江的本领。这次宣传实际上是渡江演习。

去芳村宣传的那天,形势已经很紧张。那天的人不少,按照预定计划组成了一个大队,分成小队渡船过江,并观察渡江的秩序和花费的时间,结果很不理想。秩序不算好,全队人马过江花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而这还是日军没有打到广州时的情况,如果日军打到了广州,就一定更加混乱。可是这一天"前线"的形势更加不妙,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再到芳村集中,先过一条江再说,并且在芳村整理好队伍以便有效率地行动。我这个主张得到总队部的几个负责人的同意,就在芳村宣传告一段落返回广州之前向全队进行了布置。

在这里我要讲一讲为什么我没有主张抗先队立即离开广州,早一天离开当然安全得多。广东有不少进步青年,党领导下的其他青年团体可以早些日子离开广州,但是抗先不能走。这是因为抗先的队伍本来比较大,在游行中又扩大了一些,党组织也动员了一些单独不便行动的人到抗先队伍里来,人数达二三百人。一下子撤退,国民党政府会说我们逃跑,给我们

造成不良影响。抗先是一个革命团体，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声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么多的人离开广州之后，生活和工作怎么办。我们想争取获得一个合法名义，让国民党承认这支队伍是第四战区战地动员队的成员，为此，抗先总队长，既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的公开党员的邓明达，正在为这件事与国民党省党部和第四战区谈判，而整个抗先队要等这个谈判有了结果才好行动。不过在芳村宣传那一天，谈判还没有取得结果，因此只好第二天先走半步出发到芳村。

第二天出发到芳村是不准备回广州的，要求大家带好离开广州要带的东西。这一天到的人更多了，连代理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工作的李大林、区梦觉大姐等都来了。还有好些抗先队员的弟妹也来了，年龄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过江之后，我们“住”到芳村的一座小学（似乎是教会学校，校舍很好）。我和总队部的人早就商量过，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好好地组织一下和进行一番军事训练，否则很难行动。于是就用一天的时间，编队，在学校的操场上操练，进行军中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行动敏捷，服从号令，守纪律。这一天的训练收到很好的成效，使我放心不少。

天黑了，队伍在芳村小学休息下来了，半夜 2 点左右响起了空袭警报（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后，日本飞机常来骚扰，但没有轰炸，只是不断发出空袭警报），惊醒了大家。不多久警报解除，但是听见珠江对岸传来摩托声。派人到江边观察，回来说长堤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向西开。总队部和我一起分析了一下，认为国民党正在撤离广州，而事先一点信息也不告诉我

们。我们一刻也不能在这儿等待。邓明达谈判的结果也不能再等了。

于是我们当机立断，不再睡觉，立刻整队向佛山方向出发。走到第二条要渡过的江面，总算看到了几条小船，来来回回运了不少趟，二三百人才算过了江。

我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佛山前进，这时候天早已大亮，铁路两旁的小道挤满了人，广州市许多人都沿着铁路走向佛山。晚间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又走了不少路，当然是很疲乏的，但是为了赶时间，大家没有休息，即便走得慢一点也不能坐下来。中午饭没有吃，也没有东西可以吃。走到佛山时天已经快黑了，在佛山队伍休息，限定时间各人弄点吃的就回来集合。大家都能做到准时集合，没有走散。

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省党部的谌小岑书记也在佛山，邓明达也在，于是联系要求谌书记检阅我们抗先的队伍。当我们整队走进检阅的场所——佛山县城里的那个公园时，疲劳的队伍打起精神，高唱“保卫华南”“武装保卫大广东”等歌曲，围观的群众，精神为之一振。谌书记也对这支队伍深为满意，并答应了把我们编为第四战区战地动员工作队的要求，给队员以国民党二等兵的待遇，一个月十块四毛钱。严格说来还不如二等兵，因为不给发制服。尽管如此，队伍总算取得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地位，生活也有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保证。

检阅之后，我要求总队部下命令立即出发，那是接连的第二天夜行军，大家非常疲倦，连总队部有些同志也感到疲乏。青抗先的总队长没有跟着队伍走，副队长是陈恩，那时候他还

不到 20 岁(其实那时我也只有 23 岁,但我觉得比他大许多)。总队部的成员有黄泽成、唐健、温盛湘、梁威林、朱配良等。有时我看到陈恩睏得睁不开眼的时候,只得把他叫醒,让他催促队伍前进。大家实在太缺觉了,有时让他们就地坐下休息 5 分钟或 10 分钟,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睡着。但是我不敢让他们休息,因为日军就在身后。

这支队伍过了三水走到江边的马房,天又亮了。这么早,日机就来侦察,幸好不是轰炸机,没有伤人。在江边我们见到有一条相当大的轮船泊在江中,要过江只有坐这条船,我们就派了两个队员坐了小船去联系。这条船开动了一次,就把二三百人渡过了江。后来一问才知道,原先那条船上的人不肯帮这个忙,我们上去的两个队员是带着"盒子炮"多少实行点威胁才迫使他们为我们服了一次务。

过了江,我们定心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家也轻松了下来,队伍就采取慢速度行进,又走了一天多才到了四会县的凤凰村。后来知道,正如预料的那样,在我们离开广州的当天,日军就占领了广州,在我们离开佛山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佛山,在我们离开三水和马房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三水和马房。我们赶在日军前面只不过一天的光景。我们终于免于受到损失。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坚决执行"逃跑主义",自认为是有点功劳的。

这次撤退,我冒充自己在北方学过一些军事知识,这样大家才相信我。其实我一点也不懂,我只是计算了一下时间:日军会以多快的速度前进,我们的队伍应以怎样的速度前进,我

们只有采取特别的急行军的办法才能赶在日军的前面。这样做，对于我们这样一支队伍来说是很辛苦的，但是必须这么做，因此只有勉强大家去做。有时甚至是暴露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也不得不采取督促总队部的人下命令的办法。但是最后的效果还算是好的——我们全体一个不少地安全撤离了广州。

9.6 四会之会

广东省青抗先的那支队伍，撤退到北江西岸的四会县凤凰村之后，队员们休整了三天。我也趁此松散了一下。但是那时代替张文彬主持省委工作的李大林却非常之忙。他就在这支队伍里，作为一个队员，在佛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检阅抗先队伍时，他也在队伍中。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国民党的省委书记检阅我们的省委书记。但是在行军途中是我做主，向抗先总队部的同志发号施令，我没有找过他、问过他。现在行军结束了，他就站在省委的立场上考虑在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党的工作应该做怎样的部署。眼前必须解决的一件事情，便是把这支队伍中的党员（数量不小）和非党积极分子今后的工作做出安排。参加这次行军从广州出来的非党的青年，不论是否抗先队员，革命热情都非常之高，他们完全愿意听从党的指挥，而省委也把他们和党员同样看待做出安排。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广东省党组织的状况和党员们的状况我都不怎么了解。所以李大林也很少要我发表意

见，而是找梁嘉、区梦觉这样一些在广东党内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商量。

在四会三天研究的结果是，把这二三百人分散到广东各个地区。四会和四会以西的广宁一带在地理上叫做西江，就近留下一部分人来工作。北江、东江、韩江、四邑、南路乃至广州附近的县份也派人去，在这个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开展工作。在四会的最后一天，还是由抗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召开全体队伍的会议，讲话分析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的形势，那就是国民党的政府在军事上失败，但民众性抗日战争高潮将要兴起。在广州未沦陷前我们的主要力量放在这个城市，在城市中扩大了党的队伍并对广州青年进行了教育，提高了广州青年的觉悟，这是必要的，现在要把在广州的力量分散到广东各地，深入农村，开展对日游击战争。这实际上是传达李大林代表省委的意见，并且宣布去各地的名单（这名单也是在李大林那里定下来的），要求很快出发，仍用第四战区战地动员工作队的名义进行活动。

我被分配到北江，要带十来位党员和抗先队员到翁源县。去北江的不止翁源一个队，沈毅、黄儒汉他们去连山，在北江西面。我们在北江东面。我只知道那时省委把四会、广宁即西江作为与各地联络的地点，让梁嘉留在西江，李大林则到处走。不过在去翁源的人中有一位“牛女”，其实就是梁嘉（他的外号叫大牛）的妻子，可是只说是梁的妹妹。在去翁源时，梁嘉也跟着去了，然后返回西江。

四会这个会在广东省党史上我想应该有相当高的地位，

至于应做怎样的评价，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不能发表什么看法，有机会倒想问问现在还健在的抗先队的战友们，他们也许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1994 年我在肇庆开会，会后专门访问了四会，找到市委负责人，他们说不清楚，后来找到了四会的党史办公室，他们说因为前年广州有人来过，所以还知道这件事，带我到四会凤凰村去走了一趟。原来这凤凰村离四会很近，现在就在市区之内（当年我们没有进城，因此说不清它的位置）。这个地方兴办了一个四会当地人与台湾人合资的企业，盖起了楼房，已经看不到任何当年的痕迹。当年我们住在那里开过三次会的小学校也不见了，党史办的同志指了一下那个学校原址的方向。真是沧海桑田，变化很快。从四会回到广州，和原先抗先队的同志联系了一下，说什么时候方便大家再去那里走一次，怀念一番，也帮助广东省和四会市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们做一点工作，并且考虑在那儿做一块牌子，把当初四会之会的历史记载在上面。

9.7 在北江上

从四会到翁源，先要坐船到大坑口，然后再走将近 50 公里的公路。

听说坐船，大家很高兴，谁都没有这个经历，而且刚刚一连走了几天，也想改换一下交通方式。

没有想到坐船还要靠我们自己的两条腿，因为去大坑口是逆江而上，要拉纤。

那天上午告别了去其他地方的同志们，其中有的先我们而离开凤凰村，有的我们走时还没有走，就背上背包向四会江边走去。我这里说的江不是广宁下来的冷江，而是西江。冷水就在凤凰村附近，据说在那儿租船不那么容易，我们就决定走到西江边上的大塘，好在路也不远，只有 10 公里至 15 公里，而且已经休息了三天，不那么费劲地就到了江边。在江边租到了一条船，能够躺下我们十三四个人。船主对我们说，你们人太多，逆水行舟，我拉不动，希望你们再租一条船。我们说还是一条船好，拉纤的事就由我们自己来干吧，你教教我们。

我们一共七八个男的、五个女的。男的中有一个人腿不好，我们把他排除在拉纤者之外，他无话可说。六个人分两组，一次三个。我们不要女的，女同志们坚决反对。五个女同志中有一位是大姐，所谓大姐，其实也就 40 岁上下，在坚决提出反对的女同志中没有她，我们也就不考虑她。我不知从哪儿听说女同志在一个月的某几天两腿泡在冷水里不好，就把女同志下水拉纤的批准权交给那位大姐。于是可以五个人一组两组轮流拉。

我们十几个人大多数都会唱船夫曲，却没有一个人拉过纤。我以后再也没有拉过纤，我平生只拉过这一次。我们把绳索套在肩膀上，走动之后并不很吃力，船就慢慢地移动起来。船走的速度和人拉纤速度一致，很慢。从四会到大坑口要过清远、英德，船主说走得再快也要四五天。那就只好慢慢地走吧！

那时正是阳历 11 月，北江的水还是挺暖的。拉纤人的姿势是身向下弯，脸朝着水看下去。那时北江的水清澈极了，水

底的卵石不但轮廓甚至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光着脚——当然光着脚，不可能穿鞋袜，走在卵石上并不感到特别不舒服。我们拉着船，男男女女，一边拉、一边唱，会唱船夫曲的唱，不会唱的跟着唱。我们也唱别的革命歌曲。另一组的人坐在船头上，也不怕压着船头我们拉起来吃力一些，瞧着我们的热闹，也常附和我们的歌唱。有时不唱了，坐在船上的人和拉纤的人之间大声说一些逗乐的话。那样的生活，真够罗曼蒂克的。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和大家一样都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1988 年也就是 50 年后，我坐在汽车上，看到北江的水比较混浊了。广东的同志告诉我，由于粤北的森林没有保护好，现在已经没有我说的那样清澈见底的北江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那么认为，我想也许是季节的缘故。我真想等水清澈的季节重新在北江的水中行走行走，哪怕需要别人搀扶，也可以增加我几分活力。）

由于第一天到四会江边已经迟了，租好船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要准备在船上吃的东西，所以当天大家躺在船里在大塘过夜。第二天一清早动身。船走得很慢，从大塘到清远很短的路程走了一天。晚上宿在清远江边。我们要船靠岸，船主说还是离开岸远一点好，因为晚间清远常有老虎出没。他让我们看清远江滩上老虎的脚印。

在清远，我们没有上岸游逛，第二天清早从清远北上，又走了四五天才到了我们该下船的大坑口。路经瑟江口、连江口、英德，一路上白天行舟，晚上在船上点着微弱的灯光——多半连灯都不点，说说笑笑，各自讲自己爱讲、别人爱听的话

题。大坑口有一条公路通翁源，是下船最合适的地方。

一路江水都那么好，我们对拉纤行舟还没有厌倦的意思。在大坑口上岸时，我竟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

9.8 初到翁源

在凤凰村会议决定我去翁源之前，我虽然两次到广东，但是还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县，现在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工作了。

到达翁源的路线已经问清楚了：船到大坑口上岸，就可以踏上前往翁源的公路。从大坑口到翁源，本来有长途汽车，可是那些日子停开了。好在我们这两条腿很管用，走这么几十公里的路不算一回事，难不倒我们。

那时翁源的县城，就在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镇的翁城。从大坑口先走到三华，再前进 20 来公里就是翁城——我们此行原定的目的地。

这条原来很偏僻的公路，广州沦陷后，行人多起来了。在公路上走的人从服装和神情一望就知道是从广州来的。我们一行十几人也是这样。

在路上，我还遇到过 1936 年下半年参加我在广州组织的那个救亡团体的成员凌云衢。他 1937 年初被捕，抗战爆发后释放出来了。见到他我特别地高兴。从他那里我了解到那次我们的组织被破坏后的许多情况。不过那次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取得联系，关于他，至今没有听到确凿的消息。

没有想到我们到翁城的那一天正是日机对翁源大肆轰炸

的第二天。在广州，日机只是侦察不轰炸，没有想到却来翁源轰炸这小小的县城。我们傍晚进城时，城内一片废墟，人都逃出去了。当时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在那里过夜。我找到了一个棺材铺，房子还完好，我就在翻过来的棺材盖上过了一夜。这张"床"两边高一点，中间是凹下去的，睡着倒不容易滚到地上。

到了翁城，知道翁源县的政治中心已经不在翁城，而是搬到了还要向东前进几十公里的龙仙圩。镇在那里叫做圩。一直到现在，翁源县委和政府设在龙仙，没有再搬回翁城。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龙仙，早早就到了。我们立即去找住处安顿下来，当天就走到龙仙街上对群众做抗日救国的宣传。

在去翁源前，我在四会找到一位对粤北的情况有些了解的人问了一下有关翁源的情况，他告诉我，翁源周围的几个县，如北面的南雄、始兴，西面的韶关，东面的连平，红军都到过，唯独翁源没有。在翁源只有个别从广州来的党员，当地人一个党员也没有。这个县还没有县委组织，省委要我们去建立县委。我们是到了一块处女地来了，我们是垦荒者，大家非常高兴。

到龙仙后整队人马一起活动了几天，由于不了解情况，只能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同时我们抓紧了解翁源一般的情况。我们了解到翁源是一个山区，大米、芋头、生猪是翁源的主要产品，人民生活水平一般，谈不到富也不是非常贫困。也可种植甘蔗，但生长条件并不好，所以甘蔗制糖的效益大大不如珠江三角洲。有一条河流翁江，翁源即由此得名。翁江从这个县龙

仙圩东北两条溪流发源后，过官渡分两支流入北江，一条在南面流到英德，一条在北面流到大坑口。去大坑口的这一支水，经过翁城。翁源离广州并不远，只隔几个县城。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觉得翁源的地理位置对于广东抗战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时广州的许多机关都往翁源，但他们并不关心翁源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大有可为的。

根据当时对翁源地理的大致的了解，我们决定我们的人马分做三批，一部分人在三华，是最西面，靠近韶关和英德；一部分人在龙仙，这是翁源当时的中心；还有一部分人去龙仙北面的江尾堤子，便于深入山区。周陂有个中学，有我们两个党员在那里。一是温京（后改名陈华），是学校的教员，还有一位是姓廖的女教员，我们也把那里视作我们的一个点，但是分不出人去那里了。

9.9 当我一声令下允许唱歌的时候

到翁源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唱歌”问题。

唱歌会成为问题，去翁源前当然想不到，就是到了翁源，也是遇到一些事情之后才弄明白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去翁源，公开的身份是第四战区战地动员队的队员。去翁源的这个队清一色地由从广州来到这里的党员和广东省青抗先队员组成。我是这个集体的领导。我们这个队的任务是在这个山区县发展党员，建立县委，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准

备粤北游击战争。一到翁源，我们就以演讲、演话剧、找群众谈话等方式开展宣传工作。我们这个队在没有分散前有十多个人，都是青年人。我们出发去做宣传时，一边走一边唱革命歌曲。开头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广州时，我们这些青年同志天天都是这样的。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老百姓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瞧我们。有一天我一个人从龙仙圩到周陂，要走15公里山路，翻几座山。我一边甩着从路旁柳树上折下的一根树枝，一边唱贺绿汀的《我们在太行山上》。万没想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妇女回过头来骂了我一通，说我不该调戏她，这使我十分狼狈。我只是装着不懂，急急忙忙超过了她走我自己的路。我很奇怪这件事，到了周陂，告诉了那里一个中学的教员，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个地方很闭塞，当地人的习惯：唱歌就是调情，山路上只有你们两人，她就这么误会了。他这么一说，我回想起前几天我们一队人到了一个圩——坝子，大家正向群众做宣传，我坐在临街一所房屋前的台阶上，用笔记些什么，有一个老百姓跑到我跟前问我："这些女孩子（队伍中的女同志）你是用多少钱买来的？"于是我明白了我们队伍的威信之所以受损失，原因是当地老乡误以为从广东来的这群男男女女成天在调情，都是些不正经的人。不改变他们的这个观念我们怎么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呢？于是我就给大家下了一道死命令："绝对不许唱歌！"

同志们对我这道命令服从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从城市来到农村，每月只领国民党二等兵的饷，而且还不如二等兵，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但是不让他们唱歌，我看出大家很不习

惯，感到一种很大的压抑。那时我也是每天不能不唱的，我的感情和同志们差不多。憋了一阵子，我看大家憋不住了，我自己也憋不住了，于是在阴历十月十五月圆那天晚上（我查了一下万年历，那天是 1938 年 12 月 6 日）下了一个决心，允许大家唱歌，但是不能在村内老百姓听得到的地方，要翻几个小山头，到老乡们听不到歌声的地方去唱。读者一定想不到那些队员对我这个宽大的命令的欢迎是何等热烈。吃过晚饭就整队出发，上山时，刚刚升起的满月从松树林的空隙中露出来，柔和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景色，50 多年来一直好像就在眼前。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走到了预先选定的那块林中空地，我一声令下："唱！"十几个人就像疯了似的，兴奋地唱起来。好几个人在地上打滚。这样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留在我脑中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我认为这样的回忆可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歌咏历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我这个回忆是完全真实的。这个典型的事例说明，在抗战前后，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对用唱歌来抒发自己的革命感情有着强烈的需要。在 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政治统治下，广大爱国进步青年的热情受到长期的压抑，一旦革命高潮来到中国大地，那样的心情要求用革命歌曲来表达，唱歌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迫切需要。回想那个时期，我们这些做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人，特别看重这样两种工具：进步书刊和革命歌曲。常常用读书会和歌咏团这样两个组织来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就是我这样唱歌走调的人，也还组织过好几次歌咏团教人唱歌

呢。前几年我遇到当年的老朋友，他歌唱得不知比我好多少倍，可是他告诉我说，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我还是他的老师和引路人呢。

1985 年我重访龙仙，特别提出去看看我们上山唱歌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已经盖起了楼房，山上的松树林也没有了。那晚的景象只好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9.10 如此演习

我们认为粤北这个地方，日军迟早是要来的，因此就要在这里做打游击的准备。游击战士一定是当地的农民，做打游击的准备就要向农民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不仅这样，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在龙仙有几十个“保安团员”，有十几条枪，这就是当地的武装力量。这支地方武装的建立最初还是准备对付红军的。翁源北面的南雄就是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县份，三年游击战争留在江西的陈毅等同志就在交界处的梅岭一带活动，陈毅同志写过梅岭战斗生活的诗。赣南的虔南就在翁源西面，但是红军没有来过，这些保安团也从来没有打过仗。我们就做这个保安团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为了使他们接受我们的训练，同志们就介绍我是懂得打仗、懂得军事的人。保安团的人也就相信。这是我第二次冒充懂军事的经历。

对打游击战争，我看过民先队部发的《游击战争纲要》，我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军事训练不能只是去讲，还要进行演

习。龙仙南边有一个很大的村庄叫李村。李村有一个完小，是龙仙的一个很大的小学，我们也很看重在这个小学的工作。李村小学有个教员同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关系。于是我们组织驻在龙仙的保安团员和李庄的老师、学生之间进行作战演习。

演习的方案是我这个“懂”军事的人拟定的。我设计这是一场遭遇战。龙仙保安团作为甲方是一支巡逻的队伍，向李村行进。李村的师生作为乙方，是从某一个村庄返回李村的驻地，两者在中途遭遇，于是打了起来。演习的目的是检验行军的警觉性、战斗准备和遇到情况时的应变能力，以及实际战绩。我拟定了双方行进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也就保证双方会遭遇到，但我们不能让任何一方知道对方的情况，否则就不能模拟遭遇战了。

在演习中不能没有武器，保安队的枪支不能动用，双方都用竹竿作为枪支，拣了许多松球，象征手榴弹。用香火点燃爆竹来造声势。规定手榴弹落在自己身旁，就必须“受伤”或“死亡”，这当然要有自觉性。双方队伍中都有我们的同志来监督。我和一位同志跟着龙仙保安团的队伍走，胜负的评判员就由我来担任。另外有一位同志跟着李村师生的队伍走，担任副评判员。

准备了两天，一天上午双方按规定时间出发，果然在某个地方遭遇上了，于是就开火，炮竹不断地响，两队接触时“手榴弹”纷飞，双方都有“伤亡”。

那次“演习”双方都十分认真。本来是近似游戏的事情，双方都当作真的军事训练来看待，双方也都服从我的裁判。在这

次演习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保安队员手边没有可以点燃炮火的香，他很着急，正好附近有一个土地庙，就跑去跪在土地爷面前求情，为的是要香炉里的那些没有燃完的香火。

演习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论保安团员还是师生（这个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年龄并不太小）都很满意，演习完了都问什么时候再举行第二次。以前我们在城里的青年工作常采用读书会或歌咏会两种形式，在翁源农村看来这两种形式都不合适，这次演习给了我们启迪，有条件时进行军事训练可能是一个好形式。

后来李村的那个教员加入了我们党，保安团员中也有好几个人了党。白军来了之后，他们成了粤北游击队的成员，不过那是我离开翁源几年后的事情了。

9.11 瘴气和一条旧棉被

大家都说翁源的瘴气很厉害，可是到了那里我们感觉到空气很新鲜，一点乌烟瘴气的迹象都没有。瘴气是某种地方性疾病的发生得不到正确解释时编造出来的一个名词。于是词典对这个词的释义是“在山林中一种温热而致人疾病的空气”，其实这种空气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同志到了翁源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生了一次恶性疟疾。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瘴气。据说这种疟疾也是蚊子传染的，但传染这种疟疾的蚊子不是在混浊的水里生活，而是在很清的但不流动的水里生活。在翁源有这种水，但是我没有看到过这种蚊子。由于气候适当和有

这种传染物生长的水，这种疾病就有发生的条件。不过十多个人中唯独我没有得这种病，好像我对这种疾病有特殊的免疫力似的。

恶性疟疾与普通疟疾相同，患病者忽冷忽热。感到冷的时候就要盖被子。全队只有我拥有一条旧棉被，从广州撤退时，它是我仅有的财物，“行军”中我一直带着它，把它捆起来，成了一个圈，套在身上。这条被子不厚，是条薄棉被。我似乎见到作战部队也有这么带棉被的，不过我还是不会打行李，带着它既不方便也不好看。队员们没有一个带棉被的，10 月份的广州天还很暖和，人们因此笑话我。

在从四会到翁源的路上，它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大家躺在船上，打地铺，这“地”是木板拼起来的，不那么平，同行的人都只带一条毯子，底下就不那么舒服，于是就把我那条棉被铺在下面，都称赞说这条被子真不错。

到翁源后，队员受到瘴气的侵害，发冷的时候就问我要这条被子盖。开头还说向我借，后来它就成为公共的医疗用具，曾被取笑的这条旧棉被成为特别受欢迎的东西。尽管我没有拆洗过它，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嫌它脏。有一段时间它成为一天中不能缺少的东西，连拆洗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我们这个集体中还有好几个女同志，可她们也没时间动手去拆洗。

9.12　两个晚上，天上地下

1939 年 2 月 18 日，戊寅除夕，在粤北翁源龙仙圩，我度

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我是1938年11月到这个地方的，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多月，建立了初步基础之后，在除夕前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韶关，回省委机关工作。

对组织的命令我从不讲价钱，而且通常一天都不耽搁，但这次我还是拖了好几天，拖到在翁源过了除夕和元旦之后再走。在翁源，整个工作队分在全县好几个地方，我们在的龙仙是中心。我住在离龙仙圩不远的一个叫陈屋的地方，和我一起在龙仙工作的还有五位队员，三女二男，都住在一起，大家感情很融洽。他们听说我要离开他们，有些舍不得，可是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打算跟他们一起度过除夕时，大家又喜出望外。他们就为我做了欢送准备。

在这一天，白天老乡给我用柑橘叶煮了一大桶水，送来让我洗澡。这水颜色碧绿，又非常之香，不知含有什么成分，有很好的除垢性能。我用它“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特别干净，皮肤特别滑溜，全身散发着一种天然的清香。这是我一生中洗的“最高级”的“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洗第二次这样的澡。我不知道老乡给我送来这一桶水是不是因为听说我要走而专门用柑橘叶来煮的。

晚上，同志们杀了一只鸡，做了几道菜，六个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除夕饭。大家都不会喝酒，就用茶代酒。这顿饭既可口又丰盛，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美餐了。

饭后就开始“晚会”。

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反正是一致同意，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或表示怀疑，大家决定举行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彼

此之间的了解的活动，即把这个晚会开成一个“坦白”晚会。这个晚会立下一个规矩，对某个人提出有关本人的问题，他一定要答复，不隐瞒也不掩饰，完全坦诚相见。晚会就这么毫不勉强地进行起来了。会开得很开心也很激动。回想起来，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单纯，把什么都讲出来不那么困难，没有什么隐私怕让人知道。有一个女同志，她不是跟大家一块从广州到翁源的，而是不久前同她的丈夫——广东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司马文森——一起到龙仙来的。她看到我们这个集体生活得这么好，就和她的丈夫商量好，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那天晚上，有人要她讲讲自己和那位作家的“恋爱故事”，她坦白得不能再坦白。在那次晚会上，我们这群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太理想化了。我相信这样的事很少会发生。我自己也没有第二次类似的经历。

第二天是已卯元旦。上午我就搭长途汽车去三华。有另外几个队员在那里，我想同他们一起过个“大年初一”，也会过得很愉快的。三华本队驻地，我没有去过。我们这个工作队在三华的负责人邓楚白，不是同我们一起从广州经四会来到翁源的，而是我们到了翁源之后省委派他来的。省委的意见是在翁源县委建立起来后，要他担任县委书记。在省委要我离开翁源去韶关后，我请邓到龙仙来了一趟，对今后工作做了一些交代。也就在那天他告诉我，在三华的同志们听说我要离开翁源，想再见我一面，希望我在去韶关的路上到工作队的驻地去一趟，而这也正是我的愿望。去三华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就问邓楚白到他们驻地如何走法。他告诉我，在三华长途汽车

站下车后，向前不多远有一条朝南走的土路，顺着这条路走，过一座桥，向前走不到三华里，就到了他们所在的“下坝”，再一打听“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队”，就会有人告诉我。

那时从龙仙到三华的长途汽车已经通车好久了，我就在大年初一上午搭车从龙仙前去三华。那天我在三华下车的时间是下午 3 点左右，天色尚早。向前走几十米，果然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小路。再往前，果然有座小桥。又走了将近三华里，到了一个村子，打问“这儿是不是下坝”，老乡向西一指，说不远了。我问还有多远，老乡说“只有三里”。我朝着他指引的方向走了约三里，到了一个村子。再问“这儿是不是下坝”，回答说“不是”，再问，那人又指了一个方向，说到下坝还有三里。再走了三里，又有人指另外一个方向，也说还有三里。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而且下起了雨。我真有些着急了，越走越黑，初一没有月亮，加上有云，没有星光，连路也看不清楚。我只听见远处传来的元旦放爆竹的声音，看不见灯光。一时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走到一条河边，有一座很狭窄的木板桥，也看不清楚它有多长、多高，因下雨，桥面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到桥下。南方没有很浅的河，夜间摔下去，没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桥，前面倒是一个村庄。这村还有街，街上还有卖鱼生粥的，摊上有电石灯。这对我来说真是大放光明。我吃了一碗鱼生粥，下决心这晚不再去找“下坝”，想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我发现了粥摊就摆在一座房的门前，门还开着，有些穿军装的人在进进出出。这粥摊主要就做这个房子里的人的买卖。我进门后，发现它是国民党一个机关的驻地。我

公开的身份是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胸前有符号。我就用这个身份要求借宿，却遭到了拒绝。我实在不愿再走了，打听到村内有一间没有人住的破旧小庙，我就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找到了那座小庙，在那间破庙里呆了一晚。第二天一看，小庙离那粥摊没有多远，可是晚间却觉得似乎相当的远。那个小破庙能够避雨，地上还是干的，我就靠着墙坐在地上打盹。打盹一阵子，醒一阵子。在粤北的元旦之夜，还是有点凉的，那破庙又只挡雨不挡风（幸亏那天晚上没有大风）。这次去韶关，我把那条薄棉被留在龙仙，这一晚就不能靠它御寒了，只能把随身带的衣服统统穿在身上。我原先希望在三华过的那个热闹愉快的夜晚，没想到会在这样一间庙里度过。与在龙仙的那前一晚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一夜一直熬到天有点亮，我就走出庙门，继续去找“下坝”我们队的驻地。上午倒没费太大劲儿就找到了我们在三华的那个小分队。他们告诉我，昨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越是这么讲，我越是埋怨邓楚白没有说清楚怎么走。其实下坝不是一个村的名称，而是那一片村庄的名称。在三华，从广州出来的机关很多，因此我们这个战地工作队的影响就不像在龙仙那样出名，是他把自己这个组织的知名度估计高了。

我在三华住了一晚，1939 年 2 月 20 日离开翁源，当天就到了韶关省委机关。

9.13 在韶关

省委书记张文彬从延安开过六届六中全会回来，决定在粤北韶关成立机关。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留在广东的省委委员分散去广东各地工作，现在决定集中在韶关建立省委机关。

韶关是粤北在北江上的一个中心城市，东面是仁化、始兴、南雄、翁源，西面是乳源、连山、阳山，北面只隔一个乐昌就到湖南边界，南面隔了英德、佛岗、清远、从化，就到了广州郊区。这个小城市在广州沦陷后就成了广东省的中心城市。原来广东省的机关都集中到韶关来，我们也就选择这个地方来建立省委机关。

在韶关建立省委机关后，虽然没有挂牌子，可是像是公开机关，不但委员们而且省委领导下的部门也都住在一起，有一点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南昌新四军总部的架式，当然没有多少间房子，只是一排小平房。一个不公开的省委机关用这样的方式来设立，这大概是与当时广东省的政治形势比较轻松有关。

韶关的县城在北江左岸（面向下游），我们的省委机关设在北江右岸临江的一条小路上，与韶关城区隔江相望。这时候江上又没有桥，去韶关城就要坐船，交通并不方便。

在韶关我见到了张文彬、吴华、张越霞、李大林，他们是我在广州时就认识的，还有古大存和涂振农。古是第一次见面，

涂在南昌见过，他们两位是新到省委工作的。张文彬还是省委书记，吴华还是省青委书记，我去广州本来是长江局派去帮助工作性质的，这时候就要我正式参加青委的工作。省青委还找了两个干事，都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一位姓张，一位姓饶。

我在韶关工作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中有半个多月不在韶关，而是在韶关南面的一个村庄“马坝”。在那里党也团结了一些地方武装力量，要我去做这些人的政治工作，而且进行军事训练。那个小小的武装的头子，思想比较进步，还真懂得点军事，我就不再冒充懂得军事的人了。我倒真的想向他们学一点军事技术。他们的枪支比龙仙的保安团多，子弹也比较充足，因此在马坝我实弹射击过好几次，可是实在惭愧，好几次不但没有中，而且连靶子都没有打着。

在韶关我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召集全省青抗先的会议。那是1939年4月间的事。从1938年10月四会会议之后，同志们分散到各县，到那时有半年了。在这半年中，队员们彼此基本上没有联系，但是力量飞速发展，从四会分散时每个县十来个人，到半年后有的青抗先队伍扩充了好多倍，相比之下，我们翁源的工作似乎有些落后。我们没有抓紧发展抗先。其中有些县，抗先发展的情况很突出，例如中山县的国民党的县长张惠常，自己愿意当青抗先中山县的大队长。他运用政府力量，使青抗先在这个县内一下子发展到一万多人。对这种情况，韶关会议上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力量的壮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山县的抗先队在性质上一定是起了变化的，不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

体，而成了国民党官办的团体了。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4 月会议没有最后达成一致。省委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让我们青委掌握全省青抗先的情况，研究一下会后的方针。同时也用这个会议作掩护，与各县的党组织进行一次比较集中的接触，掌握一下全省的政治形势，研究一下党的工作。

总之，开过这个会议，我们都认为全省抗先队的形势很好，是一个大发展的形势，会议上乐观的空气占到上风。可是那时也有一股反动势力正在向党进攻，这一点已经开始露头。可以说，1939 年 4 月是一个由好变坏的转折点。我们虽然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但认识还不那么清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半年中同志们大都埋头在群众中工作，对全国的形势以及广东省的形势，不甚了解。因此我感到 4 月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缺乏远见，没有能对在各县工作的情况、斗争形势做出很好的判断和分析。

在这个会议上，许多从广州一起撤退下来的在四会分手的同志见了面，由于这几个月工作非常顺利，见面时都眉开眼笑。

在韶关，我了解到尚仲衣教授也在这里，他租了一条不小的船，泊在北江之上。我们见了面，谈了不少情况，他告诉我，他去过翁源，并且在去翁源的公路上见过托派杜畏之。在韶关我和他见面后，就同他失去了联络，对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1939 年 5 月省委接延安中央青委和中央组织部的电报，要我回延安。说“回延安”，并不是我从延安来再回延安去。我

从来没有去过延安，而是我们这样的党员，把延安看成是自己的家，心想回到延安就同党中央更近了，可以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尽管我对在广东省开展工作有很高的热情，想在广东省把自己的根扎下去，愿意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广东革命力量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愿意在广东省的武装斗争中锻炼自己，但是延安要我回去，我还是很兴奋的。接到省委通知后，我就开始做回延安的准备，其实也没有特别需要准备的，只是有一点恋恋不舍的心情，把手边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把自己对广东省的想法和同志们多讲一些。

那次去延安，我是一个人走的，路线也很简单，从韶关坐火车到衡阳转湘桂铁路到桂林。一到桂林，找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接上党的关系，以后的路程方面自己不用操心了。从韶关到桂林不过两天的事情，实在是很简单的事情，因此没有等多少天，在5月里就同省委和在韶关的青抗先总队部的同志告别出发了。

5月里天气很暖，而且从季节上越来越暖。省委给了我二十元的路费，我说是够了。我随身只带了党的介绍信和从桂林到西安一路上我的朋友（多是民先和党内青年同志）的住址就出发乘上京广线火车北上了。

9.14　1939年在韶关“抗先”的活动片断

忽然收到杜襟南（陈嘉）同志从广州寄来的《于光远1939年在韶关“抗先”的活动片断》。这是当年我们在韶关时，他所

作的笔记和日记的摘抄。看到保存了58年之久的材料，引起我许多感触，又使我想起拜伦在《唐璜》中的诗句：

说来奇怪，文字原用来代替语言，
但哪怕寥寥几字都能传联万代；
而时间把脆弱的人欺负得多惨！
连这么糟的一张纸都比人长寿——
比他的坟墓、他的一切都更持久。

他所记录的当年在一起工作的人，如今一大半都成了古人，而我今年82岁，杜比我小一岁，转眼也81岁了。事隔多年，靠这样几张纸，使那些已经淡忘的人和事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他记录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在广东省委青委工作。1938年10月抗先的几百个同志从广州撤退、在四会凤凰村开会，会后由省委分配到广东各地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抗先的队伍大发展，于是省委提出要各地抗先负责人在三月集中到韶关——当时广东的政治中心，省委机关也就设在那里——汇总半年来状况，研究今后工作，并在韶关建立抗先总队部机关。

也就是在会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要我回延安。杜襟南同志的笔记是1939年3月在韶关举行的抗先总队部会议上我的发言，和会前会后我与同志们交往的一些琐事，以及我在他心目中的印象。

1939年3月的抗先与1938年10月的抗先，有非常大的变化。1938年抗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可以说基本上只是

在广州活动，人数只有几百人，参加的全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和青年。抗先和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民先，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骨干青年的群众团体。但是抗先没有民先那么“红”，还可以得到国民党少数人的支持。抗先的总队长邓明达是左翼青年，参加国民党，是我们党在抗战后吸收入党的新党员。他国民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而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通过邓明达，抗先同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书记长谌小岑等也有联系。但是在广州沦陷前抗先的人数还是偏少，广州沦陷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的成分也广泛了很多。如国民党政府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就兼任中山抗先队队长，仅中山一个县，抗先队员就发展到一万多人。国民党省党部也派人到抗先来当指导员。有两个“指导员”也出席了在韶关举行的这个抗先总队部的会议，并且在会上号召要组织三青团。这是抗先队伍扩大必然带来的问题。对这一点，我们广东省委是很清楚的，我们懂得一定要把抗先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一定要争取抗先广泛的发展，不搞关门主义。半年来抗先的发展是符合这个要求的。而在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则一直认为抗先是完全受共产党左右的团体，因此一直想对它下手。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国共关系的恶化，到第二年 4 月，即韶关会议后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抗先就不再能存在下去。可在那时，广东各地的武装斗争却逐渐发展起来了。广东的许多青年同志虽然对抗先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也懂得抗先只是一种组织形式，不可能也不必非存在下去不行。这一点在更多的抗先队员加入党之后就更容

易想得通。抗先在它存在的那一段时间内对于开展广东省的武装斗争应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韶关开的是各地抗先总队部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我们考虑要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因此就用比较多的时间在会上讲新战争条件下国际形势的特点。讲战争中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各国的立场。我不是报告人，但在杜襟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对“新战争的帝国主义战争本质”，“英法美各国的外交”做了分析，作为报告的补充。比如我讲了“罗斯福的谈话有教育意义”和“暴露美国政策本质的意义”。

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讲青年工作本身。

在这方面，据杜襟南的材料记载，在1939年3月23日的下午大会上，我做了四次发言，其内容有“青年化：1. 革命的热情；2. 同志谊（互相了解，发现对方优点）；3. 虚心学习。”并讲了一通“儿童工作”，讲了“游戏是最好的方式”。在杜襟南笔记中记有我讲了“翁源儿童，李煦寰考试”这几个字，其中“李熙寰考试”这5个字的含义我已看不懂了。

在韶关我们没有忘记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我提出要联系抗战实际开展一个新启蒙运动，我认为在抗战中的新启蒙运动的内容是“唤起民族自尊心、自重心”。我认为由于当时“民众落后，必须启蒙”。我还认为搞新启蒙运动要注意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缺点。总之把半年中在翁源农村工作时所思所想到的和学习到的一些思想在会上讲了一通。

杜襟南还把会外的事记在他的日记上。他把1939年2月21日、5月5日、5月6日、5月7日、7月4日和7月26日的

日记摘抄下来给我看：从他摘抄给我的一则日记中使我弄清楚了，我离开广东前往延安准确的日期是5月8日。在5月8日日记中记了邓明达为我饯行的事。

这几则日记现在就全文抄在这里，让大家看看当时所记有关抗先的一些史实。

2月21日（星期二）

“会后，齐集民教馆。首先认识了民先的于广元（光远），他今天从新江下来，有些能干，有他在抗先，无疑助力是很大的。沈毅和他自然表现出一种同龄人的亲密来！”

（杜注：民教馆是抗先总队部。“广元”应是我误记了于的名字。）

5月5日（星期五）

“有的事情由于没有计划性，温盛湘要回广宁去，便主张把三总全会的报告（战争面前的广东青运）油印带走，可是文章未写，临时催迫着陈恩与泽成做出来。果然，在好几人（温、涂、关、小邓）的不停写蜡纸、油印、折叠，费了很大精神力量，花了几日几夜时间，借了钱回来买纸印，还弄了一个通宵，使每个人都疲劳极点，使‘五四’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结果，印好了，很厚的一册，看是好看的，除了那些校对疏忽，抄写和印刷上的不良外，经小于看过一下，发觉有过于暴露自己、影响统一战线的政治问题，只好停下不发出，这一来，前此一切努力都是白花了！”

“小于也要走了，这人实在很合得来，据说是到华北去。”

（杜注：温盛湘，抗先总队部委员。陈恩，抗先副总队长。黄

泽成，抗先组织部长，1942 年逝世。涂夫，抗先宣传部干事，1993 年逝世。）

5 月 6 日（星期六）

“另外有一个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华仔召集的，应是省青年部的会议，而华仔是青委之一，主要负责人。出席者陈恩、泽成、唐健、小于、华和我。我是初次参加的，华特别说明了一句。

经过报告之后，就谈到抗先，从报告里得知国民党密令内容，的确对我党防范起来了，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然而又带有点不良气质。其次，知道了各方对抗先的批评，都是坏的多。

关于加强地方队部及出巡等决定外，并指出大家积极性不够，和总队部的没有实际威信，好些事情都没有通过总队部就此胡涂做去。”

（杜注：华仔即吴华，广东省委青委书记，1988 年逝世。唐健，抗先宣传部长。）

5 月 8 日（星期一）

“晚上老总饯行送小于，他到重庆再回山西去！对于这相识不久而私心感到甚融洽钦佩的朋友、同志，十分恋恋地分手了！晚上因与兆炳一谈，延误了送他上车，大见遗憾！

他一定要把我一本俄文读本拿去，结果，我不答应才取回，这未免对不起他，很为歉意，不过我也要读呢！以后一定要建立起俄文的经常学习，才对得起这个朋友！”

（杜注：“老总”是抗先总队长邓明达。兆炳姓陈，当时与他谈恢复党关系的事，他已逝世。）

7 月 4 日（星期二）

“劳家顺自云南来信给铭艳、小于，直白说明中大无支部组织，要小张、小于快把关系转过去。措词太差了，这种话简直是胡闹，明天提出报告，转铭留意。”

（杜注：这是光远走后的事。余铭艳，抗先秘书长。劳家顺是抗先秘书处干事，去了云南中山大学。小张是张月霞。）

7 月 26 日（星期三）

“新识同志中，张廉光有部分令我满意。小于一人（还有沈毅相当好），他给我印象甚佳，虽只短短期间，而且只开过一次会，他就离开了。可是他的学识，他的见解，他的魄力，他的态度，都是叫人可亲的，尤其是过人的学习心，观察细微周到，真是个难得的同志。可惜就是不能留此长久，得以接近多些与及得到多些益处。他懂俄文，更是大帮助；至此，我又得抱歉万分，答应了他要读俄文的，至今还没法读起！”

（杜注：张廉光后名张持平，留东同学，当时为抗先总队部党支部书记，1994 年在广州病逝。）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想说明一下，那就是我为什么会那么想向杜襟南要那本俄文课本。这是因为 1936 年我在广州通过一家日本书店买到一本苏联出版的俄文读本，为了自我检查自己念俄语的速度的进步，我在这本书上做了每读一篇课文都用几分几秒的准确时间的记录。这个读本在 1937 年国民党要捕我时，因匆忙离开广州未能带走，1938 年为我保存此书的朋友，使我重新得到此书。而在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时又第二次失去。而杜襟南有的那本正好是对我有纪念意义的那一种，因此我提出要他送我。我对俄文是初学，杜襟南认为我

如留在广东能帮助他学俄文，那是他不了解我的俄文水平几乎等于零所致。

10 从韶关到延安途中

10.1 桂　林

在衡阳我没有找什么人稍事休息就西去桂林，在桂林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搭军车。桂林是我去延安的第一站。

桂林当时的气氛与广东很不相同。战火一时还烧不到那里，政治环境还算比较可以，所以文化界、新闻界的人就集中在那里。有从武汉来的、广州来的、长沙来的，还有从上海来的、香港来的……比较热闹，比较活跃。我的熟人也不少。黎澍那时就在国新社，我和他在长沙《观察日报》一别，在这里重逢，很是高兴。除国新社外，《救亡日报》在桂林发行，这张由郭沫若创刊的报纸影响很大。除了这两家新闻单位外，还有一个青年记者协会，范长江在那里负责。我和范长江初次见面就是那一次在桂林。在广东当时的环境下谈不到任何文化工作，后来我又到了

乡下，有半年之久别说比较大的城市，连县城也没有到过一个，我完全是一个乡下人。现在到了桂林，别有一番感受。听听朋友的高谈阔论和来自四方的消息，日子过得很快。

在桂林我住在湖滨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似乎就是青年记者协会的，是朋友们为我安排的。

到桂林后，我的中心任务就是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北上的问题，在八路军办事处，我见到了叶剑英将军。我曾经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过他。他告诉我，他不久就要去重庆，可以把我先带去重庆，要我在桂林等着，由于出发时间不一定，嘱我不要离开桂林，免得找不到我。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呆在桂林不动。

“桂林山水甲天下”，5 月是特别好的季节，但那一次我一个风景点都没有去。“阳朔山水甲桂林”，我知道乔冠华这时在阳朔。乔是民先柏林队部的，1938 年回国后，我们在武汉和广州都有过接触。本来可以看看他，顺便看看甲桂林的阳朔风光，可那时我一点闲情逸致也没有，就在住所等八路军办事处的通知。

在桂林有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这件小事后来产生了一个结果，以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到它，而且多次提到它。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桂林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日记本，是 36 开的，200 多页，每隔 20 来页就夹两页画。这种日记本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时由于我实在很穷，在广东时每月只有八九元二等兵的待遇，所以觉得相当贵重。当时没有用，一直带到延安。后

来它被我派了一个比较值得回忆的用场，这个以后我再写。

我在桂林呆了好几天，有一天办事处终于告诉我可以向重庆出发了。办事处为叶剑英同志弄了一辆载重卡车，我们——从桂林去重庆的有几个人，大家都在桂林等着——可以搭这辆车走。在出发的那一天我们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一群人就坐在车的上面。我们都穿着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从来没有当过兵，这次是第一次穿军装。

顺便讲讲那次去重庆途中过宜山的情况。从桂林出发，当天就到了柳州。在柳州我们停留了一天，然后前进到宜山。到宜山后我们又停留了一整天。那时候行车的速度是很慢的。

我知道流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的父亲当时在宜山。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不知怎的遇到了他，把他拉到宜山。我这个同学这时候是在国民党军队当汽车队队长，当时驻在宜山以东若干里的一个村庄里。我在宜山有一整天空闲的时间，本来是可以找一下我父亲的。我和父亲分开多年，从感情上说我想见见他。可是我不愿意见我那个初中同学。他同我在上初中时关系密切。在初中时他喜欢读一些进步小说，对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很向往。1927 年“四·一二”前后他初中毕业，考了黄埔军校，结果当了一名国民党军人。我不喜欢见这种人，因此只好不见我父亲。在即将离开宜山的时候才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说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见他了。没有想到汽车开到宜山西边的江畔，有成百辆的汽车在那里等轮船把它们渡到对岸去。我们的那辆汽车在江边足足排了两天队，还轮不到过江。而我的同学是汽车队队长，非常熟悉江边车子排队的情

况，于是坐着汽车一辆一辆地查看，终于找到了我，并把我接到他的驻地见了我父亲。我在汽车连驻地住了一晚，第二天他把我送回江边，又等了一两天才轮到我们过江。

10.2 贵　州

过了宜山那一条江，走不远就进入贵州省。

贵州穷山恶水、生活贫困早有所闻。走在贵州境内的路上，对一路的情景进行观察，果真如此。路边的山又大又陡，由于雨水充足，山上有树，可就是没有田地。田地都在坝子——山间的小平原，贵州这种小平原既小又少。汽车在公路上走，就没有经过这种小平原。那时修筑的公路为了省钱，坡度很大，坐在车上的确有些胆战心惊。有一段公路司机们把它叫做“掉死岩”，这是谐音，本来还有一个好听一点的正式的名字，可是别人不用那个名称去称呼它。走这段公路，只要司机一不小心，车子就有翻下大山去的危险。我坐在车上，亲眼看到不止一辆掉到山下去的汽车的残骸。路上行人不多，但常常可以看到背着一大块盐块的独行人。一块一般 100 公斤左右，背盐人艰难地在坡度很大的公路上行走。这块盐一直不从身上卸下，随身带着一个大架子，实在太累了，就用木架把盐块支起，在路边靠一靠，歇歇背和腿。在路上有时还可以看到卖茶水和卖银耳汤的。茶水当然很便宜，赚不了多少钱。那银耳，的确是当地的特产，煮得很好，在上海这些地方可以卖个好价钱，在那里价钱也一点不贵。干这些营生的人不管大大小小，个个

穿得破烂不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句概括贵州当时状况的名言——其实我早已听说过——同我们亲眼所见完全吻合。

汽车进入贵州，经过独山到了都匀。到都匀后，司机告诉我们，第三天清早离开都匀前往贵阳。这样一个前进速度对我也比较合适，我正好有一个清华同学、民先队友傅明弟在都匀，我想见见他，了解当时的状况。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抗战后在他家乡都匀搞发展民先的工作，同我一直有通信联系。各地抗先的住址我都带在身边，按照我身边本子上记下的地址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他告诉我，贵州的政治局势很不好，只能同特别信得过的人一起工作，同一般青年只是交朋友，不敢打出民先的旗号，但他一直在坚持工作。

就是在都匀，他告诉了我贵阳民先队被破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件事我在广东省委已经听说了一些，但没有傅明弟告诉我的详细。贵阳当地人、抗战前在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党员、民先队员张益珊在1938年2月曾到武汉办事处找到我，告诉我抗战后他回贵阳已经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在贵阳建立民先地方队部的条件已经具备，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民先地方队部成立起来。我同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回贵阳后他就把贵阳地方队部组织起来了。我看到1995年8月4日《贵阳晚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讲到：“1938年4月，共产党员张益珊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派遣，来到贵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我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向贵阳国民党反动

当局要求准许民先队合法，反动当局骗他们把名册交上去，并集合起来批准合法，结果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张益珊和加入民先队的队员全部逮捕，张益珊被杀害。张益珊并不是个很幼稚的人，但还是受了骗。贵阳的国民党因为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更是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这些反动派不怕社会舆论，野蛮得很。

从都匀到贵阳只有一天的路程，车子在贵阳停留了两天。由于张益珊组织起来的贵阳地方队部已经被破坏，我也就没有法子同原先贵阳队部的人接触。那时从南京、武汉撤退到贵阳的机关不少。我们的同志，不少人也暂时在这里栖身，其中包括 1938 年在民先总队部办事处的毛雍如、清华同学民先队员章宏道（也就是后来长期在外交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都在贵阳城南的图云关。我去图云关把他们都找到了，知道他们正在考虑自己的去向，于是畅谈了一番。

过了贵阳就到了遵义。遵义会议的地址，那时由反动派统治，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去那里看一看。那时我对党的这段历史并不清楚，只是听到过红军在遵义开过一个会，会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完成了长征。我想听叶剑英同志讲讲遵义会议的情况，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晚上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分散住的，那天晚上我被分配到一个有钱的人家，在一个有顶的蚊帐里舒舒服服地不受蚊子、臭虫、跳蚤扰乱地睡了一个好觉。而一路上我是被蚊子咬怕了，常常在汽车上面露天过夜。对这顶帐子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5 年 8 月我写了一篇《贵州

的两顶先进的帐子》，把这一顶帐子也写在那篇文章里面。

汽车要经过娄山关。娄山关红军的战争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早上车子从遵义出发时就有人提出过娄山关时汽车停下来看看。同车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指挥过娄山关战斗，大家更希望他做点介绍，叶剑英同志同意了。

到娄山关，汽车在一个立有“娄山关”三个字的碑的地方停下来，大家都下了车，在碑前站好。贵州山高，起落也大。娄山关地形的确相当险要。那时的公路质量也差，更增加了险要的感觉。叶剑英同志用手指着近处和远处的山头山谷，绘声绘色地讲了当年娄山关这一仗是怎么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以后我见到叶剑英的机会不少，建国以后更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见到过他，可是听他讲故事只有这一次。

10.3 四　川

车子到了重庆，同来的人都分散了。我被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安置在化龙桥的一个地方，那房子是南方局或八路军办事处接待过路人员的地方。

我们住的地方是平房，靠着马路。房子很简陋，有些像临时工棚。这种建筑物当然不会长期保留。建国后一次去重庆，我去化龙桥走了一趟，现在这个地方是闹市，路边的房屋全是几层的楼房，同当初留下的印象完全对不上号。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蒋介石加强统治，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林立，同时我们党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

也在那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发行。这个城市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两党的斗争很尖锐，也很复杂。我的熟人不少，清华同学蒋南翔、杨述、许立群等等，上海大同的同学孙少礼、孙幼礼等都在这里。他们有的是做公开工作的，有的是做地下秘密工作的。我在重庆呆的时间不短，要等有合适的安全的去延安的机会才能走。我也不着急去延安，有机会在重庆看看也很难得。

我在重庆的活动就是访友。市内各处有朋友的地方都去。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去了不少次。我还去过北碚和柏溪，那是离重庆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郊区。我有两次是两条腿走着去的。红岩有时我也去，问问去延安的消息。在这个山城，我会友聊天倒不觉得寂寞，不过我并没有参加那儿的活动，我是个过路人，出头露面对在重庆工作的同志和我自己的安全不利。到重庆听到南方局的同志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后，我就告诫自己要特别小心谨慎，特别像杨述、许立群担任当地党的工作，不便同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于是定下一条结识当地一些青年学生的方针。心理学家陈元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叫薛乐，在中央大学学习，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重庆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到重庆的时间在6月，还不到最热的季节，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年轻，重庆没有给我留下酷热难忍的回忆。1938年夏天我在武汉，也没有留下酷热的回忆。

我终于从重庆出发了，也是乘坐一辆我们八路军的载重汽车。我也还是穿上了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第一站是

成都。

从衡阳起，这些城市我都没有去过，成都也是第一次到。在民先的许多地方队部里，成都队部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队部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同学韩天石在1936年暑假后到了四川。他也是“一二·九”后南下扩大宣传过程中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者，那时民先队还不是全国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成立时没有“中华”两个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6年下半年开过民先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成立的。从那时开始，民先总队长便一直是李昌(1937年他到太原后有一段时间到北方局组织部工作，由李哲人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除外)。韩天石的组织能力很强，成都的民先队的基础主要在四川大学，胡绩伟、熊复都是成都队部的队员。我在民先总队部工作时，同成都队部、同韩天石通信也比较多。1937年我在保定那两天，韩天石作为全国学生代表之一到那里向前线军队慰劳，我们也见过面。所以在我到成都后，便同韩天石和一些民先队员会面。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天，由于在成都我有一些可以深谈的朋友，所以我对四川和成都的政局以及当时我们党和青年工作的状况就能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同时天府之国成都的一些景象、成都的小吃——开花豆、豆浆稀饭等，还有成都的茶馆，我都体验了一番。祠堂街车耀先办的“努力餐”我也光顾了一下。

在成都呆的时间不长，过了几天就坐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的军车向西安出发。

10.4 陕　西

离开成都并不等于离开四川。还要过绵阳、梓潼、剑阁、广元才能到陕西。汽车经过剑门关，开上一段栈桥，使我弄明白“明修栈桥，暗渡陈仓”这句话里的栈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栈桥也者，原来是在直立的石壁上凿洞，把木柱子打进去作为斜的桥桩，上面盖上木板，变成人马可以走的桥。桥下就是万丈深渊，跌进去就粉身碎骨。蜀国防止魏国侵入，放一把大火把桥面和桥桩烧了，路就不能走了，修复起来很不容易。诸葛亮想出兵攻魏，表面上动员许多人修复栈桥来掩人耳目，其实派兵走了一条经过陈仓的小路，绕过栈桥到魏国的后方去。大家不愿坐在汽车上过栈桥，司机也要求减轻车的重量。当汽车在木桥上走时吱咯吱咯地响，真使人惊心动魄。不知道现在汽车还走栈桥不？

不过剑门关还在四川境内，而且还在广元的南面，到了宁强才进陕西，再向前几十公里，快到勉县，走过这路的同志说到了“定军山”。进陕西后第一晚宿褒城。第二天过昌坝后过庙台子，司机把汽车停下来让我们观光留侯祠。

过成都后，我就没有朋友可找了。一路上我找人了解情况，目的是想到了延安后，把了解的情况说给中央青委的熟人知道。陕西的情况，自从 1937 年 9 月我离开太原后，本来就不怎么了解（因为按照分工，北方的情况由总队部李昌直接抓），这次也就不再去打问了。因此去延安的这一段路程，我就像一

个旅游者那样，一路欣赏大自然风光和注意名胜古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风光，那些崇山峻岭、那些险要的地势，长期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看了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西安已经是1939年的6月底或者7月初了。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一方面让我们休息一下，一方面考虑究竟什么时候出发去延安最好。办事处的同志不让我们到外面乱跑，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但不是限制我们绝对不能出去，所以我还是出去了一下。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就看了看市容，这个在许许多多朝代做过都城的西安，果然气势非凡。

没有呆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告诉我们可以走了，说最近的形势也还可以，上一辆军车已经顺利到了延安，而且返回了西安，你们可以坐这辆车去延安。可是又休息了两天，我们才继续北上。那次从西安到陕甘宁一路顺利，三四天后，当我们看到延安山上的宝塔时，心情十分激动。

我的历史也就从这个时候起，由1935年到1939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青年活动进入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参加革命建设的一个新时期。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